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陶渊明显案揭秘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 一、身世思想之谜

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个为人独特、个性鲜明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在他那并不算很长的六十余年的生涯中，正是中国南北对峙，战乱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宁，改朝换代非常频繁的年份。其时阶级对立尖锐，民族战争激烈，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民族融合进程也较快。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和仕履经历本来并不很复杂，可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社会文化必然受到较大的冲击，因而使一些本来比较容易理清的线索和必要的文献资料也变得难于梳理和搜求了，即或留存的部份，不是残缺不全，就是过于简略。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陶渊明生平事迹的系统了解和全面把握的难度。

此外，陶渊明生活的晋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个人出身和门第的年代，就东晋王朝而论，这是一个由典型的大士族地主阶层执掌国家政治大权和经济命脉的王朝。国家的权力主要集中在西晋末年从中原大乱中逃逸到江南的司马氏、王氏、谢氏等几家大士族手中，南方的朱氏、张氏、顾氏、陆氏是其主要的支持者。象陶渊明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里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从政的道路荆棘丛生。尽管有的人具有超卓的才质，不凡的本领，可由于门第的限制，是很难跻身高位的。陶渊明

虽然号称是东晋大司马、长沙郡公陶侃的曾孙，却并非嫡嗣；同时，就象陶侃这样于东晋有辅翊大功的重臣也因为不是大士族血统而遭受歧视，被嗤笑为“溪狗”。陶渊明的仕途前景，自然不难预测了。象陶渊明这样“才秀人微”的知识分子，因其不愿扭曲自我去迎合上层统治集团而“取湮当代”是其必然归宿。这样，关于他的事迹和经历的记载，当然就不可能那样丰富和翔实。这是形成陶渊明一生中的疑案、谜团的又一原因。

有鉴于此，本书将对陶渊明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诗人、文学家的一生经历和重要活动、诗文创作，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等方面的情况，分门别类予以梳理，同时借鉴、汲取历代研究者在以上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心得、成就，参以笔者的见解，试图对陶渊明研究存在的疑案、悬案、谜团、暗礁作出解答和阐释，为对陶渊明其人及其作品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定的研究线索和必要的参考。

古往今来，人们为陶渊明编制了不少的年谱。综观各谱，对于陶渊明的出生年代有多种说法，那么——

### 陶渊明究竟出生于哪一年？

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陶渊明以其崇高的人格和超迈时流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是很匮乏的，因而，象陶渊明出身年代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也一直没有搞清楚，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诸种说法的差距是惊人的，最大相差竟达廿余年之久。看来，确实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证。

为什么会出现对陶渊明出生年代考证的分歧意见呢？这主要是各种有关陶渊明事迹的资料中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记载，因而所有的研究者都是依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他们对这些材料的理解与推测得出结论。最早记载陶渊明事迹为人的资料是陶渊明的挚友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其中有一段可以作为陶渊明生年推算依据的是：“有诏征（陶渊明）为著作郎，称疾不到，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如果按颜延之的说法，陶渊明卒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即公元427年，他又活了63岁的话，陶渊明的出生年代上推63年，自然就是晋哀帝兴宁三年，即公元365年。但是，颜文中“春秋六十有三”一语下，有的版本是“春秋若干”。这样，陶渊明在世年代的不确定，其推算就不可靠了。所有关于陶渊明生年和他的享年多少的说法都由此而引发。但沈约《宋书·陶渊明传》也说陶渊明“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岁。”

自从颜延之和沈约关于陶渊明的享年和卒年的记载出现之后，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为之采纳，象王质、吴仁杰等人编制的陶渊明年谱都是用的颜、沈之说。可是，后来怀疑颜、沈说法的人开始多起来了，张纘在他编制的《吴谱辩证》中认为陶渊明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年），卒年同于沈说。这样，陶渊明就活了76岁。而梁启超另创新说，认为陶渊明生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卒年不变，陶渊明只活了56岁；古直考订陶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卒年不变，这样，陶渊明只活了52岁。如此等等。

综观关于陶渊明生年的考证和推算中，怀疑他享年63岁的几种说法都似乎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细加辨析，又略嫌依据不足。比如，梁启超的考证，从他所列举的陶渊明的诗文中寻求的内证有12条之多，应当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现开列如下：

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饮酒》十九）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之一）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十六）  
自我抱兹独，俛四十年。（《连雨独饮》）  
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游斜川》）

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之六）

吾年过五十。（《与子俨等疏》）

结发念善事，俛六九年。（《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这是按照陶渊明诗文中叙写年龄的大小而排列的。梁启超首先指出，陶渊明从 12 岁到 54 岁的事迹叙写很有规律，时间观念也很清楚，如果陶活到 63 岁，为什么 54 岁之后就再不提及其行年了呢？而且陶的《自祭文》和《挽歌》是临终的绝笔，说明陶渊明晚年仍然在创作。同时，《与子俨等疏》属于遗嘱性文字，陶渊明在《挽歌》中又说“早终非命促”，如果陶渊明活到 63 岁的话，是不好称“早终”的。此外，梁启超还用《游斜川》、《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等诗的纪年来推算陶的年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梁启超认定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中的“春秋六十有三”，“疑后人据《宋传》改增”，不免缺乏依据。同时他所论的各条也未必允当，《游斜川》诗中所举就靠不住，首句很多版本都是“开岁倏五日”，显然与梁所举不同，就以《与子俨等疏》而言，没有理由认定为遗嘱。《挽歌》所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并不是说的侍人自己，而是以达观的眼光看待人生的认识。至于张纘和古直的推算，较之梁启超的考证就更为空疏，可以不必深论。

那么，究竟陶渊明生于何年呢？笔者认为颜延之和沈约的说法较为可信。颜延之和陶渊明是同时代的人，他比陶小不到 20 岁，据颜在《诔》文中说，他们初次会面的情景是：“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居，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后来二人的交往更为频繁，当颜延之赴始安郡为官时，还专程到陶渊明的住处聚晤宴饮，临别之际，为陶留下二万钱作为饮酒之资（萧统《陶渊明传》）。因此，颜的记载是最为权威的可靠资料。至于另外一种版本作“春秋若干”，那是古书传刻之误。沈约的记载正好可以作为订正颜文中“春秋若干”的根据。沈约修《宋书》时，上距陶渊明去世不过六十余年，他的材料很有可能来自于颜《诔》，认为颜《诔》中“春秋六十有三”根据《宋书》改增，是缺乏根据的。沈约的《宋书》的“时年六十三岁”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总不会凭空杜撰吧！沈约的记载和颜延之《诔》的一种版本的吻合；应当说是最原始，最可靠的关于陶渊明事迹的资料了。如果没有更为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的话，我们认为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 365 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 427 年），活了 63 岁是可信的。

陶渊明在 29 岁初得长子伊时写过一首《命子》诗，列数了陶家悠久的历史。在他所举的列祖列宗里，曾经提到过陶侃，那么——

### 陶渊明是陶侃的什么人？

陶渊明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 393 年）初为人父，这在封建时代是颇为看重的大事。于是他在《命子》诗的开头就说：“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陶渊明摆出了夏代的御龙，商代的豕韦，周代的司徒陶叔……的家谱渊源，意在向他刚出世的长子称述陶门的悠久历史和许多有过建树的祖先，希望长子能继承陶门的辉煌。说到陶侃时，诗歌是这样写的：“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是说陶侃在东晋武功和治绩都很突出，出任荆州刺史，威镇武昌，任广州刺史等要职。但是功成身退，不矜功伐。这里明确地表示陶渊明是陶侃的后代。据《宋书·陶渊明》传说：“陶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萧统《陶渊明传》、《晋书·陶潜传》以及《莲社高贤传》所载皆同。因此，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对于这一说法也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四十《陶渊明世系考》中说陶渊明是侃的七世孙。王昶亦主此说（《详《春融堂集》四十三《书陶渊明传后》）。姚莹却认为陶渊明是陶侃的六世孙（《东溟文后集·与方植之论陶渊明为桓公后说》）。关于辈份，朱自清作过考证，他的结论与《宋书》等曾孙说相同。朱说：“旧说既有难通，七世孙六世孙说亦不可信；方东树谓侃卒于成帝咸和九年（334 年），下逮哀帝兴宁三年（365 年）渊明生，相距三十一年而得七世；何得如是之遽！且渊明母乃侃外孙女，亦不应降配侃六世孙，六世孙说可同此破。”应当说反驳得很有根据。当然，还有根本就怀疑陶渊明是否出于陶侃后人的说法，阎咏在《左汾近稿》中采用不同的断句方法和改“大司马”为“右司马”的做法，是不足为据的，前人已辨其妄，今不赘述。

陶侃是一个很有奋斗精神的“孤寒”读书人，字士行，他的祖上可能是湖南武陵的溪族人，后来才徙家至庐江浔阳。寒素出身的陶侃是很有志气和勤奋向上的强者。他生活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东晋社会里，等级森严，士族秉政，要作一个小官都很困难。陶侃步入仕途的经历非常悲惨，全靠其母湛氏的经营谋划才得以实现。湛氏为了求得别人举荐陶侃，把自己的一头乌发剪去卖了买回了米和酒肉，把屋子的柱子砍来作柴烧，把床席剥成草料喂客人的马……如此断发砍柱毁席待客，才感动了客人举荐陶侃做上了下级官吏。陶侃凭借自己的才智和毅力，在戎马倥偬中建立军功而逐渐显达，最后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抓紧机遇建功立业，锐意进取，在清谈浮华，老庄无为哲学盛行的时代，他还发表过不少批评玄虚旷诞风气的言论。而且对荒废时光，耽于博戏之辈非常鄙弃。《晋书·陶侃传》称：“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借寸阴，至于众人，当借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自是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搏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菹蒲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

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陶侃这样的勤政爱民、珍惜时光、廉洁自律的官吏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少有循吏，和当时那些只知享乐，放诞清谈的士族官吏有本质的区别。当时有人评他“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的确不为溢美之词。只是陶侃在抨击清谈时反对必要的游戏娱乐未免有些偏激。

陶渊明和陶侃的关系，还不仅仅是曾祖孙关系。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经作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也是陶渊明的外祖母。所以，陶渊明的母亲，不仅是陶侃的孙媳妇，而且还是陶侃的外孙女。

在陶渊明的诗歌中，还有《赠长沙公》诗谈到他与陶侃的关系。此诗前面有段序文很重要：“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经过浔阳，临别赠此。”序中的大司马指陶侃，袭陶侃的爵位最初是嫡系子孙子夏，夏卒之后由其侄弘继承，弘卒后则是弘子绰之继嗣，绰之死后袭称长沙公的是陶延寿，就是陶渊明诗中所赠的对象。值得

注意的是陶渊明本来就不是陶侃的嫡传，到了陶延寿，关系已经十分疏远陌生了。“以为路人”，说明早已远出五眼之外了。因此，陶渊明根本不可能从陶侃这样的曾祖那里获得任何实际利益和帮助，顶多不过是心理上的满足和祖上荣光的虚幻而已。明确这些，对理解陶渊明的为人行事和仕途生涯是很重要的。

陶渊明在《停云》诗中感叹“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又在《感士不遇赋》中说：“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生动地勾画了东晋社会的恐怖景象。那么——

### 陶渊明生活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如果认定陶渊明的生年是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的话，这时上距东晋政权的建立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已经48年了。此后东晋王朝又持续了50余年（公元419年）才被刘宋取代。晋宋易代之后，陶渊明又生活了七年之久（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作为诗人的陶渊明的一生，虽然跨越的时间并不算很长（63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

短暂的一瞬，然而在南北朝对峙的特定岁月中，社会又是那样地剧烈动荡变化着。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东晋、楚、刘宋），十个皇帝（晋哀帝、废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桓玄篡位、恭帝、宋武帝、少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不宁，政治极为腐败，军阀连年混战。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整个中国被分裂为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就东晋政权而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先是南北大士族之间的对立，接着就是北方大士族内部争夺帝位的矛盾：公元323年的王敦之乱；不久又引发了公元327年的苏峻之乱。随后即是大军阀桓温势力的膨胀，桓温因其平定西蜀，收复洛阳而声望大振，随时觊觎着东晋政权。然而，桓温不久死去。谢安执政，死气沉沉的东晋象重病缠身的人一样突然又出现了一些生机。在陶渊明19岁（383年）那年，以谢安为首的东晋军队击败了一心想吞并江南的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并且乘机进兵北伐，一度恢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年青的陶渊明也一度异常振奋，对国家前景和个人命运萌生了希望。可是这种因胜利而稳定的局面伴随着公充385年谢安的辞世而宣告结束，昙花一现，盛景难再。东晋政权落入极端颠顶昏庸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手中。而帝室的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父子的权力之争，帝室和其它士族之间的倾轧也异常激烈。终于引发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镇北将军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等人起兵反晋，王恭事败被杀，桓玄入据江州，权势日大，成为东晋的心腹之患。次年（399年），会稽郡又爆发了反对司马元显强征兵役的孙恩起义。当时扬州七郡人民同时响应，声

势浩大，会稽、吴兴、义兴等郡皆为孙恩占据，孙恩不久失败，桓玄势力更是不可一世，他击杀殷仲堪，占领荆州，并于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领兵东下进入建康（南京），次年强行篡位，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楚。

以平定孙恩起家，攻击桓玄自大的刘裕又成了一个更大的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的暴发户，他虽然在北伐收复失地中有所建树，那实际上是为他篡晋自立捞取政治资本。于是，在公元420年，刘裕废掉了晋恭帝自立为帝，称宋武帝。

晋代政治极端腐败，士族大地主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和经济，门阀之风盛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士族豪门和庶族之间的界限也特别森严，政府在选官、识拔人材、通婚等方面都有种种严格的限制，甚至就是车服之类也不可混淆，当时“举世人材，升降盖寡。徒以凭藉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

高门，上品无贱族’ ”（《宋书·恩幸传论》），概括了当时的政治特征和用人标准。那时人民的生活也是十分艰难的，当时的豫章太守范宁上任前曾向皇帝上疏：“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晋书·范宁传》）如此苛严的役赋怎不搞得天怒人怨，生存艰辛！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思想界的矛盾也很突出。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的驳难辩论也很激烈。反映了分裂的政治局面和动乱苦难的社会现实思想界的涌动和活跃。由于国家的分裂，政治动荡，儒家思想早已丧失了独尊的地位，正如《晋书·儒林传论》所说：“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儒学主导地位的动摇，必然有新的思想的崛起，老庄哲学的盛行，自然无为观念的受宠，清谈玄学的炽烈，三玄（周易、老、庄）成为时髦，以及佛家今生昔修寄期望于来世的信念的普及等等，是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大致轮廓。



陶渊明常以羲皇上人自称，“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以此自乐。他虽然做过几任小官，不久又辞官隐居，人们不禁要问——

### 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陶渊明去世之后，他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并序》里就把他称为“南岳之幽居者也”。而沈约在《宋书》里把陶渊明列在《隐逸传》中。后来，钟嵘《诗品》中对陶的评价的结束语也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似乎陶渊明是一个甘心于贫贱寂寞，没有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的隐逸。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如果我们认真研读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我们强烈地感到诗人热切于人世的政治理想和执著于建功立业的

个人奋斗是何等地动人啊，就会赞同龚自珍“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的评价。

陶渊明虽然置身于晋宋之际玄学盛行，佛学有着广泛影的年代，可是，他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却是那样的深广，儒家学说的积极于人生的态度和建功立业的追求在陶渊明的思想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反映。他恪守儒家教导，信奉《六经》，热切期望在短暂的人生中建立功业，早著荣名，尽快地施展自身价值，以实现其修齐治平的抱负和理想。为此，他从青年时代开始，酷爱学习，尤喜读书，为完善自我下过一番功夫。且看陶渊明是怎样的态度吧：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各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荣木》）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八首》）之八）

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九首》）之八）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

如彼稷契，孰不愿之。

（《读史述九章·屈贾》）

这些诗句表明了陶渊明并不是一开始就那样飘逸和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他自觉地学习儒家经典，把儒家治国安邦之道奉为行为准则，强烈地躁动着功业追求，这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干宝《晋纪总论》）的时代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或许是从陶侃的勤奋务实的儒家风范和他外祖父孟嘉的崇儒倾向继承下来的吧！虽然后来陶渊明选择了归隐田园的人生道路，那是仕途受阻之后的痛苦归宿。显然，他并不是真正的隐逸和遗世独立的人。就是在他晚年的《读山海经》十三首诗中，仍然涌动着“猛志固常在”的气势。而临近晚年，还在《感士不遇赋》中发出了“不遇”和“病奇名之不立”的太息，充溢着“有志不获聘”的悲郁。为此，陶渊明把自己的政治

见解和人生理想融入《桃花源诗》并记中，那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真正不关世情的隐者是绝难写出如此杰出的热爱人生的作品的。

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和功业追求，陶渊明非常自觉而努力地发愤学习，他不仅象当时一般士大夫那样专注于《老》、《庄》和儒家经典，而且博览各种书籍，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自己的读书：“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如此等等。在《命子》和《责子》诗中，也殷切地希望下一代能融会贯通儒家典籍，学好本领，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材，也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当然，当陶渊明的抱负无法实现之后，他才由“大济苍生”的追求转向于“击壤自欢”（《感士不遇赋》）的抉择。这种积极的人生奋斗目标经过多次努力无法达到时，再根据自身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作出新的调节和选择，的确是明智的决定，不失为一种人生理想，这就是《论语·泰伯》中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通脱态度和变通抉择，也就是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的灵活人生追求。总之，陶渊明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隐居田园的目标，而是经过许多奋斗，权衡主客观条件之后的必然。我们大可不必用今人的价值观去衡量他，把陶渊明的归隐指责为消极退避。陶渊明的人生理想可以归纳为：

积极追求（求仕）——适当调整目标（短暂归隐）——再奋斗追求（再出仕）——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生存方式（归隐）

陶渊明生活在哲学思想十分活跃，儒、释、道各派学说斗争异常激烈的两晋时代，那么

### 陶渊明的思想主要倾向是什么？

魏晋时期，不仅社会动荡，而且哲学思想也很活跃。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象两汉时代那样占有独尊的地位，佛家思想和老庄学说的地位和影响日趋突出。随之而来的是玄学的盛行和清谈之风的泛滥，以及佛教的广泛传播，佛寺的增多。老庄玄学的影响居于显要地位，成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以至于出现所谓“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木闲强”（《世说新语·文学》）的情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的崩溃和衰落，它是官方竭力维护和大肆张扬的思想体系，只是说儒家学说不如以前那样独尊和显要罢了。

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各种哲学思想都会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和为人处世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读书人。他的曾祖父陶侃的务实勤奋的作风，他祖父和父亲都有做过中下级地方官吏的经历，向陶渊明昭示了积极入仕，勤奋踏实的人生追求是十分重要的。他虽然“心好异书”，但从他在诗文作品中反映出来他主要阅读的是儒家《六经》，孔孟之道，老庄哲理，以及有关的史籍、舆地之类、接受的是儒、道学说。从他进入仕途之后的行迹来看，也以清廉勤政和施恩惠于人民的儒家仁政思想为本体，兼以清静无为的道家色彩的综合。如果参合陶渊明许多诗中一再秉承先师孔子的训诫，以儒家之道为旨归，渗入道家委运任化，率真自然的价值观念来审视，不难看出他以儒家哲学为主干，汲取道家思想而形成的思想特征。陶渊明积极从政，五次进入仕途，虽遭挫折而无消沉颓丧的进取精神，这不消说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他在《感士不遇赋》中大济苍生的愿望，“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追求；对明君贤臣的上古社会的肯定：“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问所津。”（《饮酒》二十）对奋发敏勉人生态度的赞扬：“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半勉励，岁月不待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他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而且期望他们迅速成长，去获取功业，向“述圣”子思看齐：“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命子》）并且后来的实践中，发现子女“不好纸笔”、“不爱文术”，学业无成而为之感叹惋惜。（《责子》）这莫不表明陶渊明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生活，乃至自己的儿子都很重视，是儒家思想影响的体现。至于道家思想，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更是影响深广的显学，它融铸了诗人委运任化，抱朴守真的人生态度，孕育了诗人质性自然，率性自适的个性为人，乐天知命，物我一体的精神境界。委运任化是对自然生命过程最终回归宇宙本体的哲理认知；抱朴守真则要求在生命过程中追求适性自足，自然本性不受外界环境的扭曲和异化。有了这样的感悟和理解，这就会对所谓天命、物我持达观的态度和以顺应自然的方式来消解社会上的复杂变化和种种荣辱穷通。这外化为陶渊明的诗文中就是潇洒冲淡的艺术倾向和恬静自然的审美特征：“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穷通靡

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这些似乎与儒家思想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极为悖离，很难整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社会是庞杂的复合体，它对各种事物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动态性，因而各种思想和林林总总的事物都能在社会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至于人的思想，比社会不知要复杂好多倍。社会上存在的事物，可以在人的头脑里得到反映，社会中没有的事物，也可以通过幻想印入人的脑际。蔡元培指出：“清谈家之思想，非截然舍儒而合于佛道也，彼盖灭裂而杂糅之”。（《中国伦理学史》）接触到人思想的兼容性与动态活跃性。就一个人而言，他的思想在某一阶段，某一特定时期，某一具体环境中是那种思想为主导，而在不同的时地和面对不同的对象时，又会展示出不同的意念。就陶渊明而言，他思想的主导，或者说当他在青年时代时，积极入仕，实现人生价值的思想，功业追求无疑是其主旋律。黑暗的现实，腐朽的门阀制度使他的政治理想沦为泡影之后，顺应自然，委运任化显然又是其必然的抉择。就是常常被论者忽视的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他和庐山高僧慧远一度交往频繁，而且关系不错，《庐山记》中记载过他们之间的过从友谊：“远法师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过虎溪，虎辄鸣号。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与陶渊明并称为“寻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和陶渊明交往密切，而且诗文唱酬，他们都是热衷于佛教经义之徒，如果陶渊明对佛教思想一概拒斥，他们是很难交往相处的。此外，佛家的空观思想，慈爱态度在陶身上也有所反映。佛教忍辱度的修持方法对陶渊明固守穷节不能说毫无关联，他的委运任化的生死观主要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也不能说与佛家十二因缘理论和把人生命的结束视为涅槃的见解无缘吧！

我们剖析陶渊明的思想倾向，从他的为人行事和诗文创作入手，指出他思想的构成及其主要特征时分别考察了当时

哲学界的几种思想对他的沾溉、浸润。其实这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陶渊明思想远比我们的分析要复杂得多，有些意念是根本无法进行归类分析的。就以当时流行的儒、释、道三种思想而论，也有一些思想是介乎二者，甚至多者之间的思想，各种思想之间的渗透、包容是思想领域的必然现象。我们可以这样来归纳：陶渊明既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不乏清静逍遥的精神境界，更具有空观慈爱的对人待物的情怀。如果一定要在这三者中分出主次的话，那就是儒道结合的本体，兼融佛家的部份营养形成的整合体。

沈约在《宋书·陶潜传》里说：“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当然是说他在年青的时候进入仕途效劳的对象有很多劣迹，因此遭到訾议。那么

### 应当如何评价陶渊明“不洁去就之迹”？

陶渊明的品行为人和文学创作在晋宋之际都是独标一格，不同凡响的。套用他的诗句则是“卓然见高枝”。沈约为什么要说他年青的时候有“不洁去就之迹”呢？这实际上是指他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做过当时任江州、荆州二刺史的桓玄的幕僚和在刘裕幕下任过职而言的。因为桓玄后来（公元402年）犯上作乱，带兵攻入东晋京城建康，篡夺了大权并于公元403年（晋安帝元兴元年）夺了帝位，自称皇帝，改元永始，改国号为楚。桓玄建立的楚是个短命的政权，很快被消灭。因为陶渊明做过后来作了乱臣贼子桓玄僚属，也就使他的一生蒙下了污点，这就是“不洁去就”所指（当然也包括入幕刘裕事）。对此需要作些辨析。

首先，桓玄其人并非一开始就是面目狰狞，行为丑恶的奸诈之臣，他是东晋名臣桓温之子，颇有乃父的雄豪之气和建功立业的襟抱。他在献给皇帝的奏疏里吐露了其政治追求和奋斗目标：“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闭，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漭，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晋书·桓玄传》）不能否认桓玄的奏疏为那个死气沉沉的东晋王朝注入了一种一统中国，乘时立功的积极精神。当时的东晋诚如桓玄所抨击那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桓玄不管当时抱着何等动机，他在篡晋自立之前确实有过一些作为，使得隳坏的晋朝一度出现了转机，史称桓玄废黜凡庸奸佞之辈，擢拔俊贤，所谓“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晋书·桓玄传》）对于这样一个政治上有抱负，军事上有功绩，当时又在陶渊明的故乡为长官的桓玄，为什么陶渊明不可以去作他的幕僚呢？那时陶渊明还不满四十岁，正是事业上有追求，急欲寻求建功立业，施展“大济苍生”宏愿的年华，在桓玄的不臣野心还没有充分暴露之际，他的入幕任职（而且是低级官吏）是无可指责的。桓玄后来政治野心大暴露之后，把晋安帝赶下帝座，这又与陶渊明有什么相干呢？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陷入正统的篡逆忠伪的是非判断，去竭力为陶渊明做过桓玄的幕僚进行无意义的辩护。入幕刘裕事也应作如是观。沈约作为一个封建官吏和正统史官那样评价陶渊明是其必然，“不洁去迹”也是他用封建臣子的价值标准去量衡的结论。其实这是不公正的。宋代的叶梦得身历乱世，对文人在军阀混战年代的政治命运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切身体验，他说：“渊明隆安庚子从都还，明年赴假还江陵。荆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玄、刘裕袭杀殷仲堪即代其任，至于篡，未授别人。渊明之行在五年，岂尝仕于玄邪？传云为镇参军。按刘裕以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镇军将军事，岂又尝仕于裕邪？桓玄、刘裕之际，而渊明皆或从仕，世多以为疑。此非知渊明之深者。无论实为玄、裕否，渊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复之时，渊明乃肯出仕乎？盖寻阳上流用武之地，玄与裕所由交战出入往来者也。渊明自足以全节而不伤生，故迫之仕则仕，不以轻犯其锋，弃之归则归，不以终屈其已。岂区区一节之士，可以窥其间哉！”（吴仁杰谱引）应当说，陶渊明做过桓玄刘裕的幕僚的事

情是不必怀疑的。这除了有沈约的记载之外，刘裕他自己的诗歌为证，倒是“故迫之仕则仕，不以轻犯其锋”，可以说把握住了乱世文人为官的普遍心态。象陶渊明这样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生存之地又是当时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江州，恐怕要做到时时事事处处都按照自己的性格、意愿来行事，安排自己的出处行藏是不大可能的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陶渊明做桓玄、刘裕的幕僚，不管他是自愿还是被迫，都不是他的白璧之玷，他没有为桓玄的和刘裕篡逆分担任何罪责的义务。他们的罪孽与他毫不相干，这丝毫无损陶渊明的为人。迄今为此，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陶渊明参赞过桓玄、刘裕的谋略，作为一个下级僚属他不过是稻粱之谋而已。

其实，陶渊明的为人并不象一些人指出的那样僵化固执，反之倒很随和通达与自然，他自称“质性自然”，是可以从很多地方得到印证的。萧统说他，“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诘也。……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陶渊明传》）表现了随和灵活的一面。他根本不愿与王弘之类的人往来，但弘来了之后，“亦无诘也”，也不必与之为敌，颇可说明问题。

陶渊明在大约 30 岁时写过一篇朴素自然，清新流畅的优美散文《五柳先生传》。他的《五柳先生传》是一篇与当时流行华艳绮丽文风和崇尚典故藻饰的时代特征截然相背的作品，那么——

### 陶渊明为什么自称“五柳先生”？

陶渊明是一个不同于流俗的作家，当人们侈谈名理，清高隐逸，以不染世务为崇尚时，他却守拙归隐，去参加田园劳动。而当骈偶之风弥漫于文坛之际，他却以纯然散缓单行冲淡的文句来传达出孤标傲世，旷达情真的怀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只有 171 字的短文，却把陶渊明的个性、气质、秉赋和追求表现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箠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关于这篇文章，历代评价是相当高的。沈约在《宋书·陶潜传》中说：“少有高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而且将此文全篇采入《宋书》。萧统写的《陶渊明传》也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以肯定，这是诗人自述情性，倾吐怀抱之作。

陶渊明为什么自号“五柳先生”呢？这当然不是他的一时兴趣，显然有着深刻寓意。在魏晋时代门阀之风盛行，族属郡望被视为一个人的无形生命之际，陶渊明居然把他的出身、家门、郡望、族属，甚至于连自己的姓字都一概阙如，显然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开了一绝大的玩笑。仿佛自己是星外来人，来去自由，无依无傍，除了与“宅边柳树”等自然景物有些感情和联系之外，其余一概不知，更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了。诗人实则以调侃的意趣，戏谑的笔调向门阀士族，家族谱牒作了无情嘲弄和冷峻的挑战。两晋官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贱族”，人们相见，互通名姓，交换门阀家世籍贯，然后根据不同的身份采取与之适应的交往方式。可是诗人偏巧什么也没有，如果一定要称呼，索性就以最为常见的“五柳”为号了。魏正申先生指出：“他借以‘自况’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针对门阀制度的崇尚塑造的。以‘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否定地位的显赫；以‘亦不详其姓字，否定门第的高贵；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箠瓢屡空’否定资产的殷实；以‘不慕荣利’否定官爵的矜夸；以‘宅边有五柳树’否定士族门前施表功绩的‘阊阖’，甚至不知自己是何朝何代之人！全面否定门阀制度”（《陶渊明探稿》），可谓知言。

此文一出，“五柳先生”从此知名晋代，享誉了整个文学史，远比那些门第高贵，爵禄尊荣的王谢名流更能流芳百代，彪炳千秋。那些喜欢搬弄祖上荣光、族谱家状的阊阖之家的名上，无非是借死人的余辉来涂抹，以掩盖

精神苍白的虚空罢了。人生在世，取各种各样的名姓，说穿了不过是以此区别于群体的符号，与标号 1、2、3、4、5 并无本质的不同。可在两晋时代能够蔑视阀阅，超越世俗。摆脱浮名羈束者又能有几人呢？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篇文章就说陶渊明彻底悟透了人生，摆脱了世俗，这只不过他以貌似恬淡，实则戏谑而且不乏激愤的笔调与世俗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在《命子》诗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不是也矜夸过陶氏门第么？全面地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确实蕴含着对门阀的揶揄，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蔑视士族门阀，这使得他长期郁郁不得志，沉于下僚；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是陶侃的曾孙而感到心理上的满足，可又因为与陶侃关系的渺远而遗憾。我们既不能仅凭此文就一味地肯定陶渊明高洁傲世；也不能因为他在追述祖上辉煌时讥其未能免俗。陶渊明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追求的社会化的人，而不是圣者，更不是神！唯其如此，他才显得可爱而伟大。



在陶渊明的名号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宋书·本传》），“字深明名元亮”（《南史·本传》），五柳先生，以及唐人避讳而叫的“泉明”之外，还有一个谥号。

### 陶渊明为什么被谥为“靖节征士”或“靖节先生”？

陶渊明的生平事迹除了在《晋书》、《宋书》、《南史》有记载之外，萧统还给他写过传记。结尾是这样说的：“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夏肯仕。元嘉四年将夏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可见，陶渊明之所以叫靖节先生是他死后，由其友人根据他的一生行事为人而给他的谥号。这在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中有详细的阐明：

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徇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

这是关于陶渊明为什么是“靖节征士”的最早资料和最直接的阐释。是征询过陶的友好故旧，并且结合他生前的品行操守之后确定下来的。

谥号原本是封建时代帝王贵族大臣或者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死了之后，按照死者生前主要行迹和为人而给予的号。而古代的礼仪家对谥号的字义都有严格的审定和推敲，即所谓的“谥法”。根据“谥法”，“宽乐令终”为靖，这里是说陶渊明宽于待人接物，为人乐观大度，结局是美好佳善的意思；而“好廉克己”为节，当然指他为人廉洁，严于律己。把二者结合起来去审视陶渊明的一生，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从陶渊明的诗文和友人关于他事迹的记载来看，无论他待人接物，还是交结朋友都很友善和蔼，宽于对待的，就是对待所谓的仆役下人也很厚道。萧统说他“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陶渊明传》）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把力役当说话的工具使用是天经地义之事，而陶渊明却能认识到“此亦人子也”，其精神是可贵的，是“宽”的最好注脚。而乐观大度，几乎贯彻到他的一生，不管是为官行役还是归田躬耕，虽不免奔波疲惫，甚至冻馁交加，他基本上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主观，不怨天尤人，做到“不戚戚于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晚年微疾而终，享年63岁。在那个军阀混战，政权更替频繁，政治黑暗，社会腐朽的年代，文人罕有善终者，如张华、陆机、陆云、潘岳、郭璞等人都惨遭统治阶级杀害，这就是前人归纳的“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现实。陶渊明能平静安详地终于故宅，当然是值得庆幸了。他临死之前还能恬然自安地撰写《自祭文》和《挽歌》，足以证明其时的平静而乐观豁达的心境了。至于“好廉克己”更与陶的为人、为官、归田的人生经历完全契合。封建时代如能做个县令之类的地方官，刮地皮是常有之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其生动写照，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表明他作彭泽令以及此前为宦的廉洁，但是，归田之后极为简朴的生活，家境的清贫，甚至到了衣食不周的穷困境地，不就是他“好廉克己”的说明吗？所谓“德润身，富润屋”，一个人的贫穷富贵总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象陶渊明那样“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居住条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日常生活不正是“好廉克己”的必然吗？这也就是颜延之所说的陶渊明“厚志薄

身”的价值观的体现和“爵同下士，禄等上农”的写照了。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那么——

### “寻阳三隐”中的周续之和 刘遗民与陶渊明的关系如何？

隐逸之风，由来已久，几乎与人类社会同步出现，巢父、许由可以称为鼻祖。隐逸现象，实际上是不同政治见解、志趣、爱好与处世态度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究其实质而言，它反映了不同社会阶段，不同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各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各种不同利益无法协调的处世态度。最早对隐逸现象进行思索和探讨的是《后汉书·逸民传序》：“《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去易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矻矻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尘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这里可以说把隐逸作了系统的剖析和各种类型的归纳，称得上一部简明扼要的隐逸心理史。隐逸的表现形式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林林总总的隐逸则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有的是志趣所致；有的为全其道；有的是克服其内心的躁动；有的则出于安全的考虑……隐居的风气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非常流行的。本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人生道路是很狭窄的，可供选择者无非求仕和隐居两途。然而要求仕为官，在当时必须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有很高的门第；一是必须政治清明。而当时这两个前提对于周续之、刘遗民和陶渊明似乎都不太具备，所以三人都先后归隐。成为“寻阳三隐”。

刘遗民，原名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因为他不仕于宋，所以叫刘遗民。曾做过柴桑县令。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辞职，筑室于庐山西林，师事庐山东林寺主慧远，笃信佛教，写过《愿誓文》，表现了他对佛教的皈依和虔诚。义熙十年（公元414年）七月，加入了慧远发起的白莲社，为社中十八贤之一。卒于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著有《刘遗民集》五卷，今散佚，仅存书目于《隋书·经籍志》。刘遗民与陶渊明交往颇多，并有文字上的往来。结白莲社时他曾邀渊明入社，陶渊明没有加入。陶渊明有《和刘柴桑》、《酬刘柴桑》诗与他酬唱。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在今山西）人。先隐居于庐山，师事慧远，加入白莲社，也是该社十八贤之一。慧远死后，江州刺史檀韶、刘义符、刘裕等人曾请他出山讲《礼》，他应聘前往。萧统《陶渊明传》说：“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雒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他与陶渊明时相过从。所谓渊明示其诗，即《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相比之下，周续之的隐居是没有坚持到底的，他后来又出仕了。据《莲社高贤传》记载：“或问：身为处士，时践王廷，何也？（续之）答曰：‘心

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枯槁；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时号通隐先生。”其实，对于周续之的复出为官，也不必加以嘲笑。一个人的想法变了，是可以重新做出抉择的。陶渊明不是也五度出仕五度归隐么？对此不必以后人的眼光加以苛责。整个说来，陶渊明和刘遗民、周续之的关系是较友好的，当然，他和刘遗民的过从要密切一些。就是陶渊明对周续之虽有微词，但仍属善意的关心。“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谢诸子。从我颍水滨。”可以看出陶渊明宽于待友的情怀。当然，刘遗民的为官和隐沦与陶渊明更合拍一些：“禄寻阳柴桑，以为入山之资。未旋几时，桓玄东下，格称永始。逆谋始，刘使命孳，考室山藪。义熙公侯咸辟命。皆逊词以免”（《释元康《肇论疏》）。

沈约在《宋书·隐逸传》里说陶渊明归隐不仕是出于“耻复屈身后代”的考虑，那么——

### 陶渊明是东晋的遗民吗？

自从沈约把陶渊明归隐不仕说成是“耻复屈身后代”之后，陶渊明逐渐被后人打扮成了晋室的“忠臣”、“孝子”和“遗民”形象。萧统《陶渊明传》、《莲社高贤传》和《南史·隐逸传》都沿袭沈约之说，愈到后来，这种影响就愈加深广。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访陶公旧宅》诗中说：“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出。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况不起。斯可谓真贤。”比陶为耻食周粟的饿死守节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白居易的看法，并不切合陶渊明的思想和为人的。

沈约等人之所以认为陶渊明忠于晋室而甘心情愿地当遗民，主要着眼点是陶侃和晋王室的特殊关系。陶侃辅佐东晋，有大功于皇室，因而为东晋倚重。陶渊明是陶侃的后人，自然不会背叛乃祖和晋室。其实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首先，陶渊明本非陶侃嫡传，而他与陶侃的后人长沙公延寿已经关系渺远，早已出了五服之外。陶渊明既没有从陶侃那里得到过任何实际利益，自然也不会去为之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就是陶侃官至三公，还被温峤讪笑为“溪狗”，并非真正进入士族阶层，试想陶渊明会如此愚昧地去为那个等级森严的东晋守什么节么？

此外，从陶渊明的一生经历和他仕途坎坷来看，他在门阀制度和士族秉政的社会里壮志难酬，几乎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五度为官，历宦不过祭酒、参军、县尉、县令之类低秩小宦。辞官归隐之后，过着躬耕自食，辛劳艰苦的日子，而且还免不了受到饥寒交迫的煎熬，享受的是“爵同下士，禄等上农”的可怜待遇；这就是晋朝给他的恩惠！他对这样的朝代还有什么好感和依恋呢！用他的话来说，那么一个“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和“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的年代，他还会去为它的覆亡而唱挽歌和哀悼，甚而至于守节吗！

陶渊明对东晋并无好感，但是又似乎不希望它消亡的矛盾心态，这从他在东晋王朝覆灭之后所写的一些惋惜意味很浓的诗歌如《拟古九首》、《述酒》等作品就可以看出其有很明显的悼亡伤感情绪。然而，这种淡淡的哀悼和复杂的感受绝难升华为对晋朝灭亡的悲慨和不仕刘宋的气节！这是异常清楚的两性性质不同的感情。至于陶渊明对刘宋王朝，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的好感。他虽然曾在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前后做过刘裕的参军，但那也不过是稻粱之谋。待到刘裕篡晋自立，此时诗人已经56岁了。陶渊明不仕刘宋，首先是对新朝的不信任，同时，陶渊明已归隐田园十五、六年了，对政治和官场早已丧失了兴趣，此外，这时的诗人身体衰弱，长年无节制地大量饮酒，早已壮志蒿莱，雄心丧失。更重要的是陶渊明五度入仕与归隐，备尝了仕途的艰辛和人生苦难，对封建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压抑人材的积习已经有了较深的切身体验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刘宋政权尚存疑虑，不出来做官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东晋政权对陶渊明没有什么值得依恋的实际好处，刘宋皇室更是他根本不信任的篡逆。虽然他口中不说，却心里有数，正如鲁迅所说，“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魏晋风度及文人与药及酒之关系》）

他有什么办法呢？选择继续待在田园恐怕是最佳的途径了。一定要把陶渊明不仕刘宋提升到“忠臣”、“孝子”、“遗民”的高度，既缺乏可靠的依据，也实在没有必要。只是在一个看惯了“乱”和“篡”的诗人内心中仍然有着一些涌动，因而写了不少反映晋宋易代，感慨时变的文学作品。我们将在以下章节详加论列。

从陶渊明的诗文创作中知道，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知识丰富，学识淹贯的文学家。他自称“历览千载书”，诚非虚言。然而他在《五柳先生传》却说——

“好读书，不求甚解”，  
应当如何理解？

陶渊明的一生可以说是贫困潦倒的一生，孜孜以求的一生，好学不倦的一生，饮酒不节的一生。我们从他的诗文和与之交往的故旧亲明对他的反映、评价中不难认识到他学识的渊博，见解的精深和读书方法的独到与科学。应当怎样理解他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呢？这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首先必须注意到陶渊明的勤奋好学的精神，他特别喜欢读书，“历览千载书”，是说他在那个时代能够接触到的书籍都尽力搜求，窥览无遗。这是对他“好读书”的基本理解。而所谓“不求甚解”是引起后人争议的焦点。这里的“不求甚解”并不是说对书的内容不作深入的理解，而是说根据不同的内容作出与之适应的掌握。这里包含三层意思。首先，对于一个喜好广泛阅读，酷好读书的人而言，由于阅读面的广泛，他根本不可能把所有阅读过的每一本书，每个部分，任何细节都无遗漏地作深刻的理解和带创见性的认识，这既无必要，更不可能。因而只需把握其大要，理解其精髓就可以了。而且只对那些于自己有用的部份作这样的处理，其余内容不过泛泛涉及，作为信息和知识储藏起来。这句话的第二层意思是说陶渊明对所读的书，对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知识作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求其甚解，而对其余部份则毋须甚解。第三层意思是说对陶渊明对所看过的书既要深入钻研，反复思索，可又不盲目崇拜，迷信顶礼，不必对所有的凡是书中所说都求甚解。因为任何时代，任何伟人圣哲，在他们的书中固然有不少真知灼见，可也难免偏执和谬误。他们的见解必然受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科技文化的水准，以及个人看问题角度、高度等方面的局限。如果对所有传世的书籍，不加区别地一律求其甚解，且不要说这是任何人穷其一生精力和时间都无法实现的，而且必然被浩瀚的书籍所淹没，步入歧途。正如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一部分书内容的“不求甚解”，正是为了对其有价值，有创见，于自己有用和感兴趣的内容“求甚解”之故。“好读书，不求甚解”体现了陶渊明对孟子的话的创造性运用和个性化的发挥以及时代性的扬弃的宝贵经验。他迷恋书本，但不迷信古人；他崇尚先贤圣哲但不盲从。他对孔子仰慕之至，尊其为先师，一再地宣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先师遗训，余岂云坠。”但对孔子轻贱劳动，耻事耕作并不赞同，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而且自己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他对庄子无疑极为心仪，“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拟古》）可对庄子虚无思想，等贵贱，齐贫富的思想未必接受，“贫富常交战”是他现实的体验。这些足以证明他读书方法的科学和独特。

陶渊明时代的学习风气和研究方法显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脱离实际侈谈不着边际的名理玄虚，一是执著于书本迷信盲从。“好读书，不求甚解”显然对这两种倾向都是一种针泛，就前者而言，完全抛弃书本清谈竟日，言不及义，纠正的方法是“好读书”，使虚幻无恨的玄谈寻求必要的根柢。就

后者而论，对于汉儒遗留下来的章句之学，穿凿附会之风和寻求微言大义的做法更是一剂良药。经书上任何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生拉活扯总要找一大堆的材料去诠释、疏解、考证、辨析，一定要挖掘所谓大义，把简赅明了的内容搞得来失去本意，竟然不知所云了！真是“章句之学，剖碎大道”，是极为可笑的。陶渊明的这句话正是包含着对当时流行病的嘲讽和针砭。颜延之在评价他时也说“简弃烦促，就成省旷……和而能峻，博而不繁”。（《陶征士诔》）很能概括其个性。他这种个性表现在读书方法上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方宗诚在《陶诗真诠》说：“‘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盖深嘉汉儒之抱残守缺及章句训诂之有功于六经也。然又曰：‘好读书。不求甚解。’盖又嫌汉儒章句训诂之多穿凿附会。失孔子之旨也。”

我以为，陶渊明的“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是大可以提倡的。这实际上还涉及到阅读中的精读和泛览的问题。对于精读部分，自然会求甚解，作必要的发挥。泛览部分恐怕只能不求甚解了。按照当今心理学家对人类记忆的研究，指出人的记忆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天才都无法记住所有信息和内容，如果有意识把与自己关系不甚密切的内容遗忘一些，从而加深对自己有用而必需的信息的记忆，求其甚解，应当说是可取的。陶渊明的这句话无疑符合人的记忆特征的。

陶渊明是诗人、作家，而不是学者、研究家，他的读书目的显然是获取知识，汲取前人的智慧，丰富人生，着眼点是文学创作。这自然与那些皓首穷经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而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更符合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陶渊明关于读书的精彩部分还在“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会意，是指阅读过程中对阅读内容精髓的中肯把握和他的独到的体会。《周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王弼用《庄子·外物篇》中：“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衍化出了得意忘言的新见解：“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这既阐明“言”和“象”是得“意”的手段，要获得意不能舍弃“言”和“象”，但是二者却非“意”的本体，真正把握“意”虽然要借助于“言”和“象”，一旦得“意”后，就不要再凝滞于“言”和“象”了。陶渊明的“每有会意”，当然指获得了超越“言”、“象”之后的事物真谛，也就是玄学家所探究的宇宙本体之理趣。这即表现，陶渊明读书的方法是对书中具体“言”、“象”所传递的“意”的准确把握与深刻理解，舍其皮毛，得其内核的深入理解。有的人什么书都看，却什么体会也没有，最多只是积累一些浅表肤泛的零星知识，理不出体系，更谈不上任何见解了。难道不应当从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学习方法和独到见解中获取重要的启迪和反思么？能学到陶渊明这样的读书境界，自然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左右逢源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说是从其诗文创作出发的。指出陶渊明在读书过程中，不仅获取了题材和创作灵感，而且激励其创作情绪，坚定其创作意志，拓宽了文学创作的思路，是陶渊明成为历史上伟大诗人的重要条件（魏正申《陶渊明探稿》），也可备一说。



陶渊明不只一次他说“好读书”和“开卷有得”、“历览千载书”，好友颜延之称他“心好异书”，那么——

### 陶渊明主要读些什么书？ “异书”是指什么？

作为诗人和作家的陶渊明，他不仅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敏锐的观察生活、剖析人生的犀利眼光，而且，还从传统文化与前人的智慧结晶——书本中汲取了广泛的知识与营养，因而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现为丰厚的生活基础与睿智思辩。他的好友颜延之在他死后曾写过一篇《陶征士诔并序》，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陶渊明的思想倾向、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生活方式、读书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篇研究陶渊明的极为最要而又十分直接可靠的资料，今录于此：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岂伊时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级。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诡时则异，有一于此，而非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度量难均，进退可限，长卿弃宦，雅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壑，葺宇家林。晨烟暮蔼，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纠缠幹流，溟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讐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寔。年在中身，疚维痼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禱祀非恤，傖幽告终，怀和长别。乌呼哀哉，敬述靖节，式尊遗占，存不愿丰。没无求贍，省讎卻賻，轻哀薄敛，遭壤以穿。……

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筋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迁风先蹙，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叟音永矣，谁箴余阙，乌呼哀哉，仁焉而终。……

颜延之在序文中说陶渊明辞官归隐之后，过着“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絢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不仅勾勒了陶渊明的为人，更突出了他喜好读书的夙性。那么陶渊明究竟读了哪些书呢？对此我们只能从他的诗文创作中去寻求答案。当然，亲朋故旧及后人的有关资料也会提供一些线索的。

陶渊明确说“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游好在六经”（《饮酒》），“先师遗训，余岂云坠”（《荣木》），“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等，这些当然是当时文人所必修的儒家传统典籍《诗经》、《易经》、《书经》、《礼》、《春秋》、《乐经》、《论语》。此外，那个时代流行的《老子》、《庄子》和有关的史籍如《史记》、《汉书》等，以及《楚辞》、《淮南子》之类。这些书以外的野史丛谈、稗官笔记杂录之类，如《穆天子传》、《山海经》、《高士传》、《列仙传》、《列女

传》等杂说，大约就是颜延之所谓的“异书”了。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不仅喜好读书，而且非常注意有所心得、体会和收益。前面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把读书获得知识的乐趣看得胜过物质享受。不仅为之“忘食”，而且还欣欣然，他在晚年写给五个儿子的《与子俨等疏》中也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所谓“开卷有得”，当然是指他在读书时得到的启迪、智慧与收获，与《五柳先生传》中的“每有会意”是大体相近的读书感受，有了“会意”、“有得”，便欣然忘食了。其实，那时陶渊明已经归田多年，生活日见窘困，挨饿受冻时所不免，物质生活极端贫乏。可是，即或如此，他仍然把读书获得的精神享受视为远比物质享受更为重要，得之忘食而欣欣然，这是何等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一个饥饿的人，一顿丰盛的酒肉饭面就可以使他获得满足，而一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人要使他灵魂充实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无奈如此浅显的道理却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

如果把“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和“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以及颜延之的评价“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结合起来认识陶渊明读书，即可看出他不仅喜爱学习，博览群籍，且主次分明，尽得精髓的可取的学习方法。即重在领悟书中重旨妙理，不作繁芜考证，避免钻牛角尖的误区。尊重书本却不迷信；崇尚前贤更重视自己的发挥与创造。钻得进去，走得出来。这在章句之学盛行，阐发微言大义为时尚的年代确实是很有个性和积极意义的独特学习方法。也是对那些终日侈谈玄理，言不及义之辈的鄙弃。陶渊明的学习方法就是对今天的读者仍然不失为有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的。

陶渊明是他生活时代最具个性和颖脱不群的诗人。他的为人和文学风格也与晋宋之际的时代风尚相背离，那么——

### 陶渊明的性格和兴趣有些什么特征？

在历代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中，大多侧重于他的为人行事和诗文创作，这应当说把握住了重点，但是，对于他的性格和爱好，虽然有所触及，但却较为零星和分散。我们不妨将有关陶渊明的资料作一梳理，以便勾勒其轮廓。

在陶渊明诗文中，确实有一些涉及到他的性格与为人的作品，先看自传性的《五柳先生传》这篇“时人谓之实录”的作品吧：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与子俨等疏》：

性刚才拙，与物多违，……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征，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

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陈书辍卷，置酒弦琴。

萧统《陶渊明传》：

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

我们再结合陶渊明自己的有关诗文，可以看出：

首先，陶渊明是从小就有远大志趣的诗人，萧统说他“少有高趣”，他诗文中自抒怀抱之作我们已经在上文列举过了，就不再赘述。其性格特征是静闲少言，善于冷静思考（“闲静少言”，“偶爱闲静”）；其次他不慕荣利，情怀淡泊。尤其喜好读书“好读书”、“开卷有得”、“博学”、“有琴有书”（《答庞参军》），“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历览千载书”。性简淡刚直：“性刚才拙”、“廉深简洁……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待人讲信义：“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其质性自然真率（《归去来兮辞》及萧统传文）。

此外，陶渊明具有喜好山水林泉之趣，回归大自然的素性，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表白了他感受自然景物树木葱茏，鸟语啁啾的欢畅心情和他“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的喜好。尤其喜欢饮酒（不必举例）、写作和赋诗：“登高赋新诗”（《移居二首》），“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余园阁多暇，复染翰为之”（《闲情赋序》），“常著文章自娱”（《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对音乐非常爱好，“少学琴书”，“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安贫乐道，达观委顺，任真自得……总之，他是一个既好学习又喜饮酒；既闲静少言又有远大志趣；有大济苍生怀抱又酷爱自然山水；既性格刚直又随和诚恳；既率真恬淡又喜音乐；既有功业追求又安贫乐道的诗人。他的这种性格在晋宋之际显得较为灵活独特，这就是在反抗世俗，不满黑暗现实中保持了高洁的情怀和不凡的操守；而他的归隐则一方面是其不愿同流合污的现实考虑，一方面又有着独善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为人处世，对后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既有积极意义，又有负面效应。

陶渊明既然自称“质性自然”、“不慕荣利”、“箪瓢屡空，晏如也”、“忘怀得失”、“性本爱丘山”，可是——

### 陶渊明为什么要出来做官？

就陶渊明的本性和个人的追求来说，他确实是不慕荣利和忘怀得失的；也是由衷地酷爱自然山水，向往田园生活的。可是，他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是从祖祖辈辈就接受过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那热爱学习，性喜读书的习惯几乎与他的生活相始终，尽管处于极为贫困艰难的环境下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他的喜好，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精神追求。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读书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而且是学好本领，充实自我的唯一途径。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往往是工匠所为，受到轻贱，除了儒家典籍和史籍典章制度之外，作为读书人来说似乎没有更多的学习内容了。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和机会是非常单一的，那就是从政做官，来实现其济苍生，安社稷等政治理想和为国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而且，官做得愈大，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自身价值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实现其从政做官的愿望，这就需要有真正的本领和必要的文化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强有力的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方式（举荐、证辟以及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封建知识分子从政的重要目标。一个读书人决不可能无目的、无追求地去读书学习，一般都有明确的指向性——从政做官。“余岂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陶渊明遍涉各类书籍，“游好在六经”的奋斗，虽不能说他学习的目标只是为了从政做官，但至少不会排除从政意念的。自称“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赅”、“或大济于苍生……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这种壮且厉的志趣，思远飞高举的追求，济苍生的宏愿，慨叹不遇和奇名不立的苦闷，不正表明陶渊明的从政和为官首先考虑的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的宏伟目标吗？与他质性自然“不慕荣利”和“性本爱丘山”的喜好并不悖离，只是他人生追求多面性中的重要侧面而已。有良心、有知识、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政，不能说就是为了荣利和得失。更不能说与安贫乐道的精神对立。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始终把苍生社稷置于他考虑问题的首要位置，把社会责任感作为个人行为的准绳，结合自己建功立业的追求，这样的廉吏循吏在历史上（尤其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上古、中古时期）还是不少的。结合陶渊明的为人节操和他的人道廉洁的品行，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为官是清政廉明，不慕荣利和忘怀得失的，也是其安贫守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陶渊明来讲，他出来做官不能排除的是稻粱之谋，生存的必须。首先，他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小地主。祖上遗留下来的不过是“草屋八九间”和“方宅十余亩”。他没有足够的家资为其隐居提供充实的物质条件，自然只好以其所学售与帝王家，换取必要的代耕之禄了。这倒不是我故意贬低他从政的目的，且听诗人是怎样说的吧：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缗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 《归去来兮辞并序》

这当然是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最后一次为彭泽县令后挂冠归隐时的作品。诗人十分坦诚地表明自己家境贫寒，自己又不善于治生，供家养口，生活艰难才去做官的。陶渊明很诚实，他不掩盖自己的贫困。耕种几亩薄田养活不了一家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学的书本知识除了去从政为官之外，实在无法派其它方面的用场。尽管“见用于小邑”等劳务性浊官，为生存计，也只好就之。萧统也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陶渊明在《饮酒》二十之十九中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颜延之也是这样认识的：“毋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陶征士诔》）指出陶渊明出来做官就象古代的田过为养亲老而事君，毛义为了养活老母而入仕是一样的。

显然，陶渊明从政为官既是为了施展壮志，以逞大济苍生之怀抱；又是为了代耕之禄，供家养口的必需。自然，陶渊明从政之后扩大了生活视野，丰富了人生经历，积累了宝贵的社会经验，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生活的理解，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对社会的哲理思考，使他写出了许多丰厚扎实而又魅力独具的诗文作品，为晋宋文坛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生色增辉。对于此点，陶渊明本人在当时未必能意识得到，自然也就不是他从政的目的。

陶渊明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 393 年）29 岁时第一次从政为官，到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 405 年）他 41 岁时辞去最后的任职彭泽县令，前后跨越十三年之间。那么——

### 陶渊明为什么五次徘徊于 “仕”与“隐”的矛盾中？

陶渊明步入仕途，当然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是为了谋生养家的双重考虑。但是做了不久的祭酒官之后，很快就归田了。萧统《陶渊明传》说：“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根据萧统的说法是陶渊明“不堪吏职”，就是说他受不了繁忙琐屑的官场事务和迎逢上司，讨好左右同僚等令人心烦的“吏职”，这是一个把从政做官看成是实现大济苍生的宏伟目标的年轻人，简直没有料到入仕任职竟然那么琐碎繁杂，官场中上下级森严的关系，同僚之间的相互应酬和虚与委蛇……所有这一切似乎与诗人设想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和实现政治理想的目标用去太远！于是，他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萧统说得未免有些笼统，其实我们不妨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中去寻求答案。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门阀大士族把持国家大权的东晋偏安时期，这些统治阶层是极其腐朽无能的政治势力，毫不关心民主疾苦和国家统一大业与社稷安危的。在陶渊明 18 岁那年的“淝水之战”中，虽然以谢安等人为首的大臣正确把握时机打败了苻坚的百万大军，可是谢安不久死去，东晋始终没有把握住北伐的良机实现收复失地的夙愿。这样，政治上大士族垄断的腐朽局面和国土分裂，始终给门第不旺的陶渊明以极大的压抑和进身艰难的感慨。“世胄躐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的格局被视为当然，并且一代又一代地被肯定和继承着。陶渊明虽然做了江州祭酒这个并不算小的官，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他感到根本没有什么前景。当时官员的外迁，职位的授予根本不考虑个人的才能和品德，完全着眼于门第的高下。“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现实，陶渊明要有所作为实在太不容易了。这时他那“性本爱丘山”和“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一面显然占了上风，使他无法忍受拜迎官长、扭曲自我的生活，宁愿衣食不周，生活清贫也不再为官了。

当然，陶渊明的归隐还和他的世界观和世俗风气密切相关。我们从他的诗文作品及其为人中知道，他除了受儒家积极入仕思想的熏陶外，这个“心好异书”的人还接受了不少的老庄哲学的濡染和清谈风气的影响。就是儒家思想虽然强调积极的人生追求之外，也还认为应当审时度势和选择最佳而有效的切入角度来体现个人的追求与价值，“达者兼济，穷者独善”，“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概括了儒家重视人生追求，却并不执意为之的精神。当客观条件不允许从政时，退隐仍不失为一种人生追求。至于老庄哲学更是重视个人个性的发展与自身的适意，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概视作浇漓和虚妄，因而把人类原始社会的愚昧落后美化为至德、至治，从而否定现实社会和人的合理追求。陶渊明在思想深处受老庄这种愈原始愈美好观念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他在《五柳先生传》中标榜自己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以“无怀氏”、“葛天氏”之民而自乐。又在《与子俨等疏》中自谓是“羲皇上人”。加上那时社会上也很流行隐居避乱的风气，这些也会对他的抉择多一种考虑因素。如此的个性，这样的思

想，遇上仕途坎坷，官场巧伪，政治理想的失落，个性的扭曲压抑……除了归隐田园，恐怕没有更多的抉择了。

关于陶渊明从江州祭酒任上解职归隐，还有一说，那就是他出于门第观念的考虑。关于此点，拟在下文论及。

陶渊明从江州祭酒任上解职之后，在家闲居了五年多，到了35岁时（晋安帝隆安三年）又出来做过桓玄的幕僚。在他的诗歌中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前者中有“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可喜见友于。”表现了诗人行役之苦和急欲与家人团聚的心情；而第二首则是陶渊明的归隐之志一直萦系心怀抱白：“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夏何疑！”至于后一直中的“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已经明确地倾吐了向慕诗书自适，厌弃官场奔波，渴望隐逸闲静生活的志向。果然，大约于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他结束了桓玄幕僚的第二次仕宦生活，归田隐居。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不久又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分别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和《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纪其事。这两首诗中都流露出对官场不感兴趣和抱着走着瞧的态度，心中所系念的仍然是田园之梦和隐逸之思。前者如：“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后一首也有：“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表明陶渊明的为官时一心处两端的复杂心态。

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八月被任命为彭泽县令，十一月即离职归田，结束了他时断时续，前后跨越了13年的仕宦生涯。如果我们列一简表，大致情况如下：

江州祭酒（29岁）	桓玄佐僚（35岁）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	晋安帝四年（399年）
刘裕镇军将军参军（40岁）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	——转刘敬宣建威将军参军
彭泽县令（41岁）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	

综观为官前后的十三年中。他五次入仕五次归隐，这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是很典型的。既然他第一次从官场隐退之后，经历了六年的闲居生活，为什么又萌发了二次、三次、乃至四次、五次的从政冲动呢？这当然有生活上的考虑和政治上的追求等原因。从生活上来看，从陶渊明第一次归隐时的29岁，到第二次入仕时的35岁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经验的积累和生活负担的加重等非常现实的原因是他不得不考虑出来做官争取一定的俸禄来养活一大家人。此外，农事的艰辛和有限的家产，以及人生阅历和生活的磨难，使他对官场的“吏职”与“繁剧”增加了一些耐受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具有宏伟的抱负，总不能说初次为宦的坎坷便完全使他丧失



了政治上的追求和建功立业的愿望吧！他正是在这双重目标的激励之下，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尝试和努力。令人遗憾地是他始终没有调整好自我去适应那个无法改变的恶浊官场，最后只能选择“厚志薄身”，完善自我的个性与独立人格，以艰苦贫困甚至饥寒交迫的生存方式为代价走完了封建时代有志气、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的苦难艰辛的人生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陶渊明虽然五次从政而又五次归隐中，每次短暂的官场生活，自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和无奈，刚踏上仕途，就忆念着故园亲老，隐居读书的自适；从来没有在官场中寻求到适当的位置，永远在迷茫和奔波中，个性和人格受到煎熬，总是在呼唤田园梦幻。这种仕与隐的冲突，一心处两端的痛苦如影之随形，挥之不去，折磨咬啮着陶渊明的灵魂。只有在辞去彭泽县令，永诀官场之后，他才真正获得了精神放松，思想解脱，遂了夙愿，永远守住丘山。尽管这是以艰难痛苦的生活为条件而换来的自由闲适，可是他那“吾驾不可回”的决心是那样地坚定执着，令人崇敬。

陶渊明的仕宦生涯以辞去彭泽县令而结束，从此过着躬耕读书的隐居生活，这虽然只是他个人的选择，然而——

### 陶渊明的归隐有什么重要启示？

陶渊明从 29 岁起“投耒去学仕”，到 41 岁毅然决然地辞去彭泽县令，五度出仕，五度归隐，起伏变化，反映出诗人深沉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内心的痛苦，这一特殊现象究竟蕴含着什么启示呢？对此确有必要作一探索。

陶渊明的仕宦经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具有抱负和追求，但又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了。他以热血沸腾的情怀，抱着少年壮激与思远翥的猛志，急于干一番大济苍生的事业的愿望，美好而宏伟的政治理想去干预生活，直面人生。可是，由于社会的黑暗，政治制度的腐朽，门阀士族的把持，已经完全堵塞了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之门，这就是他在诗中所描绘的“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和“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可怖情景，加之诗人质性自然的品行，耿介而不合流俗的为人，因而每次为官之后不久，就只好自免官职而归隐。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也深知官场不是想象的那般美好浪漫，因而，他进入官场之后并非一遭挫折就心灰意懒，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反之，又一次次地说服自己去进行尝试、努力。多次努力试图尽最大限度地调节自我去适应官场，尽可能地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事实证明陶渊明的自我节律失败了，他根本无法弥合既要完善自我又要适应其时官场的矛盾；他虽然尽最大努力地把理想目标变得更加现实，可也与当时的社会仍然不能合拍，最后还是被迫放弃政治理想，去走一条他内心并不情愿的归田隐居生活道路。陶渊明的这段人生经历，包含着如下的意义。

首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是他接触社会，体验人生，认识现实政治，了解官场内幕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从政归隐的经历，他是绝对不可能对他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政治有切身的体验与本质的认识。如果陶渊明家境优裕，他优游于山水林泉固然可以深刻而悠闲地对大自然秀美诱人的景色作出传神描绘，但是，绝对不可能在山水田园诗章之中融入人生哲理和社会体验，因而也就缺乏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由于陶渊明五度进入官场，身体力行于官场中，与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交往应酬，和各种各样的官员共事周旋，对官场中的虚伪欺诈的认识，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伎俩的感受，丑恶肮脏本质的体验都有了直观而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生体验与比较，加深了他对官场的厌弃和对大自然山水田园的喜爱，铸融了他那些讴歌大自然秀色，称美田园美景诗歌的深厚内涵，使之具有永恒深隽的魅力。

其次，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并序》里检讨了自己几次从政是“以往之不谏”，实则他的这种认识和体会正是做了几次官之后的思想升华，“今是而昨非”的反省也是实践之后的认知。他真正认识了社会，认清了自我，才有“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这样总结性的反思。把自己五次从政原本希望将政治理想和谋生结合起来的初衷作深刻的审视，终于看清楚了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冷峻的现实面前必然碰得粉碎！要想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被扭曲，政治追求得以实现，在当时这是完全无法统一起来的。这即表明，陶渊明要么在那个昏暗腐朽的官场之中，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品性，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扭曲自我去迎合达官

显贵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要么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质性自然的夙性，洁身自好，独善其身，隐居田园去过寂寞贫困的生活。处在政治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动乱年代，如果不能心安理得地作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大约也只能激流勇退地选择归田隐居了。这就是陶渊明隐居所昭示的意义。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和谋生手段主要是通过跻身官场以实现其建功立业的追求，并同时获得君王之禄。当然也有那种家境富裕的人不必为生计而担忧。陶渊明隐居不仕，那么——

### 陶渊明靠什么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十一月辞去彭泽县令之后，虽然也曾受到过征辟，但是，一直隐居在家，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了。直到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辞世为止，躬耕田园达23年之久，约占他一生的时光中1/3强。如果把陶渊明29岁从政以前的岁月和他五度仕宦中间的间断赋闲加在一起的话，他隐居和赋闲的时间竟然超过五十多年，真正在官场中的岁月不过几年光景。我们不竟要问，陶渊明除了做过五任短暂小官获取一些俸薪之外，他是靠什么生活的？

陶渊明虽然是东晋名臣陶侃的曾孙，但是时代渺远，况且又非陶侃的嫡系，因而陶侃的家资田产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继承和沾润的。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曾做过地方官吏，可是留给陶渊明的家产已经相当微薄了。我们从他的诗文中屡次感受到他的贫困：“畴昔长苦饥，投来去学仕”（《饮酒》），“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缍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并序》）萧统也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陶渊明传》）但是，陶渊明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彭泽县令不做，他靠什么生存呢？我们从他的文学作品中知道他有一些田产和屋宅。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田园居》）还有田园桑林：“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杂诗》）他的田亩据诗文中可知有“南亩”、“西田”、“下渚田”和“西畴”（或许就是西田）几处。而且，陶渊明要求不高，极为简单清苦的生活所需，只要不遇着天灾人祸是比较容易满足的，据诗人讲只求吃得饱，并不追求食物的精美，衣着也异常简朴，冬天有御寒的粗布，夏日有粗疏的葛麻布就满足了。由于陶渊明有少许薄田和必要的居室林园，因而，在风调雨顺，收成较好的年头他的日子还是差强人意的：“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羨。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他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悠闲地看书抚琴，饮酒赋诗，田园中出产的粮食蔬菜能够供一家人的生活还略有结余，生活虽然清淡却还充满欢趣。他在《酬刘柴桑》诗中也说：“新葵郁北牖，嘉穗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发远游。”诗人看着自己种植的新葵菜生长茂盛，田中的稻谷结穗丰满，预示着收成的可观，因而心情畅惬，生出了带着妻儿远游散心的意念。

陶渊明除了靠薄田耕作度日之外，他还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教授门生、开展“讲习”活动。他在《感士不遇赋》序中说：“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表明他不定期地接受门生，传习知识，这在封建时代是常有之事，象晋代的霍原、杨轲都有传业弟子几百，而陶渊明这样的名流自然从者甚众。这样的讲习自然也有一定的收入补贴家用和饮酒之资。此外，他还不时地接受一些故旧亲朋的资助或馈赠，如颜延之路过陶渊明家乡时，就曾经送过二万钱给他。至于那些慕他的名来谒访他的崇拜者也间或向他赠送一些酒肉食物，象江州刺史王弘既请他去宴饮，又送过酒食给他。鲁迅在论隐士的文章中曾经

说过：“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屨，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士，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会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的确，陶渊明一方面家境并不宽裕，但是他做过几任薪俸不高的小官，也不会有多少积蓄，全家人的生活当然主要依靠田产所出。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一方面表露了家中的贫困，但他仍然还有“僮仆欢迎”的场面。他靠耕读、讲习和友人资助作为其归隐之后的生活来源。不过以田产收成为主，讲习、资助为辅罢了。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就一直隐居在乡间，如前所述，他主要依靠躬耕自资，业余从事一些讲习活动，偶尔也接受友人的资助，那么——

### 陶渊明隐居之后的生活如何？ 怎样认识他在诗文中描绘的贫困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隐之后，完全断绝了与东晋政权的直接联系与经济往来。这对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失去了从政为官的机会如果祖上有丰厚的家业，那完全可以靠田产庄园的出产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但是陶渊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他的隐居生活是充满着艰难和苦涩的。首先，陶渊明的家业是很不富裕的，他不过靠几处田亩的收成为主要生活来源。供养的人口既多，农业收成又很不稳定，靠天吃饭几乎是中国古代农民的普遍规律。如果风调雨顺，收成较好，他的生活是可以过得较好的。反之，遇上灾荒，境遇就很艰辛了。加之他的住宅，两次遭到火灾侵害，家庭经济急速恶化，以至于出现了以船为宅，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况：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  
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  
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  
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  
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  
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  
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本来家境就不富裕，遇上火灾，情形更糟，他只能仰想上古时代东户季子的情景从精神上求得些须慰藉。早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就表现过他的穷困：“箪瓢谢屡设”，试想这样的条件加上火灾的肆虐，日子是何等的艰辛。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对自己贫困乏食日子难熬的心情刻划得异常真切：“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螣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悽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诗歌用怨诗楚调为篇名，表现了诗人对时事和自己处境的哀怨和感伤。这里，陶渊明对所谓的“天道”发出责问和疑虑，为什么自己的身世和遭遇竟是这等不幸！身逢乱世，中年丧妻，屡遭火灾，蝗虫为害，收成锐减……天道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为什么善良的人会遭此不幸！更为严重的是饥寒交迫，生活竟然到了长天白日挨饿，无衣无粮的境地！到了晚年，这种贫穷景象更趋严重了：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

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有会而作并序》

这是垂暮老人陶渊明 62 岁时的作品，是他经历了 20 多年艰苦田园生活，受尽贫困折磨后的内心剖白。如果不是到了衣食困难，谋生无计，极端艰辛的地步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诗句和内心感受的。诗人坦诚地倾吐了弱冠以来贫困几乎就象挥之不去的恶魔一样，随时纠缠着他。诗人对生活的要求是那样的低，只要有豆麦之类粮食能填饱肚子就很满足了。可是这些原本极普通的生活用品对于贫穷潦倒的诗人来说却是何等的珍贵与艰难啊！由于陶渊明对饥饿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才对不食嗟来之食的人表示了不同的见解！这是何等沉痛而辛酸的诗句啊！这个在高官厚爵下不动心的自负诗人，曾经抱着“吾驾不可回”的信念，却无法获得一个人生存必需的粮食等用品。根据现代医学家的研究，人要生存下去必需维持最简单的基础代谢，然则这些极普通的物品对贫穷的诗人来说比奢侈品还宝贵！最后诗人竟然写出《乞食》诗：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对于陶渊明隐居后的生活，几乎是所有研究陶渊明的人必须涉及的内容；而对于陶渊明诗中反映的贫困悲惨生活的认识，由于研究者的角度和个人的见解的不同又呈现出诸多分歧。近人梁启超说：“寻常人叹老嗟卑，无病呻吟，许多自己发牢骚的话，大半言过其实，我们是不敢轻信的。但对于陶渊明不能不信。因为他是一位最真的人。我们从他全部作品中可以保证。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他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梁启超的见解有一定的依据，但是结论是不全面的。对此鲁迅先生说过一段话（见前），认为陶渊明有田产、有仆僮、有生财之道，因此生活是不成问题的。我认为他们的话都有道理，但是都不够全面。我认为陶渊明言穷的诗句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他在隐居之后时常读书抚琴，饮酒赋诗，甚至宴饮……也是实情。应当如何认识呢？其实只要把有关陶渊明的生活情形的资料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之后，梁启超和鲁迅的话就都可信了。对此我们不妨把陶渊明隐居之后的生活分期考察。陶渊明归田前期，由于刚从任上解职，此时既有田产房宅又有一定的薪俸积金，生活是较优闲舒适的。因而他才能有酒喝，有菊采，有读书抚琴的闲情，赋诗旅游的雅兴。可是，到了归隐的后期，一是陶渊明本人年事渐高，长年饮酒成性对身体的损害，加上火灾的屡次侵暴，五个儿子也不善谋身，庄稼没有种好，灾害倒很很频仍……这样日子自然愈来愈艰难了。他那些言及自己贫穷的沉痛诗句如《乞食》、《有会而作》等就是晚年一贫彻骨的写照，梁启超自然从晚年的陶渊明的生活立论的，而鲁迅先生又较多地着眼于陶渊明隐居的前期生活。这些言及贫困的诗句显然比此前的《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及《怨

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沉痛、辛酸得多，如此分段考察认识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我想会更中肯准确一些。

也有人认为在陶渊明 142 篇诗文中，述贫作品占了四分之一，指出其中或托贫言志；或述贫表出处之态；或借贫抒怀。认为除少数实写窘境篇外，大都寓借深沉，表达了诗人兴亡治乱之慨。（魏正申《陶渊明探稿》）也不无道理。



陶渊明五次从政又五度归隐，并且在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就一直居住在农村。那么——

### 陶渊明亲自参加过体力劳动吗？

陶渊明虽然是东晋大臣陶侃的曾孙，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地方官吏，但是他却是生于农村，长于田园。近人古直对此作过些考证，他的结论是：“先生里居，旧说多不能僚，余尝攻之。先生盖少长栗里，迁居上京，再迁南村终焉”。（《陶靖节年谱》）而这里所说的栗里、上京和南村都在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的农村。可以说陶渊明确自幼生长于农村，对农业劳动耳濡目染，异常熟悉。尽管他的家庭环境和他接受的传统教育与农村劳动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对于一个一直生长在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对农事劳动却不陌生。当然，话又说回来，对劳动不陌生并不等于他就身体力行，直接参加劳动。陶渊明真正与农事劳动发生关系，并且躬耕力作，那是他几度为官之后，归隐田园的事情。不过，他在出仕之前也曾做过一些轻微的辅助性劳动。比如他在出任江州祭酒之前就有过一些劳动经历：“畴昔长苦饥，投耒去学仕”。他在39岁时写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对他的劳动生涯有所回顾：“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是陶渊明已经有过仕途经历但又还没有绝意从政而赋闲在农村时写的诗歌。诗人回顾了自己与劳动的关系是从政之前基本上没有认真地从事过农事劳作，“竟未践”是诗人的自述，当然是可信的。由于赋闲归田，没有薪俸来源，因而才产生了“屡空”贫乏的体验，为了生存参加农业劳动自然不可避免了，也才有“转欲志长勤”的认识和“秉耒欢时务”、“耕种有时息”等体力劳动的描写与体验。在《劝农》诗中，诗人虽然以旁观者的身份阐述自己对农业生产的见解，但其中必然有对劳动身体力行后的体会和认识：“气节易迈，和泽难久。冀缺携俜，沮溺结耦……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担古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如果说在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之前参加农事劳动仅仅是短时间、间断性的轻微劳动的话，那么他与仕途诀别之后，归隐园田的二十多年期间进行农业劳动和田间耕作恐怕就是不可免的内容了。虽然他似乎也有僮仆帮他干一些繁重的主要农活，相信他的五个儿子也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耕作，他自己也应当是劳动者的一员吧！比如他归田之后的《归田园居五首》中就有“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前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些对农作物长势的关心，对庄稼收成的企盼，对耕耘播种，田间管理的描绘，农事艰辛的体会……莫不表现了诗人作为陇亩民后的情感世界的变化和与之交往的人言谈内容的更新。至于陶渊明于义熙六年（410年）四十六岁时写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更把他参加农业生产几年之后的心情与认识表现得更为充分与典型：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展出肆微勤，日入负未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对农业劳动的艰辛和农民在当时条件下对社会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了，指出了“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的道理和自己参加劳动当然劬劳艰辛，肌肤疲惫，但是比在动乱时代置身官场还是要安全适意得多的。由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之后，一直心安理得地躬耕自食，而且还有“但愿长如此”的想法，屏绝了利禄功名的诱惑，在繁重艰苦的农业劳作中逐渐净化了他那曾经躁动而矛盾的灵魂，“一心处两端”的惶惑，因而在他 52 岁时写的《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农事诗中心境那样平静，态度如此务实，追求那样简朴。在生活和劳动方面，已经看不出他与普通农夫有多大的不同了。要说不同，就是他还能用质朴平淡的诗句写出从事农业劳动多年后的认识和体会吧：

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  
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  
杨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  
日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遥谢荷翁，聊得从君栖。

诗中“贫居依稼穡，戮力东田隈”的认识；“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的担心；“饥者欢初饱”的人生体验；“悲风爱静夜”的感受……把一个曾经有着既壮且厉的有追求的诗人折磨得如此务实和平静：他力耕勤作，至老不懈，所希冀不过是温饱生存！然而“天道”确实太幽昧了，诗人如此简朴的要求甚至也还难以实现！

通过以上诗句的疏解，可以肯定地说，陶渊明隐居田园之后，参加劳动是免不了的内容。否则他很难写出上述体会很深、认识独到的诗歌来的。除了参加必要劳动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陶渊明毕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事业心和人生追求的诗人，他虽然多次从政部以失败而告终，可并不意味着他对现实的淡忘，对政治的冷漠。他不可能象一般的农民那样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农事之上，只留心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他必然是一个有丰富精神生活和人生追求的文学家、诗人。他归隐之后，首先要考虑全家人的“生

生所资”，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他的精神生活显然会因此而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仍然思绪万千，创作冲动到辞世前夕都未停止过。归田之后大量的诗歌和文章是他丰富内心世界的部分物化（不包括散佚作品和没有及时写下来的冲动、闪念）。颜延之的《诔》文留下了陶渊明赋闲后生活的部分内容：

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絢纬萧，以充粮粒之费。

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

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

旧，葺宇家林。……陈书辍卷，置酒弦琴……

如果结合陶渊明的诗文，可以归纳出他归田之后，除了必要的农务劳动之外，主要是读书（“心好异书”、“流观山海图”、“好读书”、“开卷有得”）、饮酒（不必举例）、弹琴寄兴（《置酒弦琴》、“委怀在琴书”、“起卧弄书琴”）赋诗，与志同道合者诗酒唱和赏析（“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佳日旅游（“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等等。

虽然陶渊明隐居之后，足不出百里，就在故乡一带盘桓留连，但生活却不单调，尽管有时也免不了贫困匮乏，可内心十分充实。他那留存至今的142篇诗文中，就有90余篇写于归隐之后。从这简单的统计数字中，不难窥探陶渊明归隐之后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感受和人生体验。如果再把写于归田之后的作品拿来和他前期作品进行比较的话，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作品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造诣都卓然高于前期诗文。这固然是创作历程中成熟阶段的辉煌，却也是心路历程的深层睿智的表征。

陶渊明隐居归田的生活方式和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对后世文人的出处行藏影响颇大。后代文人或因仕途坎坷，或因与当政者政见不一，或被现实压抑，或遭排挤打击……他们尽管各自的背景与自身条件的不同，但都仿效陶渊明一样以隐居自适为依归，然后隐居读书著文、饮酒高会、优游山水林泉……但有一点却是他们所不能做到的，就是大多不会象陶渊明那样去躬耕劳作，大约都有买山隐逸之资吧。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谓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那么——

### 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是什么意思？

对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向督邮低头的事情有两种理解。一般人认为，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职位低微，俸禄很少。“五斗米”是官俸，所谓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然是说他不能为了异常微薄的收入，竟然向来县检视的督邮束带盛服，躬谨参见，接受诸种问讯审计，繁琐无聊的迎送礼仪。缪钺先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认为“五斗米”和当时县令的俸禄绝无关系，他认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如同说“我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向乡里小人”。这和传统解释稍有不同。总之，如果不接受朝廷的俸禄，也就用不着为那“五斗米”去逢迎和笑颜卑膝了。

但是，关于“五斗米”的理解。有人指出这并不是指县令的官俸，而是指当时流行的一种“五斗米道”的代指，因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内涵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逯钦立先生在《关于陶渊明》文中，不仅把五斗米理解为“五斗米道”，而且认为这句话根本不是嫌县令收入的低微，而是另有所指。反映了陶渊明的门第观念和他对待做官问题上的思想倾向。逯先生指出：“他（陶渊明）第一次出仕当江州祭酒，是在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二十九岁的时候，这次当祭酒，《宋书》本传上有记载，说是‘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他的《饮酒》诗也提及过：‘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他的这次出仕，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参看吴廷燮《东晋方镇表》）是东晋著名的门阀世族官僚。而他的职务——州祭酒——又不同于一般祭酒。据《宋书·百官志》，这个江州祭酒，又叫别驾祭酒，职权很大，‘居群僚之上’。这个祭酒职位，据《宋书·百官志》、《晋书·成帝纪》和《王凝之传》，是东晋咸康六七年间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才设置的。祭酒的设置可能与王氏的五斗米道有关系。陶渊明充当门阀世族的僚佐，又是高等职位，为什么感到‘多所耻’，‘不堪吏职’呢？为什么要‘少日自解归’呢？这在千百年后是不容易解答的。幸而还有史传记载透露出这次解职的真实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不屑于向门阀世族王凝之这个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节。

《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莲社高贤传》同）他的这句愤慨的话，《宋书·陶潜传》和《南史·陶潜传》都作‘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文字稍有出入，意思却是一样的。这句话翻成现代口语，等于说：‘我过去不能为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今天还能诚诚恳恳地侍候乡里山人！’陶渊明说的这句话是老实话，发自内心的话，是为了表示看不起寒门庶族出身的督邮，才摆出看不起门阀世族五斗米道王凝之的事实。从当时的态度回溯到过去，以过去的历史来强调当前。不难理解，既非门阀世族出身，又是东晋元勋贵族后代的陶渊明，对于寒门庶族和门阀世族都存在着矛盾，他傲视寒门庶族的督邮，也傲视门阀世族的五斗米道徒。正是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思想言行。所以，做江州祭酒，他感到‘志意多所耻’，‘不堪吏职’，只好‘少日自解归’。过去我

在《读陶管见》一文里讨论到这个问题，读者可以参看。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件事，长期以来为后人所推崇，认为五斗米是官俸，不为折腰是不向督邮低头，把陶渊明看作是对抗权贵的典型人物。经过考查研究，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既然牵连到王凝之，牵连到陶渊明本身的阶级地位、阶级意识，反映了东晋元勋贵族子弟同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那么，折腰与否无非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冲突问题，也就应当重新估价其历史意义了。”

“逯钦立先生的论证不为无据，他把“五斗米”理解为“五斗米道”，虽然只是增加了一个字，然则这个字却是关键性的主要修饰对象“道”，如此以增添字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字的方法来理解史传是有一定危险的。如果没有其它的有关资料作旁证，这样靠添字作为证据，又是孤证，成立是困难的。此外，如果如逯先生所论，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道下腰鞠躬，那他为什么明知江州祭酒这个职位较高的官是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才设置的，并且又与王氏五斗米道有关系，他还要去就任呢？此外，把陶渊明理解为既傲视门阀世族，又傲视寒门庶族，他仅仅凭借与自己关系已经十分渺远的东晋元勋陶侃这样的背景，会有如此的心态么？对此不免难以说通。

我倒认为，把有关陶渊明的几种史传记载和其它资料参合起来看，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含意，仍然是不能为了那样微薄的薪俸五斗米去向官场上那些面目可憎语言不投的趾高气扬之辈卑躬屈膝。因为所有关于陶渊明的各种史传及其它的记载中，没有任何一种资料有“五斗米道”的意思和记载。当然逯先生是研究陶渊明的专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惜乎先生早已作古，无法向先生请教。逯先生的见解也可备一说。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陶渊明为了“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这句话，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后，他完全断绝了与朝廷的正式联系与经济关系，过着依靠并不丰厚的祖上田产和自己参与必要的劳动的生活，由于遭受意外的火灾和自然灾害的侵暴，生活变得异常艰辛贫困。这种为了理想的崇高和人格的完善而遭受的生活折磨，后人有些是不理解的。王维由于仕途和家境都与陶渊明有很大的差异，他对陶的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很有微词，认为那是“一惭之不忍”而招致“屡乞而多惭”，并且批评陶渊明以一时之意气，忘却了君子应有的“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使命（《与魏居士书》）。这样的见解自然不能代表王维对陶渊明的整体评价，其实他在一些场合对陶是很推崇的，对他的归隐也是认同的：“不厌尚平婚嫁长，却嫌陶令归去迟”（《早秋山中作》），“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送六舅归陆浑》），然而，王维对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认识未免忘却了陶渊明和自己不同的背景，也有为自己“朝隐”寻求理由之嫌，展示了二人不同的人生理想与操守节慨。

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时期的清谈是很著名的，人们都知道清谈是从东汉末清议演变而来，那么——

### 魏晋清谈主要谈论什么内容？ 对陶渊明有何影响？

魏晋清谈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一种反映，它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的社会崇尚和时代风貌。《文选·晋纪总论》对当时的清谈崇玄之风及其影响有简要的概括：“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俭；行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机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这既表明，清谈之风已经形成了一个支配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潮。清谈的主要内容当然是老、庄哲理和道家思想。清谈又叫“玄言”或者“清言”，所谈论的核心是谈士们对“玄”和“道”的理解，剖析其间深层奥秘的玄理，是谈士的宇宙观、人生观、本体论以及生活、容止、言语、风度等诸方面的内容，多半都是浮薄虚幻，玄远涉冥，名理高深，不着边际的议论，丝毫不触及实际问题，以不婴事务的玄远为清高，反而耻笑那些务实能干的人为俗吏。他们辨析的玄道名理，往往通过机敏巧言，空远渺冥的思辩，超越于具体的物象之外，去探讨玄奥莫测的妙理，探求所谓宇宙本体之理和自然造化之旨趣，表达极为抽象的概念。清谈的方式常以主客相互的问论诘辩，间或也有“自为客主数番”的办法，以求达到“名通”的“胜理”。比如，《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一段：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问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座所不及。

谈士们追求的是“胜理”，名辨玄虚当然受到重视。所谓清谈，所依据的是玄学，具体所指是所谓的“三玄”——《易》、《老》、《庄》。但是《庄》的内容比《老》要偏重些。何晏是玄学的始祖，王弼也是与之可称伯仲之间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清谈家也是玄儒兼综的，何晏、王弼除了热衷于玄学之外，前者尚有《论语集解》，王也有《论语释疑》。由何、王导其先，两晋玄风大炽，身居要职的王衍、王导、庾亮等人都崇尚清谈。作为丞相的王导，他的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清谈家。《世说新语·文学》载：“（王导）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浩）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风行草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居要务的重臣耽于清谈，朝野刮起一股强劲持久的清谈之风。它必然会对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如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文学等多方面。玄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是《文心雕龙·时序》中所指出过的“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

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以及《诗品序》所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这使当时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浓重的玄风阴影，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谈玄崇尚玄远，追求胜理，喜欢以超越具体物象的抽象的思维去把握深奥的道理的方式……这些对于文学审美新观念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就陶渊明的文学创作而论，他显然汲取了玄学家凌驾具体物象之外的思维方法，使他的诗歌既具自然之美，又富真朴之质；平淡之中不乏玄远，朴茂之余又有不少的灵秀之气；形似中充满神韵；恬淡语言中又饶有机理。虚实相间的状物手法。动静结合的刻划方式，自然是受到了玄谈风气积极部分对之的浸润。关于陶渊明的美学思想。我们将有专题论及。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那么——

### 陶渊明为什么那样酷嗜酒？

在陶渊明的传世诗文作品中，的确有不少的作品言及酒或者专咏饮酒的。但是，是否真的就是“篇篇有酒”？这是需要作一番考辨的。据粗略统计，并非如此，在陶渊明的142篇诗文中，凡是说到饮酒，或者与酒有关的作品共有56篇之多，几乎占了他作品的近半！百分之四十强，这个比例是惊人的，因而才给人们造成“篇篇有酒”的印象。

酒是一种特殊的饮品，是由多种粮食经过特殊的发酵蒸馏而酿制成的，给人以精神刺激，产生美的享受和醉的体验。这种饮品与文人的关系异常密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中的不少人都以狂饮酗酒而又文采风流著名于世。曹植本以过人的资质与卓异的才华深受曹操的器重，并想将其立为储嗣，正是由于他的狂饮滥醉使之失去了曹操对他的宠爱与信任，“饮酒不节”，差点儿被曹丕构害。大文人孔融经常宴集豪饮文士，还带头反对曹操的禁酒令；阮籍、阮咸“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世说新语·任诞》）刘伶的昏饮更为惊人。此前的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不少的篇什言及美酒佳肴、及时行乐的人生追求，……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风气和文人积习，必然对陶渊明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代著名的陶学专家逯钦立先生还把陶渊明关于酒的56篇诗文按写作年代的先后排列，指出陶渊明的饮酒生活“从39岁到60岁应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39岁到50岁，这十一年是他纵情酣饮的主要阶段。39岁那年秋，他‘偶有名酒，无夕不饮’，继续不断地‘酣饮赋诗’，写了20首诗，以《饮酒》名篇。40岁出为镇军参军前夕，写了《停云》、《时运》、《荣木》和《连雨独饮》。42岁由彭泽归来以后，写了《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从45岁到50岁，所写诗篇仍然反映他的纵情酣饮。不同于前的是，这些诗篇表露出作者是如此感到人生无常，要求及时行乐，以酒消忧。代表作品有：《己酉九月九日》、《游斜川》和《杂诗》的第二首。

第二阶段，从51岁到57岁。这7年是他家贫缺酒，亲友招饮的阶段。51岁，陶渊明的耕田生活日益艰苦。这时他的疟疾（疟）一度加剧，几乎死去，真是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在病中他写了《自祭文》和《拟挽歌辞》。《拟挽歌辞》和他约在54岁写的《九日闲居》、56岁时写的《岁暮和张常侍》都流露出缺酒的悲叹。而57岁写的《于王抚军座送客》诗，则又是代表着他被官吏招饮的作品。

第三阶段，六十岁以后。这是他重新得过酣饮生活的阶段。宋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陶渊明的酒友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路过寻阳，送钱二万给陶渊明。陶渊明将这笔钱全部交给酒家，零碎向酒家取酒。……《陶集》现存的两首《答庞参军》诗，一为五言，一为四言，都是这年写的。诗云：‘我有数斗酒，闲饮自然欢。’又云：‘我有旨酒，与汝乐之。’说明垂老的陶渊明又在‘酣饮赋诗’了”。（《关于陶渊明》）

为什么陶渊明那样嗜酒呢？这当然与他的个人爱好有关。他一再声称‘性



嗜酒”。根据萧统的理解，陶渊明的饮酒是“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那就是说，以酒消忧，借饮酒来抒发其胸中的不平之气。如果把《饮酒》诗前的序认真研读：“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醉无诮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表明陶以酒消闲，醉后题诗的心态。而《饮酒》诗的结句更明确吐露“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显然陶渊明对黑暗现实和腐朽政治极为不满，对丑恶现象，战乱杀伐，篡夺凶残的闹剧深恶痛绝，激荡于胸，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高压政治又不容文人倾吐抨击现实的见解，于是只好托之于酒，以酒后的醉言来解脱其愤懑，用醉酒来保护自己。因为乱世文人，很少能有好的下场，稽康被杀，阮籍却巧妙地用醉酒躲避了政治迫害。据《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前车之鉴，后人能不慎吗？陶渊明与稽、阮时代相去未远，他自然懂得怎样既能倾吐内心的牢骚，又要免于伤害的办法。“君当恕醉人”自然就是一把巧妙的保护伞了。宋人苏轼《书陶渊明诗》说：“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真是说得精辟之至，准确地把握住了陶渊明托言饮酒的深切用意。这种以酒为遁词的办法，宋人有所认识：“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苕溪渔隐丛话》）可谓知言。

当然，不能把陶渊明的饮酒一概视为“寄迹”、“避祸”。他归隐之后，显然已经和晋室没有多少联系了。劳动之余小饮消乏，与邻里交欢一面叙友情，一面饮醇酒，享受生活的乐趣。这种情况下的饮酒十分开心惬意：“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以及“故人赏我趣，沽壶相与至，班荆坐树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觴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在这些言及饮酒的诗篇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丝毫的“避祸”的影子。劳动是辛苦的，心情是舒畅的，身心的放松无过于劳动之余与邻里友好以酒消乏，与友叙旧沟通，充分享受悠然无挂碍的生活乐趣。这样的作品在陶渊明的关于酒的诗篇中占的比重是不少的。

总之，陶渊明那样嗜酒成性，除了因为本身就喜欢饮酒的原因之外，他那种借酒发牢骚之意，评论时政的作品有着深厚的现实意义，表现了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寄酒为迹”之作；而不少的言酒之作又体现了劳动之余与友人邻里的小饮欢欣。当然，也不能排除借酒浇愁，及时行乐的消沉颓丧。作为社会化的陶渊明，他的饮酒也折射了他的复杂心态和苦难人生历程，也是情理中之事。

## 二、交友审美之谜

生活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除诗文创作之外，还有一些爱好，那么——

陶渊明有哪些主要的爱好？

“蓄无弦琴一张”是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文学家的陶渊明，他的第一爱好，不消说是文学创作了。他留下的那些思想深邃，艺术魅力独具的诗文一直受到后世读者的喜爱，就是明证。此外，他最喜欢读书，用他的话来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历览千载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颜延之称他“心好异书”……与喜欢读书相并重的是“性嗜酒”，在他的传世之作中几乎占了一半的作品言及饮酒（已详前）。喜欢登山游水，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自称“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命室携童弱，良日发远游”（《酬刘柴桑》），“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

在他诸多的爱好中，最值得注意是他对音乐的入迷，并且具有较高的素养。他自称“少学琴书”（《与子俨等疏》），把琴与书置于并重的地位，而且屡见于他的诗文中，如“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答庞参军》），“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颜延之也说“置酒弦琴”……可见音乐是他自幼开始就养成的爱好，而且临到终老之际写的《自祭文》中还对音乐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萧统说陶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关于陶渊明抚无弦琴之事，《宋书》、《晋书》都有记载，与萧统的说法大同小异，《晋书·陶潜传》载：“蓄无弦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看来陶渊明喜欢音乐是可以肯定的了。而无弦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晋书》所记，就是一张没有弦和徽柱的琴，当然也就无法弹拨出音声来了。爱好音乐又不解音律应当怎样理解呢？这实际上是说陶渊明非常喜好音乐，并且，“载弹载咏”，而且分明在《自祭文》中写着“和七弦之素琴”，能说陶渊明不解音律吗？只是表明陶渊明所重视的是音乐的陶情冶性，寄托情志的追求，而不在对于音律理论的探讨和音声和弦的深究。萧统所说的“不解音律”是说陶渊明不长于音乐理论方面研究。这正好和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样，他追求的只是书中精髓和音乐中的情趣，而对于琐细精微的理论倒不很在意了。以琴书相随，陶然自乐而已。陶渊明本人在文中赫然写着“和七弦之素琴”，应当说他并不是总在抚弄“无弦琴”吧！据我揣测，一次偶然的朋友欢会，酒酣耳热之际，取下琴来弹抚，才发觉弦断徽折，于是即兴抚了这张缺弦徽的琴，成了一则佳话。诗兴大发的诗人，随即咏出了“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诗句。因为在陶渊明本人言及弹琴的诗文中没有任何一次无弦琴的记载，而萧统生活的年代距陶渊明时代已逾百年之久，并不都靠得住。我们宁可相信陶渊明本人的记述，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当然，萧统所记也不是凿空之论，恐怕就是上面所推测的一次偶然友朋聚晤，兴致高涨，取下琴来才发觉弦徽俱无，为了不扫大家兴致，只好抚弄一番。这里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乐器本身的优美与否了，而侧重的是琴中之趣。如果这种琴中之趣按照审美主体的意愿展现了自然灵性与美感体验的话，琴弦徽柱无非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反倒不重要了，这正是盛行于魏晋之际的“得意忘言”理论在音乐方面的发挥。准此，我们就可以把“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进行补充：“琴者所以在音，得音而忘琴。”其实它正体现了老子所谓“大音希声”的思想命题。真正美妙绝伦，充分体现审美主体理想情趣的音乐，是不一定表现得出来的，它是自然之音、天籁之音。陶渊明在“大音希声”的基础上作了个性化的发挥，就是无弦音乐的佳话。当然，陶渊明这种强调自然之音是受其外祖父孟嘉见解的启迪：“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里的丝、竹都是指乐器，而肉，当然是人发出的声音，是非常自然的。认为自然之音之美是最高境界，苏拭作为陶渊明的异代知音，他深得其中三味。在他的《琴诗》中写道：“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音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陶、苏二人对音乐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可是他们对琴中之趣，音中之自然和谐的追求倒很合拍。

陶渊明生活时代的文坛，不是玄言诗的充斥，就是雕琢堆砌的文风泛滥，他在那个时代走着与时代潮流完全不同的路子，追求的是迥异时流的审美价值。那么——

### 应当如何理解陶渊明 审美追求的价值及意义？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的诗坛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诗杂仙道之气，多放逸旷达之词的玄言诗占统治地位，道仙气浓，远离尘世；一是词彩浓艳，雕绩满眼的华丽文风。就是山水诗开始闯入诗歌园地的晋宋之际，陶渊明的醇厚淡泊的田园诗歌也显示了不同的审美趣尚。简文帝萧纲所推崇的前代文人是“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致东湘王书》），所赏识的是与陶渊明同时代但审美趣向与陶渊明全然不同的颜延之和谢灵运，陶渊明是算不上的。陶渊明既不去写文坛上流行的玄言诗，也不规步时俗去着意雕琢堆砌，而是独标一格，崇尚清新质朴，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诗歌评论家钟嵘把陶渊明列为中品，指出陶的基本特征是“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大体把握住陶诗清新质实，古朴简练的艺术追求，并对当时耻笑陶诗为田家语者予以反驳，指出陶渊明的诗也有“风华清靡”的一面。

陶渊明诗歌的审美趣尚当然是其美学思想的外化，而他的美学思想是属于“任真自得”和“率真自然”的。在诗歌上主要表现为朴茂清旷和自然真切。就朴茂清旷而言，几乎陶渊明的所有诗文都具有这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之美和意境幽远的特征。他的不少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简直象叙家常，朴素真淳，空灵洒脱。与矫揉造作，雕琢堆砌绝不沾边。其实这并不是说陶渊明写诗文都是率然命笔，不讲究章法和审美技巧，而是大巧若拙，全然不露雕凿痕迹，达到庄子所说“以天合天”的效果。这就是宋代惠洪所说“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冷斋夜话》）。

至于陶诗的真率自然，更是融铸于陶渊明的精神追求之中，无处不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真率，象萧统所说“贵贱造之者，有酒则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像《饮酒》之九中回答父老的劝言也是：“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曾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等等，其真率，这就是朱熹称誉的“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子语类》卷140）当然，造语平淡，意境幽远是陶诗的另一审美特征。能以平淡质朴的语言融铸为形象丰富感染力很强的诗歌意境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看似容易实艰辛”，像陶渊明的《杂诗八首》、《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都是造语平淡而寓意深隽的佳作。宋代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真可谓深知其甘苦的体验。以极为平淡而又韵味深厚的语言传达丰厚深沉的思想理趣的确是相当难于企及的境界，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中，陶渊明显然是此中高手。他的这种审美思想，受到后世不少诗人的顶礼崇拜，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都从陶诗的审美追求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对陶渊明艺术风格的评价虽然稍嫌笼统，却也大体把握住豪华落尽的精髓。

魏晋之际，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宁，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生死无常，前景未卜，寿夭莫测，因而在对待人的生死问题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看法。那么——

### 陶渊明对生死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自人类跨入文明社会以来，寿夭生死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们。生和死也就成为古今中外思想家、社会学家异常关注而又探讨不倦的重要命题。而每当社会动荡，祸福无恒的战争年代，人们对生死寿夭问题的注意尤其突出。儒家执著于现实世界，对生死问题并不特别在意，他们是重生而轻死的。孔子在回答对生死问题看法时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对生死问题是回避的，看重的是人世的现实奋斗和努力。“杀身成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朝闻道，夕死可矣”等无不强调个人的奋进和努力，看重的是生，对死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佛教认为人死是不可免的，但是，人死了之后，灵魂不灭，精神永存，又进入一种轮回，只要积德行善，虔诚于佛教，就能成佛圆寂，进入天国永享幸福。道家则很注重现实世界的享受，主张通过服食仙丹妙药，可以获得长生久视，永远活在人间。

陶渊明的生死观是豁达的，他认为有生就有死，死和生一样是自然之理，没有必要为生而欢欣，为死而伤悲。为此他说“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郭主簿》），“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诗》），“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独能免”（《与子俨等疏》）。他既不相信人死后圆寂成佛的空幻，更怀疑长生不死的愚妄。他更多地接受了儒家重生轻死的精神追求，看重的是现实生活，他既不像道教徒那样“营营以惜生”、“卫生每苦拙”地贪生惜命；也不屑意于佛门子弟那样超凡脱世，把人的死去看成是脱离苦海，进入三世轮回，追求来世成佛；他以豁达、平静、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的死亡：“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对待生死，陶渊明是持委运任化的态度。因而，他才能在自己临终之际，以极其平静而自然的态度，豁达而乐天的心情写下了《挽歌》和《自祭文》这样的文字，把自己的逝世视为：“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与他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描述陶渊明临终前的境况是完全一致的：“年在中身，痰维痼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禱祀非恤。”象这样能洞察世事，悟透人生，视生死为自然规律的见解在那个时代还是难能可贵的。他的生死观除了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之外，庄子的等生死、齐寿夭和佛家视人死为超凡脱世的观点显然也为陶渊明所汲取，从而形成了他对生死的豁达态度和委运任化的眼光。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晋代的高僧慧远，在庐山修道讲经，成立白莲社，一时许多名流学子和诗人都纷纷加入，如“寻阳三隐”中的刘遗民和周续之，就是白莲社的成员，那么——

### 陶渊明与白莲社的关系如何？

庐山东林寺著名高僧慧远，是一个学识渊博，见解精深，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扎实又对佛家经典熟稔的学者型僧人。他在庐山讲经布道时很能吸引一些学者和诗人听其讲解，“寻阳三隐”是当时著名高士，刘遗民、周续之已经成为白莲社的成员，而陶渊明也与慧远过从交往。据《庐山记》所载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陶渊明与慧远的交情：“远法师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过虎溪，虎辄鸣号。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道合，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说明陶渊明不仅与慧远有过交往，而且受到慧远的垂青，居然打破送客不过虎溪的惯例，关键是“与语道合”，就是说彼此有一些共同语言，沟通无碍。然而，陶渊明却没有象刘遗民、周续之那样加入白莲社。另据《莲社高贤传》记载：“远（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日：‘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这里的记叙非常简略，为什么陶渊明受到慧远的邀请，而且还特别破例允许他饮酒，享受极为优厚的待遇，又突然“攒眉”而去了呢？显然二人的见解有深刻的分歧是关键。慧远写过一篇《形尽神不灭论》的文章，主要宣扬人的肉体死亡之后，精神却可以永存的佛教理论，无非是要信佛的人积德行善，苦修磨练，以求得来世超度成佛，进入天国永享幸福等。而陶渊明显然不能接受这种理论，他在《形影神》诗中表明了不同的看法。慧远还为此立佛影，写了《万佛影铭》，进一步地宣扬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影而独立存在，人的形体腐烂消灭之后，精神却永不泯灭。为此，慧远还鼓噪了一批名流、学者为之助威，著名文人谢灵运就撰写过《万佛影颂》。陶渊明《形影神》诗可以说是对慧远理论的答复。陶渊明“攒眉”而去，深刻的原因就在这里。陶渊明和慧远哲学观点的分歧，自然是他不愿加入白莲社的重要原因。

此外，陶渊明是一个把自由视为生命的人，他连做官应酬都觉是沉重的精神枷锁，又何能接受他并不很赞同的以佛教经义组织起来的白莲社的羁束呢？如果我们再把陶渊明思想中那种儒家文化的影响联系起来看，他不加入白莲社当然也与儒家所倡导的“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关系密切。白莲社，说穿了不过是宗教性的团体而已。作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必然有与之相关的约束和规定，必然会对入会者给予一定限制和要求，这自然与追求人生自由闲适，厌弃给人限制和戒律的陶渊明以接受上的障碍，他之所以不入白莲社，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见解的分歧必然导致行动的不一致。钟秀说：“元亮与白莲社中人朝夕聚首，虽劝驾有人，终不为所污。及观其诗，乃多涉仙释，可见人只要心有主宰，苦假托之辞，何必庄、老，何必不庄、不老；何必仙释，何必不仙释。放浪形骸之外，谨守规矩之中，古今来元亮一人而已”。（《陶靖节记事诗品》）指出虽然陶渊明与白莲社中人过从交往，尤其是与慧远谈禅论道，但是只要自己内心深处形成了固定的见解，是不会为之左右的。当时刘遗民已入白莲社，“时遗民招渊明庐山结白莲社，渊明雅不欲预名社列。但时复往还于庐阜间……”。（《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二）

朋友之间的往来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趣味与人生观的完全一致。友谊和哲学见解并非是一码事。陶渊明与慧远及白莲社中人的交往过从就是如此。他仍然清醒地保持着自己的见解和独立的人格，并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人。

陶渊明说自己不善交际，又偶爱闲静，但从他的诗文作品中反映出他结交过不少的朋友，那么——

### 陶渊明结交过哪些朋友？ 与他们的关系如何？

一个人的一生，不管他是性格开朗还是内向孤僻；是擅长辞令还是沉默寡言；不喜交友还是善于交际，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一些人过从往来，发生联系，所不同的只是交友的广泛与否，情谊的深浅亲疏差别而已。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绝不可能屏绝一切交际，陶渊明自不能例外。虽然陶渊明自称“闲静少言”，“请息交以绝游”，但并不等于他杜绝了与所有人的往来，这只是说他断绝了和官场尔虞我诈之辈的交往罢了。我们从陶渊明的诗文及有关资料中，可以罗列出他交往的朋友。

郭主簿。姓字爵里及生平事迹不详，但他是陶渊明的朋友，而且关系不错。陶渊明有《和郭主簿二首》。所谓和诗，当然是郭主簿先有诗赠，然后再和答。两首诗都以轻快闲适的笔触描绘了田园幽居的乐趣，自然是关系较好的朋友之间倾吐内心感受的肺腑之言。

胡西曹。生平事迹不详。陶渊明的朋友，陶渊明有《和胡西曹倾感曹》诗与之。

顾贼曹。生平事迹未详，陶渊明的朋友，陶渊明有《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相赠。

殷铁。字景仁，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人。他曾经做过晋安郡南府长史掾，所以陶渊明在诗中称他为殷晋安。殷铁是司徒王谧的女婿，最初曾为刘毅的后军参军，晋安郡南府长史掾，后来迁太尉刘裕的参军。刘宋时期升为侍中、尚书仆射、中书令，是陶渊明的朋友。陶有《与殷晋安别》诗相赠。

戴主簿。生平事迹未详。陶渊明的朋友，陶有《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诗相赠。

刘柴桑。即刘遗民，他曾经做过柴桑令，故称。原名刘程之，彭城（今江苏铜山）人。晋安帝元兴二年（403）辞官归隐，筑室于庐山西林，师事东林寺高僧慧远，虔信佛教，并撰写《愿誓文》。义熙十年（414年）七月，参加了慧远的白莲社，为该社十八贤之一。卒于义熙十一年（415年）。著有《刘遗民集》五卷。他和周续之，陶渊明并称为“寻阳三隐”。刘宋时代一直隐居不仕，故称刘遗民。据释元康《肇论疏》说他“禄寻阳柴桑，以为人山之资。未旋几时，桓玄东下。格称永始。逆谋始，刘便命孥，考室山藪。义熙公侯咸辟命，皆逊辞以免。”行迹和志趣都与陶渊明极为合拍。二人交谊颇深，只是在对待佛教和白莲社等问题方面有不同看法。陶渊明有《和刘柴桑》、《酬刘柴桑》等诗与之相唱和。

周续之。“寻阳三隐”之一。字道祖，雁门（今山西省）人，庐山白莲社十八贤之一。最先隐居庐山，师事慧远。慧远死后，江州刺史檀韶以及刘义符、刘裕等先后请他讲《礼》，应聘出山，时人称为“通隐先生”。陶渊明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诗相赠，对周续之出山讲《礼》的场所邻近马队颇有微词，也暗寓规劝。

祖企、谢景夷。事迹未详，也是陶渊明的朋友。



羊长史，羊松龄，曾任左将军朱石龄的长史。他不仅是陶渊明的朋友，还是陶渊明居南村的邻居。陶渊明有《赠羊长史》诗，表达了二人的友谊。

丁柴桑。事迹不详，陶渊明的朋友，陶有《酬丁柴桑》诗相赠。

庞主簿。庞遵，字通之。是陶渊明的朋友，生平事迹不详。陶渊明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邓治中，其人事迹不详，陶渊明的朋友，陶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记其事。

张常侍。张诠，其人事迹不详。是陶渊明的朋友，陶有《岁暮和张常侍》诗与之唱和。

王抚军。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生于晋孝武帝大元四年（379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他与陶渊明往来时是他做江州刺史之际。他本是地方大吏，但慕陶渊明之名而结识之。萧统说“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陶渊明传》）这个故事也在《世说新语》注引的《续晋阳秋》中。王弘与陶渊明的文字往来就是陶渊明的《于王抚军座送客》。当时所送的客即庾登之、谢瞻。陶渊明与王弘之间是谈不上什么情谊的，王是陶桑梓的地方长官，他虽然不去巴结，但是也不能拒人于不见，陶对王更多的是应酬；王对陶则慕其名而结纳。王弘也非凡庸之辈，史称其在江州任上“省赋简役，百姓安之”，“博练政体，为人望所宗”，且有文集二十卷传于世。

庞参军。生平事迹不详。陶渊明的朋友。陶有《答庞参军》诗二首与之唱答。

此外，就是比较重要的慧远（已详前文）和颜延之了。颜延之的事迹拟在专节论之，此不赘。如果说上面并列的陶渊明的朋友是有姓名可考者，实际上还有一些无法列出姓名的人，如田父、野老、邻里、乡曲、“善心人”……更是不可胜记。总之，陶渊明既非高蹈遗世的隐士，也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的孤独者。只不过从他归田之后，尽量避免和官场中人物往来，淡化与上层社会的联系。而在他的生活圈子里，可以

和那些低级官吏如县令、参军、主簿、常侍之类过从，和邻里乡曲、农夫野老闲聊，建立起“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的新型关系，取得心灵的沟通。

清代诗人龚自珍在评价陶渊明时写过一首七绝：“陶潜恰似卧龙豪，千古寻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那么——

### 怎样理解“莫信诗人竟平淡， 二分《梁甫》一分《骚》”？

陶渊明虽然只活了63岁、却经历了三个朝代，其间有十个皇帝，目击了由晋到宋的改朝换代，见惯了杀伐征战、篡位弑夺。他少年时代“壮且厉”的情怀，大济苍生的抱负，有志待聘的企盼都在门阀士族秉政、腐朽黑暗政治的严峻现实里沦为泡影。虽然百折不挠地五次从政，但都以挫折蹭蹬而告终。最后只好从彭泽县令任上挂冠归隐，过着与世无争，洁身自好的田园生活，并且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实的冷酷，仕途的坎坷，家境的贫困，身体的衰疲，使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开始冷静而理性地反思往昔，体味人生，预测未来。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人生不过如此，在那个社会中，诗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更无法去改变自身的处境，乐天知命，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因而在他归田之后的作品中，呈现着平淡萧散，和缓纾徐的基调，充溢着旷达自然，委运任化的情致，这是历来研究者几乎一致的看法。

但是，平淡并非平静，和缓却不是静止，达观也非静观。认真研读陶渊明归田隐居之后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平淡萧散的下面不乏激流奔涌，旷达任化的深层处藏匿着躁动不安与抗争。我们在他归田之后的作品中除了欣赏《归园田居》的恬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萧散，“偶有名酒，无夕不饮”的乐趣，“穷通靡攸虑，顛頼由此迁”的豁达，“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及时为欢之外，恐怕不应当无视以下诗文吧。如《读史述九章》的寄托，《拟古》九首的激越，《咏二疏》和《咏三良》的慷慨，《咏荆轲》的悲壮，《读山海经十三首》的猛志豪情，《饮酒》诗的满腹牢骚，《有会而作》和《乞食》诗的穷愁辛悲。能无视如此大量的抒发壮志难酬，人生艰辛，批评时政，讥刺篡逆的作品吗？此类作品怎能以“平淡”两字来概括呢？这些被鲁迅称之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与平淡是毫不相干的。正如朱熹所说：“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其实露出陶渊明壮怀激烈的作品何止《咏荆轲》一篇，朱熹只不过举一反三，他完全窥破了陶渊明平淡之外的豪放，萧散之余的慷慨。龚自珍一方面承认陶渊明的诗歌有平淡萧散的一面，但更加强调的是诗人躁动着的功业追求和雄心壮志，以及个人襟抱不得施展的苦闷和牢骚。所谓《梁甫》，即楚调曲《梁甫吟》，诸葛亮在辅佐刘备之前，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用以抒发其政治抱负和怀才不遇感情，龚自珍以此指陶渊明诗中的政治理想和功业追求。而《骚》本为《离骚》的简称，这也是说陶渊明郁积于胸中的牢骚。龚自珍的这两句话是说陶渊明虽然没有在五次从政中实现其人生理想，但是他的归田是在那种黑暗现实中的另一种选择。这种归隐躬耕就和诸葛亮当年南阳隐居一样，是时运未济的权宜之计，陶渊明的诗除了有被人们熟知的平淡风格之外，内心还勃勃着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和这种追求无法实现的深沉苦闷与牢骚。只有这样认识陶渊明，才是全面的，真实的。这实际上和鲁迅所说的“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

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难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是基本合拍的。就是说评价一个作家，必须全面、深刻，不可见木不见林，挂一漏万。也就是鲁迅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七》）我们既要看到陶渊明平淡之处，又必须认识他诗中的《梁甫》和《骚》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陶渊明全人。

陶渊明的诗歌不仅在他生活的时代独树一帜，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可是——

### 为什么《诗品》 只把陶渊明列为“中品”？

陶渊明的诗歌和他自己一样，在那个时代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首先是晋宋之际是重门阀、轻才华；重身世，轻实际的社会风气在文学批评界的折光。虽然钟嵘在评论诗人时看重的是其人及其作品，把人品和作品结合得很紧，试想，象陶渊明如此身世和沉沦下僚的经历如何能得到很高的评价呢？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文坛的审美标准和评价尺度受到重形式，轻内容；重词采华丽，轻清淡质实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并且以此来裁量诗歌的优劣。钟嵘评论诗歌时，把“辞采”和“丹采”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诗品序》中就有“宏斯三义（赋、比、兴）。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虽然强调的是“风力”，却对“丹采”同样看重。因为任何时代都有一定的好尚和审美标准，而魏晋和南朝文学，尤其是那个时代的诗坛，是十分推崇诗歌的绮丽精工，形式华美的，而对陶渊明诗歌的质实朴素的价值是认识不够的。南北朝时期的两部最为权威，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专著就是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两部书基本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见解和对作家、作品诗歌的总体认识。我们在这两部书中简直看不出对陶渊明诗歌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评价的认知。《文心雕龙》只字不提陶渊明，而钟嵘在《诗品序》中有段阐释五言诗的发展过程的论述是这样讲的：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具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这里把一个多世纪五言诗发展流变的过程作了历史长镜头式的巡礼，指出以曹植、陆机和谢灵运为代表的三个转折时期的典型诗人，以及与之相应的刘桢、王粲；潘岳、郭璞和颜延之等诗人中的代表。在陶渊明的时代，钟嵘推举的是谢灵运和颜延之。如果说谢灵运被钟嵘列为上品还不便比较的话，同居中品的颜延之是无论如何也不及陶渊明的，其实我们倒不必以今天的审美眼光和评价尺度来要求钟嵘，就是·99·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义熙时代，颜延之被提及而轮不上陶渊明，这正好说明钟嵘时代对词藻文采的看重。此外，钟嵘在《诗品》卷下论及戴逵、殷仲文时又说：“晋宋之际，殆无诗乎！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殷不竞矣”。显然，在钟嵘的心目中，陶渊明是无法代表那个时代的诗歌创作的，因而只字不提陶渊明。这倒不能责备钟嵘没有眼力，只能说明那个时代的美学标准和文学观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非常重视诗歌形式的精美，词藻的艳丽。这既有历

史的渊源，又有钟嵘的个人发挥，从曹丕《典论·论文》推尊“诗赋欲丽”的倾向之后，陆机在《文赋》中又强调“其遣言也贵妍”，到了钟嵘，在重视“风力”的同时又很注意“辞采”。以如此的眼光来品评陶渊明的诗歌，自然难于跻身上品了。对此，我们既不能感情用事，指责钟嵘的品评有失公允；更不能用今人的艺术眼光和价值尺度来衡量钟嵘，指责他把陶渊明列为中品是偏颇甚至荒谬的。如果用钟嵘时代的文学观和艺术眼光把陶渊明列为上品才是真正的怪事！令人费解的现象！任何时代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以及审美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形势、经济基础、社会背景、文化氛围、时代崇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把谢灵运的地位置于陶渊明之上，后人接受起来心理不无障碍，但用当时的眼光来审视，又是必然。为此还引发了一场关于改变陶渊明在诗品中地位的纠葛。陈延杰在《诗品注》中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说：“钟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指出“迨至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也。王士禛曰：彭泽宜在上品。余甚然之。”这是什么根据？纯粹以后人的眼光和感情好恶来评论《诗品》，愿望虽善，心情也可以理解，也很符合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实际，可是，偏偏对古籍原著视而不见。如此对待科学研究恐未必恰当。我们承认陶渊明的诗歌成就，并不一定要求古人和我们今天的标准保持一致，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钟嵘把陶渊明列为中品，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必然，没有必要去改变它。对待历史文化，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眼光和尺度，要求跨越时代，取得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

钟嵘在评价陶渊明时说过一句话：“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那么——

### 怎样认识对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评价？

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的钟嵘，他在《诗品》中是这样评价陶渊明的：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细玩全文，钟嵘在探究了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之后对其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作了总结性的定位评价。指出了陶渊明的作品不仅有质直补茂，真古淳厚的一面；而且还具有风华清靡，绮腴润泽的优长。其着眼点当然是对所谓“田家语”的否定。在作了如此全面概括之后得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结论。这个结论引起了后人的非议和怀疑。认为这个称号不符合陶渊明的创作实际。说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参合他的为人行事和诗文创作，这个称号是不够全面的。而且，完全无视陶渊明归隐的社会背景、政治形势和他痛苦矛盾的复杂心态；更没有注意到他归隐之后仍然不时地关注现实，写了很多平淡以外的批评时政。谴责篡弑，抨击战乱，吐露政治见解的作品。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钟嵘说这话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与文化心态。首先要肯定的是“隐逸诗人之宗”在晋宋之际绝不是贬抑之词，恰恰相反是带有一定敬意的褒义词，正如当时的人所称陶渊明和刘遗民、周续之为“寻阳三隐”一样，是赞语、敬词。隐士在战乱年代也是一种理智性的人生选择，在魏晋时代本来就属于既高雅而又时髦的桂冠，它蕴含了思想、人格、文品、精神等层面的价值，绝不是后人对“隐逸”的理解。更不是建国以来对“隐逸”批判性的评价。唯其如此，那些以隐求仕，半途而废的假隐士才会被人看轻和嘲笑，如“通隐先生”周续之和周顛之流，这是要分清清楚的。

魏晋时代，儒学衰微，老庄盛行，玄风甚炽，清谈崇高。那时的人们当然也还要读儒家的典籍，但“三玄”即《易》、《老》、《庄》更是知识分子普遍涉及的内容。隐逸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体系的构建自然与老庄哲学中鄙弃世俗，洁身自好，远离事务，崇尚逍遥，追求个性自由紧密相关。一个人要成为隐士，首先必须具有思想内涵和文化品味，没有三玄的濡染和清高绝俗观念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此外，再就人格层面来审视，隐士一般都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人文性格，独特高卓的品行，儒雅孤介的操守，自我完善的精神追求，高洁的情怀。在为人行事方面表现不趋时流，独标一格的风度状貌。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则必需如《易》中所说：“澡雪精神，养真自适。”隐逸的人一般都有诗文著述用以言志抒怀，虽然文品因人而异，大体皆以林泉为趣，野鹤闲云般的自由潇洒为追求，蔑视利禄荣华为依归。称一个人隐士，大约总要全部或部分地在精神、人格、文品等方面具有以上的内涵。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称誉，更是一个崇高绝俗，人格完善，诗文淡泊的综合评价，这在钟嵘的时代，一个真正的隐士是不包含任何贬损性的称谓。

只是说这个称号放在陶渊明的身上是否恰切，倒是值得研究和检讨的。

钟嵘对陶渊明的总结定位性评价，把陶渊明评定为“隐逸诗人之宗”，不免以偏概全，不够准确。可是，任何概括都难免挂漏和蹩脚。如果结合钟嵘生活的时代和陶渊明的为人行事，以及他的诗文创作等方面来审视，钟嵘的结论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只要我们明确了钟嵘的不足之后，对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就接近真实了。

先从合理性来看。这话虽然第一次见之于《诗品》，可不是他的发明，更不是他的独创。早在陶渊明生前，就有“寻阳三隐”之称呼陶，可他并不为此造成接受心理的障碍。而且，陶渊明本人也多次以此自命：“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答庞参军》），“岂无他好？乐是幽居”（同上），从别人口中第一个称陶渊明为幽居隐逸的是颜延之“南岳之幽居者”。（《陶征士诔》）参合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他除了于29岁至41岁期间断断续续地做过五任小官之外，其余岁月全是在农村度过，隐逸于田园。因而《宋书》、《晋书》、《南史》都把他列入隐逸传，不能说没有道理。更何况隐逸在当时既有社会根源和时代趋尚，又有思想界玄学清谈之风的鼓扇，兼之隐逸者的个性气质与人生经历等诸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所以，称陶渊明为隐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当时的价值观。

明代黄文焕在《陶诗析义·自序》中悦：“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也有充分的依据，因为陶渊明的一生绝不是“隐逸”两字所能概括的。当然也有学者从“古今”一词有悖于齐梁时代的用语习惯，并参之有关资料，判断“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句话不是钟嵘的原文，而是传抄转刻的衍文，也不无道理，但依据似不够充分。

隐逸在晋宋时代非贬抑性称谓，蕴含一定的文化品味与精神人格价值，钟嵘这样称呼陶渊明并无任何否定性意味。值得指出的是钟嵘只抓住了陶渊明隐逸逃禄的一面，而对陶渊明隐居之后的生活与创作注意不够或不够全面。我很赞同他把陶渊明的归隐理解为归田，他与那些依靠祖宗资产田庄过着优游岁月的肥遁者有所不同的是他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交往过从的人除了下级官吏和知识分子之外都是极为普通的田夫、野老和农父，与他们一道关注着自己庄稼的长势和收成。如果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陶渊明的归田并没有混迹于鸟兽，藏身于深山林藪，他只是从狭窄的官场转向到广阔农村田园，他对事业的追求从建功立业转向农业劳动和农村的日常生活。从这层意义上着眼，他显然又是够格的隐逸。清人陈沆指出：“读陶诗者有二蔽：一则惟知《归园》、《移居》及田间诗十数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饮酒》、《贫士》，便已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翁，闲适之祖，此一蔽也。二则闻陶渊明耻事二姓，高尚羲皇，遂乃逐影寻响，望文生义，稍涉长林之想，便谓采薇之吟。岂知考其甲子，多在强仕之年，宁有未至义熙，预兴易代之感。至《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愤悲，翻谓恒语，此二蔽也”。（《诗比兴笺》）我们在廓清了钟嵘对陶渊明的评价之后，理所当然地对陶渊明有更加深入而全面的理解。陶渊明当然不可能象鲁迅所说的那种隐士那样：“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不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时，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象事情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他只是从官场退隐出来，进入大自然的怀抱，投向更为开阔的农村新天地而已。

陶渊明的诗文作品中有不少的内容是他归隐田园以后写的。这些作品有许多是以田园生活为内容。那么——

### 为什么说陶渊明开辟了 田园诗歌的新天地？

在陶渊明的 120 多首诗歌中，如果按照诗歌的内容为依据，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诗、咏怀诗、哲理诗和田园诗四类。那些描写田园景色，农事耕作及相关的内容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有 30 多首，约占其作品的比重 1/4 稍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可观数量；倘若从这些诗歌表现的情感和描绘的景物来看，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为晋宋之际“殆无诗乎”的诗坛吹入一股强劲而清新的鲜活空气，而且也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农事田园诗争得一席相当重要的地位，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吟咏农事之章，歌颂田园之什是农业文明古国的文学的基本内容。这在中国也称得上古老而悠久的题材。《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里的《燧草木》、《奋五谷》可以说是较早的咏唱农事的作品，《帝王世纪》里的《击壤歌》、《诗经》中的《七月》、《良耜》、《大田》以及《楚辞》和汉代乐府诗中一些篇章，也有对田园风物和农事劳动的咏唱与反映。但是，这些诗歌只是零星片断地咏及农事，缺乏完整的农业场面的

刻划和深入农业劳动之后的感受和体验。田园诗歌为什么从西汉以来，直到陶渊明登上诗坛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一直处于寥落稀少的状态呢？为什么不能与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见突出相适应，反而更趋冷落呢？这大概是在受儒家思想轻视农业劳动的观念的影响下出现的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脱节有关吧。其实不仅儒家思想轻视劳动，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般都鄙视力役，看不起农业劳作，更不消说去发现挖掘农业生产中的诗情画意和参加劳动后的感受和体验了。魏晋时代的清谈之风，清谈家以不染事务为高雅，远离劳动为时髦，这就更加助长了鄙弃农事诗的势头，因而，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山水诗特别盛行而讴歌田园之章则很逊鱼的状况。

中国的田园生活到了陶渊明才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先，一个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如此集中，数量惊人地，思想内涵和艺术造诣又如此上乘地描写了那些引人注意的田园诗歌，在此之前是绝无仅有的。这主要是陶渊明在步入官场前的 29 年岁月中几乎完全生活在农村，41 岁隐居田园之后，其活动范围不外以庐山为中心而展开，足迹未曾超过百里以外的农村，就是他从政为官的 29 岁至 41 岁之间的岁月，也时断时续地赋闲农舍。如此的社会经历和生活视野，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都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与农业劳动联系密切。这样的生活阅历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是比较特殊的。此外，由于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的为人，使他对孕育和熏陶自己的农村生活有着极为自然融洽的血肉关系，融铸了他对农村景物的浓厚兴趣，对农业生产的熟悉和关心，加之他的家庭条件也使他不能不对农业劳动予以足够的注意和亲身参予。这样他不仅对农业题材极为熟悉，有亲身的体会，而且也对田园风光饶有兴趣，对生活于清新田园的野老农夫等所谓“素心人”逐渐熟悉，产生好感，过从甚密。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总是选择自己最为熟悉，最感兴趣，体验最深的题材倾注更多的精力，因



而陶渊明写了那么多那么优美的田园诗，为中国的田园诗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们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不仅感受到诗人深情而自然地把那些本无灵性也缺乏画意诗情的普通景物着上了诗人的审美体验和孤介高洁的个性色彩，而且，在陶渊明的笔下，田园、山水、草木、禽鸟、炊烟、农舍、田畴显得那么清新宁谧，由这些风物组合成的画面总是那么淡雅明朗，充满生机和迷人景象：“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饮酒》）”，“蔼蔼堂前村，中夏清阴”（《和郭主簿》），“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同上》），“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

更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对田园诗的贡献是他突破以往田园诗人多为旁观者，或代为农业劳动者吟咏的农事诗歌的模式，这倒不仅仅指他在艺术手法上的拓展，而更主要的是他自己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农业劳动。因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少篇章抒写了田园景色之余，主要表现的是参加农业劳动的经历、体验、感受和联想。一个知识分子、诗人在封建社会轻贱体力劳动为当然的时代，能够克服种种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放下县令架子去种豆、锄草、耕耘、播种、收稻……这不管是生活所迫，还是自愿，总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种感受，镕铸于田园农事诗中却是如此自然、真切、感人：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三）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于下渚田舍获》）

陶渊明的田园诗问世之后，中国的田园诗歌才开始形成了气候，成了诗歌园地里的一朵奇葩。自陶渊明之后，写田园诗的人逐渐增多。但是，综观诸多的田园诗人，与陶渊明相较最大的不足是缺乏亲身劳动的经历和对农业艰辛的深刻认识，比如，唐代的储光羲、宋代的范成大等人都写过不少的内容丰富，精采动人的田园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时出于兴趣也于点轻微的辅助劳动，可是他们所缺乏的是长期的农村生活的实际经历和躬耕自资的生存体验，因而，不免把农村风光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景物予以观赏。在林林总总的田园诗中，陶渊明不仅开辟了田园诗的新天地，更以自己的长期农村生活和亲身参加农业劳动的实践使他田园诗卓然高出众人，独标一格。

陶渊明写了为数不少的田园诗歌。开辟了田园诗的新天地，在中国田园诗的创作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可是——

### 为什么不能把 陶渊明看作田园诗人？

如前所论，在陶渊明的诗歌作品中，确有不少是描绘田园风物，表现农事劳作，吟讴茅舍农院的作品，但是，就是这些作品加在一起也只不过约占他诗歌总量的 1/4 略强而已。何况，在不少的被称为田园诗的作品里，真正以写园田风光为目标，以抒发闲居农村的适意悠闲为情调，或以反映农业劳作为主线的诗歌就更少了，就以《归园田居五首》为例，真正纯粹描绘田园风物和躬耕劳动的作品，也只有三首，其中的四和五两首一是写农村荒墟的凋残和战乱年代人世沧桑的巨变感受；一是写闲居的悠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凡是诗歌中只要涉及田园风物的遣词就一概视为田园诗歌。陶渊明的一些歌诗只是把田园景色、竹林、茅舍、山川风物、草木花鸟、墟里荒径、狗吠鸡鸣等作为一些诗歌的背景或陪衬，有的仅仅是氛围渲染的载体，比兴寄托的物象，其诗歌咏唱的主旨则另有所指。这样的作品视为广义的田园诗自然无甚挂碍，倘以狭义的田园诗标准来衡量就未必允当、准确。

此外，诚如清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所批评过的那样，研究陶诗只把眼光执著于他的归隐之后的田园诗歌上，而对那些寄托刺世之作，抨击腐败现实，针砭篡逆，以及涌动看诗人不平之鸣的功业追求之类的作品重视不够，因而把陶渊明的创作凝固于田园诗和隐逸情调的框架之中，显然是不全面的。就以广义的田园诗的标准来衡量陶渊明的诗歌，他的田园诗歌总量也不过三十余首，占全部诗歌 1/4。而其余 3/4 诗歌，其思想内涵最为丰富，现实性最强，艺术成就独到的还是那些抒情言志的咏怀诗，政治诗和哲理诗，最能体现陶渊明的思想旨趣的诗歌的并非仅仅是田园诗，而那些咏怀诗如《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十三首、《杂诗》等等，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着眼，都不比他的田园诗逊色。如果我们把陶渊明仅仅定位为田园诗人，那么，他那些更为重要，影响更大，成就更突出的咏怀诗、政治诗以及哲理诗又如何评价呢？所以，我们绝不可以甲田园诗人来概括陶渊明而无视那些更能体现陶渊明的为人和诗歌成就的咏怀诗等的存在，这样就会犯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错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把陶渊明定位为田园诗人，是一部分研究者只欣赏他的田园风物和闲居农村然自得诗文获得的错误结论和偏见。因而我们不能称呼陶渊明为田园诗人了。这也是清人龚自珍所说：“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之意了。读陶渊明的作品，除了平淡之外的内容，还有其它更为重要的部份。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有一些谈到了他对子女关心，其中蕴含着陶渊明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的注意。那么——

### 陶渊明怎样对待子女教育？

我们从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中知道他有五个儿子，这就是：俨、俛、份、佚、修。陶渊明在 29 岁时写过一首《命子》诗，是他初为人父时写的为自己儿子的命名的作品，诗歌通过列数陶家列祖列宗的悠久历史和和显赫业绩，赞扬了陶门家学渊源，功德勋业的辉煌，从而寄托了他对自己下一代进行教育，激励其继承陶氏家风，光耀陶门的用心。诗的后半部份很重要，既展示了陶渊明最初得子时喜悦与担心并存，希望与忧虑同在的复杂心态，也表露了陶渊明对儿子前途的预想和设计：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  
交友审美之迷顾惭华鬓，负影只立。  
三千之罪，无后为急。  
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时。  
名汝曰俨，字汝求思。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  
尚想孔汲，庶其企而。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日居月诸，渐免于孩。  
福不虚至，祸亦易来。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  
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这里仅引了此诗的后半部份，钟嵘评论陶渊明的诗歌时说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诗品》），这是说陶渊明诗歌简练而无冗赘之语。而他的《命子》诗我们当然不能说是“长语”，但是，这首诗确实在陶渊明的诗歌中要算较长的了，可见他对陶门祖上遗风的强调和对自己子女教育的关切。最初得子的喜悦和他对下一代所寄托的殷切期望在《命子》诗中敞露无遗。陶渊明给儿子取名为严，字求思就是很有深切用意的。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象孔子的孙子那样有所成就和作为。孔子的孙子叫孔伋，字子思，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被尊为“述圣”，著有《子思》23篇，据说《礼记》里的《中庸》也是他的作品。陶渊明希望自己的儿子俨也要象子思一样有出息、所谓“求思”，当然是想俨向孔伋看齐，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作为和贡献。这不仅反映了陶渊明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秉承陶门家风，更表现了陶渊明对儿子的厚望，象子思一样有所建树，反映了陶渊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陶渊明在教育儿子方面写过一首《责子》诗，很值得研究：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这是陶 41 岁归田隐居之后的作品。诗人对五个儿子不喜欢读书学习（不好纸笔）是有些担心的。大儿子俨（小名阿舒）已经十六岁了，可是对学习总是没有热情，懒惰得振作不起精神；二儿子阿宣（俟）已经 15 岁了，可仍然不喜欢读书作文；双胞胎阿雍和阿端也满 13 岁了，但是还不识数；最小的儿子阿通已经 9 岁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要零食吃；这样的下一代未来的前途当然会令人忧虑和担心了。陶渊明这样达观豁朗的人也不能不对自己的儿子考虑未来了。

陶渊明的这首诗，引起后人的争论。先是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在他的《遣兴五首》之三中写道：

陶潜避俗贪，未必能达道。  
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  
有子贤一愚，何其挂怀抱。

杜甫的意思是说象陶渊明那样豁达乐天的人，却很在意自己子女的前途，对儿子们的贤和愚那伴不能释然于心，老是萦系胸怀。这当然是对陶渊明《责子》诗引发的议论。而宋人黄庭坚从另一角度来理解《责子》诗，他说：“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豫章黄先生文集·书渊明责子诗后》）按照黄庭坚的理解，陶渊明的《责子》诗是陶渊明用调侃的手法，戏谑的笔调，表现了诗人与儿子们的情亲，所谓“责子”，并非正言厉色的呵斥，而是以诙谐逗趣，展示天伦之乐。叶真在《爱日斋丛抄》卷三中引过黄庭坚的另一段话：“杜子美诗·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子美困顿于三川盖为不知者诟病，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聊解嘲，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便谓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如果把黄庭坚两段话联系起来看，他显然认为渊明《责子》诗是在与儿子逗乐，戏谑，以轻松调侃的笔法表现父子之间的相亲相爱。进而把杜甫《遣兴》诗对陶渊明太在意于下一代前途和“贤与愚”的批评也理解为正话反说，寓庄于谐的戏谑解嘲之笔。

仔细琢磨陶渊明的诗，不能说丝毫没有逗趣戏谑之意。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陶渊明的五个儿子都没有什么天赋和过人的聪慧，下一代的成长是不尽如人意的。这大约是陶渊明望子成材的心较迫切，造成的希望与现实较大的反差，引发内心的忧虑吧！如果再把杜甫的诗歌作一番推敲，可能有助于对陶诗底蕴的把握。杜甫在《遣兴》五首中，分别对庞德公、陶潜、贺知章、孟浩然的身世遭遇予以唱叹，笔调庄重，似乎难以窥见戏谑影子。我倒

觉得，陶渊明虽很在意于自己下一代的成长，但并不妨碍他的乐天 and 达观。“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的达观是对自己生长于晋宋之际无法施展抱负的现实接受，并不等于他对自己追求的放弃。有所追求而又不执著于追求，理想不能实现并不意味着理想的虚幻和对理想放弃，适当调节自我适应现实生活的陶渊明，本身就是一种达观，他希望下一代超过自己，过一种比自己更有意义的生活，这不仅是作长辈的责任，也是人类社会赖以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正是“竹林七贤”中的放诞之士，却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象他们那样打发人生一样。应当说，陶渊明对子女“贤与愚”的挂念是可以理解的，完全应当的，也与他的达观并不相悖。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值得推敲：“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说明陶渊明虽然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却并不主张揠苗助长，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子女，施行不看实际情况的强制教育。而是顺应自然，尊重客观现实，只对教育对象给予必要的诱导和辅助。他的态度是“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虽然期望儿子成才，但不勉强。这种顺应自然，尊重实际的态度有可取的一面，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孩童最初步入学习轨道，需要一定的外力诱导辅助，帮助其智

力的开发，学习是一个艰苦劳动的过程，纯粹靠自觉和顺应自然显然是有所不足的，这当然与陶渊明归田隐居之后动乱的年代，不宁静的社会，艰辛的农业劳动，生活方面的困难等因素的困扰有关，使得陶渊明没有足够的精力、时间和心情去对下一代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

陶渊明本是一个博学多才，勤奋读书，诗文都写得很出色的文学家。萧统称他“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为什么他的儿子远不如他呢？按照现代科学理论，陶渊明的遗传基因应当是好的，优秀的，可是他的儿子五个，竟然没有一个贤能出众的？根据他在诗中所说，简直连一般水平都达不到？这除了与晋宋之际消极无为，委顺自然的风气有关之外，恐怕与陶渊明自幼养成嗜酒成性的生活不无关系吧！一个人无论你多么聪明，只要你长期无节制地大量饮酒，这样在他的身上，血液中经常都受到酒精成份的侵害，良好的遗传基因也因嗜酒而受到影响，这样的人的下一代是很难聪明的道理所在。天才飘逸的李白，他的后代也是没没无闻的。无数的事例无不证明这一点，这就是当今海外避免星期六婴儿孕育的道理所在。可见，陶渊明后代的“贤与愚”，与他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 三、诗文意蕴之谜

陶渊明的曲折而坎坷的一生中，仕途蹭蹬失意，生活也充满着贫困与艰辛。他五次从政又五次去职，虽然他并没有因为仕途的挫折而丧失了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却在一次次的仕途坎坷潦倒的磨难中逐渐减却了政治热情。综观其一生历官，不过祭酒、参军、县令之类的下级官吏，而且事务烦冗，奔波劳累，在晋人的心目中属于典型的浊官。由于陶渊明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做过官，但也是职位不高的，留给他的家产也十分微薄。加之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完全断绝了与东晋的政治联系和经济关系，归田以后的躬耕生活，当然也曾有过闲适悠然的惬意；可是，由于家底并不富裕，兼之两度火灾肆虐，遇上灾害年代，饥饿冻馁也就不时地困扰着性格孤介而倔强的诗人。仕途的失意，人生的苦难，躬耕的辛劳，田园生活的复杂感受，篡逆战乱的频仍……都在陶渊明的诗文创作中留下了清晰的记载。折射了诗人苦难人生经历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本以朴茂萧散为其基本特征，可是，诗人生活时代的特殊社会背景与政治形势，又使得他的一些诗歌呈现出手法多样，风格丰富多变的状貌，因而造成了研究者的认识不一致和理解的多变性。我们在这部分拟就陶渊明的一些重要作品作些探索和疏解，并对一些争论较大，分歧较多的诗文作出阐释和解答。

在陶渊明为数不多的四言诗中。有一首《荣木》诗。陶渊明在诗题下有一段小序：“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那么——

### 《荣木》是一首什么性质的诗歌？

荣木是一种蔬类草本植物，也就是木槿。夏季开花，花期非常短促，早晨开花，傍晚也就凋谢了。陶渊明以《荣木》作为诗题，正是取象于此，寄托了他对时光易逝，岁月蹉跎的自警与自励：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把握时机，努力奋发去实现其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则将虚度年华，一事无成。温汝能评论此诗时说：“此不过望道心切，叹流年之既往，恐学业之无成，所以嗟固陋而怀内疚，即学如不及之意”（《陶诗汇评》卷一），是有道理的。进德修业，依道立善的思想贯穿了这首诗的始终。王瑶先生根据诗中有“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认为这首诗作于陶渊明40岁时，联系陶渊明的仕履经历和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来看，并无大的杆格，可以信从，全诗共四章八句：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  
晨耀其华，夕已丧之。  
人生若寄，憔悴有时。  
静言孔念，中心怅而。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  
繁华朝起，慨暮不存。  
贞脆由人，祸福无门。  
匪道昌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兹固陋。  
徂华既流，业不增旧。  
志彼不舍，安此日富。  
我之怀矣，恒焉内疚。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首章八句，以木槿花晨耀夕凋来警诫自己，日月如梭，人生短暂，一个有头脑，有追求的人就必须百倍珍惜年华，把握好时机，以免留下悔憾，是第一的主旨所在。

第二章虽然诗人仍然以荣木“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起兴，但最警策之处却是“贞脆由人，祸福无门”等四句，意在表明一个人的品质是坚贞还是脆弱？其前景是光明还是黯淡？并不取决于其它，而完全受制于其思想、性格、修养、气质和个人的努力等因素，只要正道直行，勤勉为善，人是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成为生活的主人。这是极为可贵的人生态度。

第三章八句是对诗人对自己学识浅陋，事业无成，耽于饮酒、虚度年华的自责与内省，因而感到惶惑不安。陶渊明在这里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和浅陋（固陋），学业上没有什么成就（业不增旧），固步自封，虽然有“不舍”的追求，却沉迷于饮酒（日富，《诗经·小雅·小宛》：“壹醉日富”），一想到这些，不免内心充满着忧虑不安。

最后一章的四句，诗人又以孔子的教导来鞭策自己，必须抓紧时机去搏击奋进，以实现其人生价值和功业追求。

读了这首洋溢着自责、自省和自励、自警情绪的诗歌，谁能相信陶渊明是那么平淡！那么萧散！那么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么？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倒更加理解龚自珍的赞语：“陶潜恰似卧龙豪，千古寻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陶渊明并不是一开始就那样消沉，那样平淡，那样浑身静穆，那样与世无争。他奋进过，拼搏过，豪放过，追求过。陶渊明写这首诗时正是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这年二月，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三月推翻了桓玄政权。前景黯淡，失望悲观的东晋王朝象一个弥留之际的病人又被输了一些营养液，打了几针兴奋剂，又恢复了一线生机，朝野又升起了一线曙光，看到了希望。功业之念一直躁动于胸，政治理想并非全然破灭的陶渊明受刘裕击败桓玄形势的鼓舞，心中又升腾起“猛志”，写下了这首充溢着朝气，张扬着向上追求的诗歌。前人称此诗为抒情励志之作是很有眼光的，联系到陶渊明写了这首诗后不久，又出任刘裕的镇军参军的事迹来看，可以肯定他说，《荣木》诗依道立善，乘时进取精神是其主旋律。



在陶渊明的四言诗中，还有一首《停云》，据诗前的序说：“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那么——

### 《停云》仅仅是思念亲友之作吗？

《停云》诗与《荣木》诗都是陶渊明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辞去桓玄的官职隐居家园时的作品。这时，正是刘裕兴兵讨伐桓玄的战争尚未结束之际，虽然这首诗中并没有对这场战争作正面描绘，诗人也一再声称诗歌的主旨在于思念与亲友聚晤而不可得的惆怅苦闷，可是，诗中的景物刻划和风雨如晦的自然环境的烘托，无不暗示着此诗的题外之重旨。伤时念乱和思念亲友相交织的复杂感情溢于言表：

霏霏停云，濛濛时雨。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  
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霏霏，时雨濛濛。  
八表同昏，平陆成江。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  
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  
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  
敛翮闲止，好声相和。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  
愿言不获，抱恨如何！

要捕捉此诗的底蕴，首先必须明确此诗的艺术手法。四章三十二句，重章叠句，反复回环，唱叹有致，感慨良多，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比兴手法的自然而巧妙的运用。”霏霏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这既是凝聚不散的乌云笼罩着大地的自然景象，又暗喻刘裕与桓玄两军对垒，战火蔽天的乱世险象写照。因而密集如麻的雨下个不停，天昏地暗，平时很好通行的道路也阻塞难行了！试问，仅仅是密集的春雨会有如此恐怖的景象么？春雨滋润万物，催生草木，为大地带来盎然生机，才有“春雨贵如油”之称，为什么在性本爱丘山，以山水为友于，草木为情亲的陶渊明竟然对濛濛时雨产生如此悱恻的联想呢？只有联系到其时刘裕、桓玄两军自春至夏一直在浔阳一带成拉锯状态，战事胶着，前景不明的现实才能获得答案。也才能索解陶渊明的“叹息弥襟”和一再重复的“八表同昏，平路（平陆）伊阻（成江）”的寓意，以及“抱恨如何”的唱叹！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对前景虽然感到担忧，但是却还存在着希望：“东

园之树，枝条再荣”的景象，“翩翩飞鸟，好声相和”的鸣啁，不正是希望之所在，曙光的暗示吗？这是一首把怀人和忧时巧妙结合，抒写自然的佳作，如果我们仅仅将《停云》视为思念亲友之作，未免忽略了此诗的重要潜台词，温汝能评价此诗时说“诗中感变怀人，抚今悼昔，一片热情流露言外，若仅以闲适赏之，失之远矣！”（《陶诗汇评》卷二）诚为知言。这也就是黄文焕所称誉的“比兴愤极，高处在使人骤读之不觉，并亲友亦属蒹葭之虚想”。（《陶诗析义》卷一）只有把怀人和伤世念乱结合起来研读此诗，才能真正捕捉到《停云》的底蕴。

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从彭泽县令任上解职归隐，开始了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活，次年春，写了《归园田居五首》，那么——

### 《旧园田居》五首的基调是什么？

《归园田居》诗五首是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所作的组诗。这是诗人刚从彭泽县令任上挂冠归田的第二年。在陶渊明的三十来首田园诗中，这是一组最能体现其思想旨趣、田园风光和审美追求的典型作品。

《归园田居》五首是直抒胸臆，格调清新，豪华落尽，真淳毕现的朴茂之作，表现了陶渊明经过多次反复尝试，审慎思考，冷静分析之后选择的一条脱离当时黑暗官场，归田力农的轻快喜悦心情和参加农业劳动的经过，以及农闲之余的舒展适意。这是一个疲惫于名利场奔波劳乏心灵的放松，被扭曲人性的复原，回归于对于人来说有第二情人之称的大自然怀抱后的畅然惬意。由于诗人刚离开官场不久，田园躬耕生活也才开始，经济状况和物质条件也还较宽裕，新的劳动节奏和生活方式也给人以诗情画意般的浪漫和新鲜感。因而这组充满着明快清舒的基调和生机盎然的情绪，表现了诗人口陶渊明悬案揭秘对新的劳动自力生活充满着信心和美好的憧憬，脍炙人口，流畅自然，感动过无数有过不幸经历与坎坷遭遇之后回归大自然的读者，抚平了疲于竟奔而心灵创痛的游子，这正是这组诗的魅力所在。这组诗每一首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先读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歌深情地描绘了田园生活的恬静优美和诗人回归田园后的乐趣。这里有简朴无华的草屋，榆柳桃李的茂密葱茏，广袤的田畴，疏落的村宅，充满生活气息的狗吠与鸡鸣，到处是生机勃勃的野趣和恬静气象……这自然使得“性本爱丘山”，喜爱大自然山水田园的诗人本性得到充分的舒展和彻底的精神放松。农村田居生活和淳厚风俗正是陶渊明从宦海沉浮的劳乏中挣扎出来所寻觅的归处。农村乡居，田园静美，室内悠闲，这里没有官场的交际应酬，虚与委蛇，只有真诚淳厚的彼此往来，当然用不着提防别人的机诈，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闲美，自在无拘，因而才使人产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般的畅惬。

如果说这组诗的第一首主要描写田园风光的迷人和诗人对田园幽居的喜悦的话，而第二首则侧重于乡村生活的悠闲和对农作物所寄托的厚望了：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虽然这首诗仍然写的是田园生活，但与第一首的内容毫不相袭。开篇四句传神而简练的勾画出了农村生活的宁谧清幽，以及诗人的身心俱静的闲适生活。此诗的关键之笔在于“相见无杂言”六句，表现了诗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交往人群以及彼此关切的新话题：这就是农夫、野老、乡邻，彼此真诚相待，随意交往，亲密无间。而所谈论的话题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昔，“但道桑麻长”，关心的是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企盼的是未来的收成和对庄稼的忧虑：“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前人黄文焕说：“一切出仕应俗之苦套，不复耳矣”。（《陶诗析义》卷二）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平淡而又真诚，言谈的内容真是纯然的“田家语”了，但却充满着真情厚意。温汝能说：“‘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陶诗汇评》卷二）第三首是：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主要表现诗人种豆除草，参加农村劳动之后认识到体力劳动的艰辛，真正写出了知识分子离开官场之后从事耕耘播种的体验与内心感受，以及躬耕自食的决心。整首诗全用赋法，一气呵成，既没有环境渲染，也没有比兴之词，直抒感受，结尾两句以简括议论点明主旨，表明“吾驾不可回”的信念。至于第四首则是：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歿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描写诗人农村闲暇之际的闲游和对荒墟的寻访与感慨，这似乎与田园耕作关系不大，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动乱现实和江州一带军阀混战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第五首：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这首诗着重描绘农村生活的悠闲与简朴，但又充满着和谐宁静的气氛。这组诗较为全面而细致地展示了陶渊明最初回归田园隐居生活的乐趣和诗人初涉劳动的体会，是一个五度从政而又五度归隐的文人心路历程的形象展示，也是一个“有志不获聘”的追求者被迫隐归之后复杂内心世界的折光。整体说来，《归园田居》似乎是陶渊明归隐之后不久的作品，因而，作者对农村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艰难体会还不够深，诗歌的基调充满着乐观清新，轻松闲逸的情绪，这显然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西田舍获》、《有会而作》等躬耕自资多年后所写的田园诗歌有不同的感受，它代表了陶渊明归隐前期的田园诗歌风格。

在陶渊明的农事诗中，不少的作品由农村风光的恬淡，收成的企盼转向对人生的思考，对体力劳动的新认识，那么——

###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表现了诗人的什么感受？

陶渊明写了三十多首田园诗歌，必须指出，他的田园诗歌并不都象《归园田居》五首那样情调闲逸，气氛平和，萧散疏淡，景色宜人。在他的不少农事诗中，内涵更为丰厚，触及的范围和反映的现实是如此的深广，象《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便是一首充满着人生哲理和对体力劳动、农业生产新认识的重要篇什，值得认真探索：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未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及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要理解此诗的思想意趣和诗人的感受，必须明确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所谓庚戌岁，即晋安帝义熙六年（410），此时，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过着田园躬耕生活已经有六年之久了。平凡而繁重的农业劳动，司空见惯的田园农舍已经失去了新鲜感和诗情画意般的浪漫，诗人面对的是西田早稻成熟后收割的劳累和劳动之余的酌酒解乏，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深沉思考。

破题四句完全撇开早稻的收割而将目光转向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哲理思索，那就是必须保证物质生产，创造必要的物质财富，这是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这样的认知只有通过较长时间的农业生产的磨难，体力劳动的考验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这些，对于已经在农村生活六年之久的陶渊明来说，更是他的劳动体验和人生艰辛的洗礼后的思想升华。至于“开春理常业”十句，进一步展示农田劳作的艰苦和对农业收成的期待。尤其是“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的认识，身体虽然十分疲劳，可他却用不着担心意外横祸的降临。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颇为费解，联系到本年八月之前，浔阳、豫章一带晋军与卢循军激战不断的事实和晋代官场的腐朽黑暗，陶渊明的忧虑就不难理解了。这比他在五年前写的《归园田居》中“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认识又大大地进了一层。至于“盥濯息檐下”六句则是收获早稻归来的轻松自在的地休憩与对躬耕自食生活道路的认定和坚持。

如果说《归园田居》五首是一组讴歌田园幽居的闲适悠然之作，则此诗主要表现的是躬耕的劬劳，人生的艰辛和诗人愿为田园躬耕付出一切而无悔的人生选择。这里没有旖旎的田园风光，幽闲的生活情调，只有对体力劳动的深切体会和人生不易的沉重思考。谁能说陶渊明的田园诗都是那闲逸舒

缓，那么充满诗情画意，那么牧歌式的疏淡！读了这样的农事诗，绝对有助于我们对陶渊明的全面理解与重新认识，有助我们对陶渊明田园诗歌的准确评价。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这样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我们评价陶渊明，研究他的田园诗歌时也应取如此的态度。如果我们再把陶渊明反映田园之作的《劝农》、《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等诗歌结合起来予以审视，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陶渊明的农事诗的全貌了。生存的不易，劳动的艰辛，缺衣少食的困乏，对温饱的期待……这些决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性本爱丘山”，“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等所能涵盖的了。我们既要肯定陶渊明田园诗中的闲逸情调，也要看到农事的艰辛与生存的不易，这才是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丰富内涵与多采多姿风貌。

在陶渊明归田隐居之后，诗文中常常提到他的故居，也写出过“种豆南山下”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句。陶渊明又遭受到火灾的侵害，他的居处自然有所变化，那么

### 陶渊明的旧居到底有哪些地方？

陶渊明的出生之地是江西浔阳柴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居住之地并非一处，而是有所变迁。古直在《陶靖节年谱》中说：“先生里居，旧说多不能，余尝攻之。先生盖少长栗里，迁居上京，再迁南村终焉。”朱自清则说：“渊明始居柴，嗣三经移居，上京、南村、浔阳是也”。（《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逯饮立先生对陶渊明的住宅作过考证，指出有三处，“一为上京（里）闲居，一为园田居（古田舍），一为南里（南村）。”并对三处住宅的环境有所考证：“此处住宅（上京）有东窗（东轩），窗外有林园，称东园，园内有孤松，有菊，有东篱。……陶四十二岁所归之园田居，为又一住宅。此住宅的特点是：僻处南野，座落在一穷巷内，有草屋八九间，绕屋树木茂盛，宅前有水塘。陶于二十七岁时，即曾来此住宅。……义熙八年（412）即四十八岁时，（陶渊明）又移居南里（南村）。义熙九年（413），《与殷晋安别》云：‘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义熙八年（412），《移居》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实写此住宅房屋狭小，与闲居、园田居两住宅皆不类。陶之住宅可考者有此三处。……陶五十还上京居住，直至母老，未再他徙。颜延之《陶征士诔》云：‘元嘉四年，卒于浔阳之某里’，即此上京闲居”。（《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魏正申先生根据各种有关资料为陶渊明的居里作了一番考证，列出表详记其事，录此备览。



居住地名	地址	居住时间	陶集中所述的环境特征摘录
柴桑	江州当阳郡柴桑县（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这是陶渊明的故居	（一）出生到30岁（公元365年至394年），从出生至续娶翟氏夫人前。 （二）37岁冬至40岁夏（公元401年至404年），居母丧期间。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二首》一），“宅边有柳树”（《五柳先生传》），“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与子俨等疏》），“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时运》），“东园之林，枝条载荣”（《停云》），“流目视西园，烨烨荣紫葵”。（《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上京	柴桑县之一里（今江西省星子县城西郊）	（一）31岁至37岁冬（公元395年至401年），从续娶翟氏夫人至母丧前。 （二）41岁冬至44岁6月（公元405年至408年），从彭泽县归田至上京居住，毁于火。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田园居》五首其一）“绕屋树传颂疏”。（《读山海经十三首》一）
西庐（西畴）	陶家田地上的庐舍。离庐山西林很近。	44岁7月至47岁春（公元408年至411年），从上京居处烧毁后至搬迁南村之前	“茅茨已就治”。（《和刘柴桑》）“新葵郁北牖，嘉穗养南畴”。（《酬刘柴桑》）
南村（南里）	当阳负部（今江西省九江市交区）	47岁7月至63岁11月（公元411年至427年）直至逝世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之一）“南窗萃时物，北林荣且丰。”（《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从以上所征引的资料和这张表不难看出陶渊明的居住虽然经

历过四次徙迁，但是其范围都没有超出浔阳一带，可见他对生他养他的故园乡土有着极为浓厚的感情与执著的依恋。他虽然几度从政外出为官，家园之恋却是如此强烈：“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翌年所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也有：“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对田园故土的相思情结一直萦于胸中：“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己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所以，尽管陶渊明数次移居迁徙，可是对于他的故园乡土总是那样眷恋热爱，无论是柴桑、上京，还是西庐、南村，实际上都是他的故乡，地域均在九江一带。

在陶渊明的诗集里，有《杂诗》十二首，前人在辑集时将其汇集于一处，统称《杂诗十二首》。那么——

### 陶渊明的十二首《杂诗》 表现了怎样的情致？

对陶渊明的十二首《杂诗》，前人多以类相从，把它们汇集在一起编在第四卷中。王瑶先生在为《陶渊明集》整理注释时，在前人的基础上钩稽有关资料，参之己见，对陶渊明的诗文作品作了系年考证，尽管还有一些作品的编年依据不够充分，有的也未必允当，可他的研究较之于前人是跨进了一大步。对于陶渊明的这十二首《杂诗》，王瑶重新作了编排和系年，他的意见是：“按十二首中前八首词意连贯，当为一时所作；而第六首中有‘奈何五十年’一句，知此八首当为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414）作，其余第九首以下三首，都是写旅途行役之苦的；在《与子严等疏》中，渊明自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知此三首当为盛年所作。渊明于三十六七岁间，行役甚苦，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内容与《杂诗》第九首以下三首相同，知当为同时所作。《杂诗》第十二首诗意隐晦，无从确定年代；但以排列次第而论，十二首中后四首原必与前八首分编两处，后人因题目都是《杂诗》，遂并为十二首；如此则第十二首与前面咏行役的三首。或为同时所作。今将前八首与后四首分编两处，皆题《杂诗》。除前面八首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414）外，其余四首暂列此处，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辛丑（401），本年渊明三十七岁。”

应当说王瑶的编年以诗歌的内容为依据虽然并不绝对准确，参之于陶渊明的行实，尚无杆格，可信从。这样，把十二首杂诗分别为37岁时所作的四首和50岁时所作的八首两组，自然较之于以类相从的笼统编排还是要可取一些。魏正申先生在王瑶分类系年的基础上，把后四首杂诗中的“袅袅松标崖”一首系于陶渊明十五岁时所作，其依据是此诗中的“婉变柔童子。年始三五间，”诗人以童子自况，并且又说“三五（十五）间”，因而认定为陶渊明十五岁的作品，不为未见。其余十一首的系年均同于王瑶。

分出了《杂诗》中的前四首和后八首的系年，对于把握诗旨是大有裨益的。所谓《杂诗》，是诗体的一种，就是杂感诗。按照李善为《文选》作注时的解释，就是“五言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体例，遇见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即可吟咏抒发，内容庞杂，所以用《杂诗》命名。我们现在就分三组来审视陶渊明的十二首《杂诗》。

其一：

袅袅松标崖，婉变柔童子。  
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  
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诗人言柔弱纤细的山岩小松，虽然眼下还不强壮。但是挺立岩际，遭遇风霜雪冻却不能使之屈折，假以时日，定然能在极为严峻的自然环境中成长壮大，成为栋梁之材的。暗寓了诗人的不凡襟抱和远大志向。如果说此诗中的“三五”是诗人写作此诗时的年龄，那这就是陶渊明的

最早的诗篇了，展示了“少年壮且厉”的诗人挺拔孤介的个性气质。至于其余三首，将逐一探索：

遥遥从羈役，一心处两端。  
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  
日没星与昂，势翳西山巅。  
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  
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  
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

如前所述，这是陶渊明 37 岁时所作慨叹羈旅行役之苦和表现诗人从政做官与归隐躬耕内心矛盾的诗歌。离开诗人眷恋的故土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忙于琐屑的公务，内心充满着矛盾，究竟继续为官还是归田隐居，始终拿不定主意。兼之路途劳顿，正常的食宿规律被打乱，对亲人的忆念，对故园的梦牵……真使情感丰富的诗人不堪为怀了。至于第三首和第四首分别是：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  
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岩。  
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  
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  
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  
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羈。  
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

我行未云远，四顾惨风凉。  
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  
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  
离鸱鸣清池，涉暑经秋霜。  
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

这两首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抒发了诗人沉沦下僚而不得不长年累月地奔波在外去办理那些永无了结而又乏味的冗碎杂务的苦况。这些繁杂琐屑的事务当然不是那些高官显贵所染指的，只有象陶渊明这样作大军阀的参军、幕僚之类的浊官才去干的若差使，这未免使“少年壮且厉，”具有“大济苍生”怀抱的诗人感到大失所望，他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中所从事的工作之间反差太大，这在诗人内心深处造成强烈的冲撞，失去平衡，自然遣词危苦，牢骚满腹，情绪激荡了。此时诗人正在桓玄幕府充任僚吏，当然不会有良好的情怀和心态了。

其余《杂诗》中的八首，所抒发的情感又是一番景象。此时陶渊明已经五十岁了，社会经验的积累，人生阅历的丰富，清静任真观念的形成，贫困潦倒生活的磨炼……诗人变得更加现实和理智，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消沉，委运任化，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平淡；达观乐天，过着躬耕闲散的平凡生活。这些思想感情在《杂诗》八首中有不同程度的展现，比如嗟叹人生无常，岁月流逝，及时饮酒为欢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

此已非常身……得欢当为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和“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二春蕖，今作秋莲房。……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在叹息流年逝水的惊恐中，除了及时为欢之外，也还不乏自勉和感伤。至于“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和“丈夫四海志，我愿不知老”两首中对岁月催人老，大丈夫壮志难酬的深沉嗟叹里仍然闪现出“有志不获聘”和“丈夫四海志”的功业追求。至于“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等句，则在岁月的流逝中又蕴含着对少壮时的猛志的甜蜜回忆，以及对前途的期待和珍惜时光的自励、自警。有的则是对一事无成蹉跎老大的心惊：“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以及陶渊明对隐居躬耕的田园生活的心安理得，乐道守贫的自适：“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

要之，陶渊明的十二首《杂诗》诚如诗题所言，是一组内容极为复杂，感慨良多的诗歌。前四首和后八首有着明显的差异，表现了诗人极为矛盾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生感受。

在陶渊明描写田园隐居的诗歌中，《和郭主簿二首》写得很有特色。那么——

### 《和郭主簿二首》表现了什么样的情趣与追求？

陶渊明的这两首诗是给他的友人郭主簿赠诗的和作。郭主簿是陶渊明的好友，具体生平事迹已无法详考了。这两首大约作于晋安帝元兴元、二年间（402—403）。这时陶渊明因为母亲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去世而辞去桓玄幕府职事居丧在家，脱离了日夜奔忙的吏事，回到清悠宁静的大自然怀抱之后，心情十分轻松愉悦。因而这两首诗中所描绘的景物虽然时令不同而呈现出各异的风貌，但是都显得那么恬淡萧散，挥洒不拘，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先读第一首：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飏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  
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这首诗由三个层次展开，“蔼蔼堂前林”四句以轻舒而含情的笔触描绘了夏日农村的可人气象：中夏时节，晴空万里，烈日当空，天气开始转热了。然而诗人农舍堂前的树林，绿化环境，阴蔽房舍，清阴多凉，凯风送爽。飘飘然散去了热暑，拂动着半敞开的衣襟。这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涤尽烦芜的情景啊！“息交游闲业”以下十句为第二层次，是诗人面临田园美景的生活安排和起居作息的随意自在。诗人断绝了官场酬酢和繁缛交往，过着无忧无虑轻松随意的读书抚琴，饮酒赋诗，灌园艺竹，和培养下一代的自在生活。园中新鲜时令的蔬果，仓储粮食，不必为生计而担心，自己种植的粮食酿制的新酒自斟自乐……这对于一个物质生活要求不高的诗人来说已经完全满足了。还有什么奢望使人困扰呢？诗歌的“此事真复乐”以下四句是第三层次，正是对这种简朴真淳的田园生活和天伦之乐总结性的照应。有如此简单朴素的居住条件，清幽宁谧的自然环境，不愁衣食的生活，与儿子戏玩的天伦之趣，足可以忘记一切富贵荣华，“浮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自然产生。

至于第二首，则有不同的感受：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这首诗显然与上首所写的时令完全不同，因而知道这两首诗并非作于同时。前首所写为仲夏，此首诗刻画的景色则是深秋。这首诗由两个部份构成：“和泽周三春”十句为第一部份，写由春至秋季节变换带来的不同的景色，重点描绘了清秋时节肃杀萧疏中的秀逸高耸的山峰和经严霜而不凋败的松菊，是那样独秀挺拔，令人敬仰，从而寄托了诗人高标绝俗的为人和不向恶浊现实屈服的节操。“衔觞念幽人”四句是第二部份，是诗人对友人的忆念。

陶渊明的这两首诗尽管不是写于同时，但所和赠的对象都是郭主簿。两首诗中的环境烘托与情感抒发也各不相同，但二者的共同之处是诗人的把景物描写与情感抒发巧妙的结合，触景生情，情融物中，物我浑一，意味隽永是这两首诗的共同特征。此外，这两首诗无论写景还是抒情，都显得手法自然，遣词平淡，决不着力雕琢，却饱含深情。陈廷焯说：“渊明之诗，淡而弥永，朴而实厚，极疏极冷极平极正之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此陶公所以独有千古，无能为继也”，（《白雨斋词话》卷八）是不错的。综观这两首诗，确实感到陶渊明风格平淡和情意诚挚的特征。人际交往，贵在情真意挚，这两首诗之所以脍炙人口，耐人寻味，“朴而实厚”的情愫是其关键。

陶渊明的诗集中有《移居二首》，是写他的家迁居到南村时的情形，那么——

陶渊明为什么要迁徙到南村去居住？  
《移居二首》表现了什么思想感情？

如前所述，陶渊明的居住处所不只一处，即有柴桑、上京、西庐、南村四处。既然住处较多，自然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兴趣选择居住。而且，陶渊明的几个住处都在庐山脚下，相距并非遥远，迁徙也很方便。不过，他之所以要移居南村，并非为了追求新奇，也不是选择吉祥住宅，而是为了和志同道合的“素心人”为邻里。这在《移居》第一首中，诗人就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移居于南村大约是晋安帝义熙六年（410），由上京迁来。元人李公焕在陶渊明《戊申岁六月遇火》诗后笺注说：“靖节旧宅居于柴桑县之柴桑里，至是回禄之变，越后年徙居南里之南村。”此时，陶渊明46岁，已经归田六年之久了。据陶渊明在诗中说，他想移居南村是很久以前的愿望：“怀此（移居南里）颇有年”，其原因倒不是为了舒适吉祥的居所，是因为南村一带有很多淡泊名利，志趣高雅，与自己情投意合的“素心人”之故。也就是说是为了选择好的邻居。这里所谓好的邻居，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原来是一些可以“抗言”高谈，畅叙心曲的朋友，彼此没有什么芥蒂和隔膜，能够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地进行深层次的心灵沟通的知心人。大家在一起品鉴有趣的诗文作品，研讨疑难问题。至于这些“素心人”是指那些，当然是和陶渊明志趣接近的人。所谓“素心”，就是淡泊利禄，不慕荣利，忘怀得失这样的人吧！有人认定是指殷景仁、颜延之等人，也不无道理。但我想，一定不止这些，总之是和陶渊明志同道合的人吧。在封建社会中，确如温汝能所说：“素心人固不易多得”。因而，陶渊明宁愿全家徙居相就，目的就是为了选择好的邻里。孟母三迁的故事不消说陶渊明是异常熟悉的，而且深以为然了。黄文焕说：“胸中能具疑义者几人？非真正读书，不能蓄疑”。（《陶诗析义》）又对“素心人”作了重要补充，那就是必须有见解，有志趣，淡泊利禄，忘怀得失的真正读书人。即能进入读书境界之人，能对书中所述存疑，并且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移居》的第二首表现的是另一种追求：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这里展现的是与南村“素心人”之间的诗文唱和，斗酒畅饮，日常农务，闲暇聚晤，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却在诗人笔下显得那么富有生气和意趣。诗的结尾“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既是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深切体会，也是他与这些“素心人”邻居的共识和共勉，也与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的：“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的见解完全合拍。道理很清楚，无论陶渊明和那些“素心人”如何淡泊名利，忘怀得失，但是，只要他们辞官隐居，就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和经济来源，要生存，要与邻里往来抗言高论，赏析奇文疑义，登高赋诗，饮酒闲聊，……一切都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和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的确饱含着陶渊明对人生艰辛，生存不易的深刻认识和体会，衣食之需，温饱之求，可以说是人生存的最起码的条件了，要满足这样的条件只有辛勤劳动，努力耕作。这样的认识对于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又曾经做过几任官吏的知识分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没有经历过生活磨难和劳动锻炼的人，没有经受饥寒折磨的人是很难获得这种见解的。



陶渊明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采菊，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秋菊有佳色”，“芳菊开林耀”，“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等等，那么

### 陶渊明为什么那么喜爱菊花？

菊花是一种草本植物，它的特点是不畏严寒，傲霜雪而开，很早以来，古人就懂得采菊花用来泡制饮品食用。屈原在《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说，采菊而食，或者用菊浸泡酒饮用后可以长寿延年。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醒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说明陶渊明对菊花的喜爱与钟情。古人以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日、月都在九，九为阳数，所以叫重阳节。而九与久又谐音，因此把九月九日重阳佳节理解为“久久”吉祥之节。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古人于重阳节这天登高、郊游、饮菊花酒，就可以驱除瘟疫百病，长春健康。也就是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中所称：“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所谓“制颓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强健身体，预防衰老。萧统《陶渊明传》云：“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与此诗所述的情调一致。陶渊明非常喜爱菊花，在他的园中就种植了不少，同时也在诗中多次提及菊花。朱自清先生说：“菊花是可以吃的。渊明自己便吃。《饮酒》之七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可见是一面赏玩，一面也放在酒里喝下去。……九日喝菊花酒，在古人或许也是件雅事呢。”既然菊花可以吃，又可以用来泡酒饮用，还可以作为观赏的花，又是开放在百花凋零的深秋季节，因而陶渊明不仅偏爱菊花，广泛种植，时或赏玩，又用菊花浸酒饮用。所以他既种植菊花，又要采撷。当然，菊花之所以赢得诗人的百倍宠爱，还与菊花不畏霜寒，独放于百花消歇的秋季有关。诗人显然以菊花的高贵品质和孤放于严寒的个性以自况其不合时流的人格节操。

在陶渊明咏菊、采菊诗中，最受人注意的莫过于《饮酒》诗中之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的旨趣和意境不难理解，并且几乎被引用者阐释得淋漓尽致了。只是诗中的“南山”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两处还有些不同的看法，在此我准备略加辨析。关于南山，有的认为是指庐山，陶渊明居处即在江西九江柴桑里，正在庐山麓，所以时刻可见。这南山也就是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中的：“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中的“南岭”。另一种见解则指南山是用典故，它与采菊服食紧密相关。既然食用菊花之后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久视，因而“南山”也就是化用《诗经·小雅·鹿鸣》中所说的“如南山之寿”的祝愿，南山是寿者的象征。也就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中的南山之意了。两种理解皆可通，前一种是自然景观的写真；

后一种则是融入采菊服食后的用典。相比之下，前一种倒更惬意自然一些。试想陶渊明居住于庐山脚下，时常领略着庐山的秀色。一面埋头赏菊、采菊，疲倦之后放目远望，庐山秀峰自然闯入眼帘。“悠然望南山”，正是执著于近处风物之后放目远眺的自我调节，这时庐山在遥远的天际屹立着，更加符合侍人近观远眺相结合的观察习惯，也与诗中意趣切合。

对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的“真意”、“忘言”的解释，一般都认为受魏晋玄学的影响，王弼的言不尽意的理论，得意忘言的见解是陶渊明这两句诗歌所本。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尽意者莫若象，尽象者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指出。言语是明象的手段或工具，如果已经获得了象的意义，就可以把语言忘掉，舍去；象是意的载体，如果已经得到意，完全可以把象舍去。言和象仅仅是为领略意而存在的一种凭借和载体，目的是要获得意的真谛，因而得意之后，言、象已无存在价值。陶渊明的这首诗，就是阐释获得真意之后对言的超越。这里所表现的是诗人幽居独处，采菊服食，与大自然美景中的草木禽鸟和谐相口陶渊明悬案揭秘处，亲密无间的超然境界和物我融合的神态。

另一种见解认为陶渊明诗中的“真意”是对各种关于真的解释的混同，究竟是《庄子·渔父》中“法贵天真”的“真”，“归真反璞”（《战国策·齐策》）中的“真”，“味道守真”（《后汉书·申屠蟋传》）中的“真”，还是“养真”的“真”，“任真”的“真”呢？是很难加以分辨的，更难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真意”是刹那间的感觉，一种顿悟。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人生体验就够了，何必枉费精神，对“真意”寻绎求解呢？“偶然多妙悟，尽在不言中。”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的态度和作风。《庄子·齐物论》说：“辩也者，有不见也”，又说：“大辩不言”。就是说深刻的道理要靠自悟，不待语言来分辨。《庄子·外物》还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谓语言的目的在于分辨和求得真意，真意既已得到，就不必再考虑用语言分辨表达了。陶渊明这个“真意”、“真趣”是在人境结庐的环境里得到的，所以这首诗的结尾恰好与开篇的“心远”前后呼应。

两种解释看似不同，实则皆共同以庄子思想为基础，相比之下，后一说法更加符合陶渊明的为人与个性，他是不大喜欢烦琐考证和细微区别的。管你什么真意，只要获得了物我浑一的感受和体验，顿悟了人生真谛，一切言辩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了。这与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的价值取向完全合拍。

在陶渊明的一些咏史诗中，通常借用古人古事来抒发现实感受，把咏史与抒怀言志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导出——

### 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 是诗人的文学写照吗？

《咏贫士》七首是陶渊明经历了仕途坎坷，归田隐居之后的作品。诗中饱和着陶渊明的人世沧桑之感和生活艰辛的深刻体会，更融铸了穷且益坚，为完善自我人格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展现了诗人的人生态度和精神追求。是研究陶渊明的为人、生活和思想的重要篇章。据王瑶先生考订是陶渊明五十六岁时的作品，这时东晋王朝已经寿终正寝，正是宋武帝刚即位的永初元年（420）。第一首是：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辉。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诗歌用比兴的手法，以无依无靠的孤云自拟，与有所凭借和依托的万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不仅是对依恃门阀世袭而把持朝柄的士族的影射和冷嘲，更展示了孤云的耿介不阿的可贵品质，以及“量力守故辙”，不以饥寒潦倒为意的精神追求，是诗人孤独而高洁情怀的象征。元人刘履说：“所谓朝霞开雾，喻朝廷之更新；众鸟群飞，比诸臣之趋附。而迟迟出林，未夕来归者，则又自况：其审时出处与众异趣也”。（《选诗补注》）不无道理。第二首：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此诗直抒胸臆，具体详细地描绘了陶渊明晚年生活的窘困匮乏，饥寒交迫，无心读书的苦况，以及诗人以大贤孔子为精神力量克服艰辛，度过难关的决心和坚持“厚志薄身”的价值取向。第三首：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  
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  
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  
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  
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

诗歌通过古代贤者荣启期、原宪虽然贫困潦倒却不放弃精神追求，安贫乐道，保持了正常的心态的事迹来勉励自己身处乱世，不能因境遇的艰难而动摇，也不能为不义之财的引诱而动心的情态。《列子·天瑞》说，有一次孔子游泰山，见到了年已九十岁的荣启期，他身穿鹿皮裘服，用绳索做衣带，情绪很好地一边鼓琴一边唱歌，孔子问他为什么这样快乐，他的回答是：“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这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确实乐天达观，很具有启发性。至于原宪，也是以贫困高洁著名的，据《韩诗外传》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原宪在鲁国时，有一次子贡乘着高车驷马去见他。原宪去开门，整顿衣襟时衣袖破烂而露出了臂肘，穿鞋子时鞋后跟又裂开了口，于是被子贡嘲笑。原宪对此讲了一番话：“宪贫也，非病也。仁义之匿，车马之饰，宪不忍为也。”子贡反而感到了十分羞愧，不辞而去。原宪态度从容地唱着《商颂》之歌，声震四处，如金石般的铿锵有力。陶渊明在诗歌中把荣叟和原宪形象引入，自然是用古代安贫乐道的贤者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和精神支柱，用他们的行迹支撑自己去克服重重艰难。而第四首则是：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  
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  
从来将于载，未复见斯传。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贫穷之士并非无才之人，高贵之家不乏无能之辈，这是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的真理。陶渊明对此更有深刻的认识和真切的体会。他在这首诗中援引皇甫谧《高士传》中黔娄的故事为吟咏对象，重点突出其洁身自好，不慕荣利，坚决辞让鲁国权位，拒不接受齐王重金的高尚品质，认为他是历史上杰出的罕见人物，展示了诗人为了崇高的理想甘愿贫穷守节的志趣，是很感动人的。

《咏贫士》的第五、六、七三首，分别对古代既穷且贤的典型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人的事迹抒发感慨。袁安饥寒冻馁而孤介耿直，阮公鄙弃钱财而辞官，张仲蔚贫困而长于诗歌，黄子廉清贫终老。诗人从他们的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力量：“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收住了这组诗。可见，这组诗不仅称颂了古之贫贱潦倒守志坚贞，贫贱不移的高贵品质，更重要的是给陶渊明以精神楷模和力量源泉。诗中这些贫士已经不仅是古代坚持理想，不苟合取容的贤能之辈事迹的简单复述，而是倾注了陶渊明的人格力量，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是诗人归田之后历尽躬耕自资而维持生计尚感困难的反映，这些贫士形象中无不闪现着陶渊明的为人行事和理想操守，称他们是陶渊明的文学写照是恰如其分的。

也有人认为《咏贫士》七首是陶渊明写于彭泽归田后的岁末，即晋安帝义熙乙巳年（公元405年），诗歌在于自述其归田后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道路及其坚定性，可备一说。

陶渊明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正月五日这天和他的邻居朋友在斜川游玩，写了一首《游斜川》诗歌。有人认为这反映了陶渊明的傲视门阀士族的门第观念。那么——

### 应当怎样解读《游斜川》？

陶渊明的《游斜川》是一首春日郊游，与友朋聚会寻胜的诗歌。诗前有序：“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纺鲤耀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这段序文对于陶渊明等人的斜川之游的目的，追求，其时斜川风物景致，所闻所见和感受体会都叙写得非常清楚，对于我们把握此诗的底蕴非常重要。

时间既是正月初五的胜日，天气又那么晴朗清和，风物闲静优美。这时诗人邀约了被称为“素心人”的邻里，一同游览位于庐山附近翻阳湖畔的斜川。他们站在溪边，远眺位于庐山北面的曾城山，情怀舒展，溪水中的游鱼自由游荡，水边鸥鸟乘着春风上下飞翔。庐山的秀美景故大家早已熟知，不再把它作为吟咏的主体；曾城山孤峰独秀，矗立众山之外，使人联想到昆仑山的曾城。众人诗兴勃发，题咏唱和。时光如逝水而催人衰老，彼此把各自的年龄籍贯和旅游的日期记录下来作为纪念吧。同游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诗歌写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已经无法详知了，所幸的是陶渊明的诗歌倒是完整地保留下来：

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  
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  
迴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  
虽徵九重秀，顾瞻无匹俦。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这首记游咏怀的诗歌明白晓畅，直抒胸臆，景物描绘也清新鲜活，完全没有故实堆砌，表现了诗人与友人邻居胜日寻春，登山临水的高昂兴致和乐以忘忧，及时为欢的旷达情怀，我们似乎感觉不到陶渊明傲视门阀士族门第观念的意向。逯钦立先生认为：“陶渊明那种傲视门阀上族的门第观念，还表现在他有意仿效西晋元勋贵族后代的遗风和遵循晋朝礼俗典制的态度上。具体事例便是他五十岁时所作的斜川之游”（按五十岁之说有误），逯先生指出：

“西晋时，晋朝元勋贵族石苞的儿子石崇曾于元康六年（公元296），在其别业金谷举行过大型的祖饯宴会。这就是后世传称的《金谷集》。《金谷集》的特点是：与会者皆当时名流，宴会上要饮酒赋诗，有专门写的序文

来叙述宴集，并记录宴会的年月日与会者的年龄、乡里、官爵。当时年岁最大的是石崇的姊夫苏绍，年五十岁，名列第一。这次宴集的目的，是要夸示石氏家族政治势力的煊赫，社会地位的高贵和别业田庄的广袤。……到了东晋，门阀士族王羲之，于永和九年（公元 353）春，在其别业兰亭，也集合名流，搞‘修楔事’，赋诗饮酒。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显然王是有意仿效石崇《金谷集》的。而这次宴集的人物之多和规模之大并不下于《金谷集》。所以当有人将《兰亭集》和《金谷集》相比时，王羲之表现出由衷的高兴（见《世说新语·企羡篇》）。晋朝的家世贵族有这种比赛派头的习惯。”逯钦立先生说晋朝世家贵族比门第、家势、派头的习惯是不错的，认为王羲之规步石崇，也很有道理。但以这种眼光来看待陶渊明就未必允当了。逯先生接着讲：“陶渊明中年以后，家庭日益贫困，似不应怀有门阀士族王羲之那种兴致。可是，他是东晋元勋贵族的后代，平日傲视门阀士族。王羲之能搞的‘风流雅事’，他要去比赛也是很自然的。于是他选在五十岁时（即义熙十年春），举行了有二三邻曲参加的‘斜川之游’，作有《游斜川》诗，以显示自己门第的高贵和个人的自豪感。……诗序结尾说‘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纪其时日’，其内容基调和文字形式与前引石崇《金谷诗序》是何等相似。东晋人模仿石崇《金谷集》的，王羲之一次，陶渊明一次，真是无独有偶。王羲之作为东晋缔造者之一元勋贵族王导的侄辈，既然能够仿效石崇以《兰亭集》炫示其门阀世族地位的高贵和别业田庄的可观，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缔造者之一元勋贵族陶侃的曾孙，虽然已经贫困，没有更多的别业田庄可言了，已经退隐，没有什么官职可言了，然而斜川之游表明，陶渊明还是极其自负地模仿了《金谷集》，以显示陶家门第的高贵，敢于同《兰亭集》的主人门阀世族王羲之分庭抗礼”。（《关于陶渊明》）

我觉得说王羲之的《兰亭集》是对石崇《金谷集》有意规仿和竞争，这在王羲之来说倒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石崇与王羲之相去未久，但二人的家境、身世、祖上的荣光，社会影响都有可比之处。这在陶渊明却未必是这样的了。首先，就门第阀阅而言，石、王两家都很有声势，互为颉颃，而参加金谷咏唱者皆一时名流、诗人、官吏，兰亭聚合也是当时显赫，石、王二人的盛会场面宏富，宴集丰盛，豪华气派。如果陶渊明要仿效石、王盛会，他既没有现任官职的尊荣，又缺乏郊游宴集的物质基础，仅仅邀约了二三不知名的邻曲。这在封建时代，要和石、王攀比，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本钱，可以作为凭借的社会背景与物质条件，岂有以自己之短去比别人之长的道理！再说，就假设陶渊明以陶侃曾孙这唯一可依的背景为支撑，陶渊明也是不可能这样做的。首先，他自己早已认识到他非陶侃嫡传，况且已有五世之隔，早已超过五服，他在《赠长沙公序》中说“长沙公于余于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陶侃的辉煌难以成为他的炫耀之依据。其次，即或陶渊明很在意于陶侃给他的精神上的支撑和潜在影响，而陶侃在东晋士族眼中并没有什么高贵的身世和可资矜持的世系，还被嗤笑为“溪狗”，难道陶渊明不明白这点吗？这样，陶渊明无论其现实背景、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世系门第、与之交往过的邻曲……从那一方面来看陶渊明都不可能成为王羲之《兰亭集》后与石崇争富斗阔，夸示社会地位和门阀出身的。他的斜川之游称之为春日郊游，寻胜觅幽是完全正确的，与仿效石、王毫不沾边。再说，陶渊明当时贫困潦倒到了衣食不周，难免冻馁之际，那里还有

什么摆阔的物质条件与兴致呢？何况他又一再以“忘怀得失”，“不慕荣利”自许，家境自来就很贫乏，连饮酒的最基本要求都不能经常满足。如此的个性，这样淡泊名利的为人，贫困的家境，根本不值得夸示的身世，现实生活中的潦倒经历，官场坎坷，一生几度为官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令之类的低级品秩……结交的友人邻曲也是名不见经传的素心人，试想，他会以一生中最不称意的蹭蹬失意去与青云之士，富豪之家比赛么？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游斜川》只不过是诗人春日与邻居一道郊游的记事咏怀诗而已。

陶渊明自称“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对大自然的秀丽景色和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都有着天然的深情，这在他的田园山水诗作中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这些爱好中——

### 陶渊明咏鸟诗中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情趣？

陶渊明是一个性爱丘山，以大自然为依归，以山川草木为友朋，鸟兽虫鱼为伴侣的诗人。在陶渊明的笔下，山川含情，田畴喻意，草木可亲，花鸟友好，是诗人以我之情为大自然的一切景物禽鸟着上的个性的色彩之故。因而，在品鉴陶诗，吟咏其诗文时常常极自然地体味这些审美对象中附着的浓郁的诗人性格特征，陶渊明对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有浓厚的兴趣，而情感似乎独钟于鸟类。据不完全的统计，陶诗中咏鸟的诗歌就有六首之多，此外，那些虽未咏鸟而言及鸟类的诗歌竟有42处。这确实是一不可忽视的数量。

陶渊明为什么那么偏爱鸟类呢？这自然有一番道理。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的时期，鸟儿是唯一可以不受拘束，自由自在地翱翔天际的动物了。它们筑巢而居，随意觅食，生活自由，飞翔自在，鸣叫悦耳，和善可亲。多种羽毛美丽而丰满的禽鸟的鸣叫，不仅为人间带来生机和春意，而且唤起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联想，对自由无碍生活的向往。因而与“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和追求自由放达，无羁无束生活情调的陶渊明特别吻合，引发了诗人对鸟的浓厚兴趣与深厚感情。陶渊明诗中的鸟儿，不仅具有大自然中鸟类的灵性和技巧，而且更具有诗人的性格特征，成为诗人托物言志的最佳载体和理想的象征了。宋人汤汉在注解《陶靖节先生诗》时就窥破了陶渊明托鸟言志的艺术方法、评价《归鸟》诗时即指出陶渊明以归来之鸟“托言归而求志”的用意。其实，早在陶渊明辞官归隐时就含情地吟唱过“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诗句，把自己为生活所逼而进入官场比喻为受羁束而不得自由的鸟儿和池中之鱼。其实，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各种形态的鸟儿无不极自然地衍化为诗人的文学写照与思想寄托，精神象征了。他赞赏贾谊“感鹏献辞”的艺术经验，自己也多次以鸟写意喻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表示自己象大鸟展翅飞翔向远方去实现宏伟的政治追求和体现功业愿望的强烈追求。几番痛苦失意的仕途经历之后，他深切地体会到：“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的冷酷现实，感到自己的愿望在那样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绝对没有实现的机会，诗人象一只心灵受到创伤而十分疲惫的鸟儿一样，只得惊恐而无奈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调养身心的伤痛：“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一生遭遇和人生坎坷总喜欢以多种心情和不同形态的鸟儿来体现，以鸟写志，用鸟自况。透过诗人笔下的鸟表述了陶渊明对社会的体验和人生的认知。最集中，典型者当数《归鸟》诗：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  
远之八表，近憩云岑。  
和风不洽，翩翩求心。  
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  
虽不怀游，见林情依。  
遇云颉颃，相鸣而归。  
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相林徘徊；  
岂思天路，欣及旧栖。  
虽无昔侣，众声每谐。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  
游不旷林，宿则森标。  
晨风清兴，好音时交；  
矰缴奚施，己卷安劳。

此诗通篇不见诗人形象，作者托鸟言志，借鸟抒情。在形式上此诗仿照《诗经》，采用四言重章叠句的结构，写出了鸟对生存的树林的复杂心情与感受，重点描绘了鸟儿去林、见林、相林、止林的四种不同环境和独特的感触，隐约曲折地传达出陶渊明从入仕到归隐的人生体验和思维变化过程，以及最后与官场诀别的选择。第一章写鸟儿怀着去游世界，见识社会的美好愿望，一大早就离开了哺育它的茂林，向那“远之八表，近憩云岑”的目标展翅奋进，毫不贪恋故林的舒适。这正是陶渊明乘时建功之业，“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和“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的注脚和艺术写真。可是，外面的天空尽管开阔蔚兰，精彩万端，却并非是所有的鸟儿的理想王国，更不是诗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天堂。“和风弗洽”，暗藏着种种不测和祸机，因而外面的世界又显得很无奈。“翩翩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鸟儿不得不调整方向，寻求新的托身之地。这虽然还不至于铩羽败兴归返，却初尝挫折滋味，先前逸四海的猛志，蹇翮思远翥的远飞宏图，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校正。

第二章是鸟儿一度受挫之后，已经不打算飞翔得太远（虽不怀游），见到了清幽适意的树林，就与伙伴相依相恋地止息了。这大约是诗人少年壮志遭受打击之后，又不能自甘寂寞，短暂归隐赋闲，储备能量，待机再度从政心态的写照，是诗人“心惮远役”，就近为官的意向表露。

第三章写出柏林。所谓“相林”就是对栖息之处的观察、审视。关键之笔是“岂思天路，欣及旧栖”，鸟倦飞而知还，再也不打算作无谓而繁琐的奔忙，寻求平息内心深层躁动的真正栖止之处的清幽环境。这是诗人几度从宦，任职低微，公务冗琐，不堪其苦而决心寻觅宁静田园的心志的流露。心境平和，态度恬淡，性格棱角已在无情的现实中开始钝化，然而却更趋深沉和成熟的标志。

第四章写鸟儿“止于深林”，“戢羽”休憩，决心今后的行动“游不旷林，宿则森标”，去无忧无虑地领略“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彻底摆脱官场倾轧，宦海风波的祸害。这正与陶渊明桂冠归隐，过上了平静而悠然自适的田园生活的心态完全切合，也就是“羈鸟”摆脱樊笼重新回到旧林的适意，“鸟倦飞而知还”的欢欣。

整首诗都以鸟来抒发诗人的仕途遭遇与人生经历，通过鸟最初兴高采烈，信心十足地奋飞天际去领略外面精彩的世界开始，然而外面的精彩世界却并非为这只孤立无援的小鸟所设，当小鸟体会到“和风弗洽”，外面的世界又那么无奈，充满了危险和杀机，它只好 翘徘徊，重新调整目标，最后“戢羽寒条”……鸟儿的出林、见林、相林、止林，几乎简赅地涵盖了陶渊明的仕途经历和人生遭遇。值得回味的是陶渊明作为一个门衰祚薄的知识分子，虽然他的政治追求和人生理想都落了空，但是，他还能及时而正确地校正其奋斗目标，不怨天不尤人，选择了一条适合于自身条件的躬耕田园的生活道路，其实也不失为一种理想追求，不能简单地目之为消极退避。值得庆幸的是他既不孤独，也不悲悒，“倾俦相鸣”，“相鸣而归”，“众声每谐”，“好音时交”正是诗人归隐之后不乏同调和心态平静的流露。

萧统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那么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是否都是谈饮酒的乐趣呢？

### 《饮酒》诗二十首表现了什么情致？

陶渊明的诗歌，确实有不少的内容说到饮酒，但是，真正以饮酒为吟咏对象的作品并不是很多的，无非《连雨独饮》、《止酒》、《述酒》以及《饮酒》诗二十首等等。即以《饮酒》诗二十首为例，虽然题为《饮酒》，可其内容决不止于饮酒，涉及非常广泛，是一组涵盖面极广，现实因素很强的诗歌。

要想准确把握《饮酒》诗的底蕴和诗人的意绪脉络，首先弄清这组诗歌的创作年代是相当重要的。近人作过不少的探索。王瑶先生有所考证：“据序文‘比夜已长，及‘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则这二十首诗当都是同一年秋夜醉后所作的，因此总题为《饮酒》。又第十九首中上面说‘终死归田里’，下面说‘亭亭复一纪’，一纪是十二年，渊明辞彭泽令归田在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乙巳（405），因知饮酒诗当作于义熙十三年丁巳（417），时渊明五十二岁。第十六首中说‘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是追述以前的事情，说明‘四十无闻’之意，不是实际作诗的时间。第十九首中说‘是时向立年’，也是追叙语气；‘亭亭复一纪’这一句是承‘终死归田里’而说的，不是承‘是时向立年’说的。这时正是晋宋易代前夕，渊明感慨甚多。”颇有道理，李华《渊明诗文选》将这组诗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与王瑶的见解接近。总之，可以肯定地说，这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这时陶渊明挂冠归隐已经十二年了，东晋王朝正处于即将灭亡的政治大变动之中。在诛除桓玄和扑灭农民战争烽火中崛起的军阀刘裕，羽毛丰满，两次北伐的胜利，破长安，灭后秦，使得他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迅速膨胀，他这时“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义熙十四年（418），刘裕秘密遣人把晋安帝缢杀，把司马德文作为政治傀儡以实现其代晋自立的过渡。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自称皇帝，改国号宋，改元永初，东晋灭亡。这就是《饮酒》二十首的写作背景，即晋宋易代即将到来的风雨满楼的前夜。

陶渊明凭着自己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他已经意识到剧烈政治动荡的不可避免，因而在这组诗歌之前，有则感慨系之的序文，是捕捉诗人创作心态的锁钥，值得把玩：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诨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序文的平静和恬淡掩抑不住诗人的孤独苦闷和抑郁寡欢的悲愁；与其说他饮酒赋诗，“以为欢笑”，毋宁称之为陶渊明借酒浇愁。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敏感的神经，浇除胸中的块磊，取得醉后的茫然以平衡内心的感慨。这组题为《饮酒》的诗歌实际上是以酒为媒介的咏怀之作。这也就是萧统所称的“寄酒为迹”的作品。如果我们把这二十首诗进行分类的话，大致表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晋宋即将易代的黑暗政治的暴露和对苦难现实，败坏世俗风气

的抨击。如其一“荣衰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觴酒，日夕欢相持”。就是以荣衰变化，贫富不定，暑寒代谢等现象暗示着政治剧变的不可避免。而其二更是透过对善恶报应的怀疑来批评社会风气的好坏不分，善恶颠倒，从而揭露政治说教的虚伪性：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待！

诗歌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怀疑是由无数的作恶多端的当权者往往事事如意，显赫尊荣，而行善积德的贤能之士却穷愁潦倒，困厄失意的事实所引发的。善恶报应不能对此作出圆满的解释，过样的“空言”又能骗谁呢？至于其三“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和其六“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以及其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风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则集中地抨击了败坏的世俗风气和苦难现实，从历史的、哲理的高度上对黑暗政治形势作了深刻的揭露。

其次，是诗人以比兴之词和象征手法自咏其高洁志趣和对事业、人生的追求。如其八：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

不消说这里的青松和众草都是比兴之词，青松与众树相杂，为众草所掩之际似乎与之没有多少差别，然而独出于众树，经岁寒而未凋，才体现出卓然的品质和做严寒的气势，这正是陶渊明高尚人品的象征。至于其十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其十七：“幽兰生庭前，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等，或以西汉的张长公的刚直不阿取喻；或直抒胸臆表明自己的志向；或以幽兰的馨香和秀色自况其履洁怀芳的品行为人，展示其迥出时流的价值取向。是《饮酒》诗的另一重要内涵。

在《饮酒》诗中，还有一部份内容是抒写诗人的孤独和苦闷，以及功业落空的惆怅，穷愁潦倒的窘况。如其四“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显然就是诗人坚持人生理想和完美独立人格在黑暗时代不被理解而产生的深层苦闷与孤独。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其十一：“颜生称为仁，荣公言

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又是对功业无成的喟叹和生计艰辛的哀怨。

当然，在《饮酒》组诗中也不乏轻松写意的篇什，如其五就很有些悠然自适的情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类似的篇章还有其九：“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襟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在轻松的人际交往和浊酒小饮的氛围中，有着坚持理想追求和人格独立的兀傲。这种价值取向和孤介个性，在《饮酒》十三中也表现得极为充分：“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在自我认定的隐居田园的劳累贫困生活中决不轻易改变人生道路，同时又追求把握现实生活乐趣的意志。这种情绪在《饮酒》十九中也有流露：“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以及其十四：“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十五：“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似乎又对人生短暂的慨叹中领悟到壮志难酬的苦闷和及时行乐的肯定。而“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咨无不塞……”似乎就是陶渊明的自身经历：“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

处于晋宋易代前夕的陶渊明，以他敏锐的眼光和睿哲的思考洞悉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50多年的人生道路，结合仕途经历，把深沉的感慨和内心深处的各种矛盾和痛苦，通过饮酒诗的形式，形象而深刻地倾泄出来，是有其深切的用意和特定的历史背景的。生当乱世的文人是很难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尽情倾吐出来的，尤其是晋宋易代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迫害和诛杀无辜，以及那些对时局不满偶尔发点微词和牢骚的文人更是首当其冲。以两晋而论，张华、陆机兄弟、潘岳、刘琨、郭璞、欧阳建等人无不死于统治者的屠刀之下，正如鲁迅所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处于如此的情况之下，作为一个早已过了“知命”之年的诗人，饱经沧桑之变和战乱杀伐，篡逆兵变的洗礼，以及此前文人的不幸遭遇，使得他对现实的不满，对政治黑暗的揭露，只能采取比兴手法，隐微曲折地予以表现。“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使《饮酒》诗披上了合法的而不被猜忌的外衣，用心良苦实在出于不得已。《石林诗话》卷下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

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是很有道理的。苏轼以他诗人和文学家的思维，深悟陶渊明饮酒之命意和《饮酒》诗的创作心态，他在《书渊明《饮酒》诗后》说：“正饮酒间，不知缘何记得此许多事？”又在《书渊明诗》中说：“陶诗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把陶渊明《饮酒》诗的底蕴敞露无遗。总之，陶渊明的《饮酒》诗绝非只言饮酒乐趣，而是一组现实性强，涵盖面广，寄托深微，审美情趣独到的诗歌，闪烁着诗人观察问题的历史高度和哲理认识。清人薛雪说：“陶征士《饮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有‘绛云在霄，舒卷自由’之致”（《一瓢诗话》）。其实，无论从思想高度和美学价值来着眼，《饮酒》诗都不失为陶渊明的代表之作，值得反复探索。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荣，忽值山河改”，是纯粹的自然景物描绘呢，还是另有所寄托？请问——

“种桑长江边”这几句诗出自陶渊明的哪首作品？应当如何理解？

这是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中最后一首的破题四句。《拟古》九首是一完整体系，理所应当全面把握。清人陈沆在笺注《拟古》九首时说：“古诗凡不只一章者，当合前后数章观之，乃可定作者之旨。陶诗本怀，多露什未，如《读山海经》后五首，《拟古》诗后二首，《饮酒》诗末首是也”。（《诗比兴笺》）他的意见是很可参考的，要真正做到准确领悟这四句诗，就必须把《拟古》九首中的所有内容联系起来予以观照，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拟古》九首诗歌的系年，前人倾注过不少的精力，诗中有“饥食首阳蕨”“忽值山河改”等句，古今学者均将其系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前后，王瑶将其系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参合诗意，尚无抵牾，这时陶渊明已经57岁了。

《拟古》就是模拟古诗，西晋陆机就作过《拟古》诗十二首，全是模仿古诗之作。而陶渊明的《拟古》诗，无非是借拟古之名的杂感诗，以吟咏怀抱，倾吐政治见解，批评现实，或以咏史为依托的抒情诗歌。清人方东树说：“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昭昧詹言》），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饮酒》诗写于晋宋易代的前夕，正是黑云压城的政治高压之际的话，《拟古》诗则是宋代晋而立，完成了政权的和平移交以后的作品。当时刘裕篡位之初，尚未对晋室旧臣进行全面清洗，所以诗中言及时政时遣词还不很激烈，反思的意味强于哀怨和谴责。但是，整组诗的基调情绪是低沉和悒郁的。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改朝换代这样的政治变动，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感慨极多，联想丰富。这种情感并非只是对晋室覆亡的痛惜和哀悼，更为复杂的是对新政权刘裕行为的惶惑疑虑和惊恐，是乱世知识分子深感前景难测，苦闷伤徨，以及个人安危未卜的复杂感受。因而在《拟古》诗中，既蕴含着对并不怎么值得陶渊明眷恋的晋室的惋惜、检讨和深痛的反思；也不乏对节义慷慨之士的赞颂与褒扬，以及诗人的苦闷忧虑。我们不妨逐一研读：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  
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此诗的表面含意是说世风不古，交道多变，以感慨人际关系的浇薄。细加寻绎，又还隐约着诗人的仕途感触与个人的命运。诗歌以兰柳茂盛开篇，正象征着陶渊明苦读多年，抱着云锦般的幻想从政为官的现实。可是现实严峻，人情淡薄，中道生变，使得兰枯柳衰，诗人预先的设想和现实的人生际遇不啻有天壤之别，因而被迫归隐田园。有人认为是陶渊明人桓玄为僚吏，

后来发现桓玄的政治野心之后又离去的背景。可备一说。但是，桓玄的势力从膨胀到败亡是晋安帝元兴三年之事，距离陶渊明写《拟古》已有15年之久，其间变化颇巨，是否还会执著于多年前的往事？是值得推究的。《拟古》第二首是：

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  
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  
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  
生有高世名，既设传无穷。  
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这首诗的寓意是颂扬节义之士田子泰的高洁行径，并对疯狂追逐名利之徒给以冷峻的嘲笑。在田子泰的形象中，我们隐约窥探出诗人的个性。根据《三国志·田畴传》记载，田子泰（田畴字）在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时，他受幽州牧刘虞之请，带家客和壮士20多人到长安去朝见献帝，被拜为骑都尉。田畴固辞不受。归来之后得知刘虞被公孙瓒杀害，立即到刘虞墓前哀悼，因而被公孙瓒拘捕。获释后隐居于徐无山中，百姓跟随他归去的有五千多人。邱嘉穗在评论这首诗时说：“陶公此诗，正指汉末田子泰而言，观其出处之正，真可谓节义之雄者，而陶公平生出处，亦与之相类”（《东山草堂陶诗笺》）。并非凿空之论，逯钦立先生则认为：“此诗是回忆元兴三年东下对参与刘裕起义兵事写的。”在征引了田畴的事迹之后指出：“董卓挟汉献帝西迁，田畴致命行在、间道驰驱于幽州、长安间。桓玄挟晋安帝西走，陶渊明为勤王之事，涉险奔走于寻阳，建康间，二者极其类似。诗称田畴之义举，用以自喻，亦所以自赞也”（《陶渊明事迹》之系年）。可以作为参考。托言古人古事以咏己志之意是很明显的。至于第三首：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

诗人托物言志，用燕子不以门庭荒芜而嫌弃背离旧居来表现诗人隐居不仕的选择。这与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同一心态。对故居的依恋之情中自然也含蕴着对晋室复亡的惋惜。陈沆说：“华堂如故，门户已非；旧巢尚存，主人安在？燕独何心，忍依新而忘昔耶”（《诗比兴笺》）。虽然含蓄，但也隐指陶渊明对晋室的眷恋。邱嘉穗则谓：“自刘裕篡晋，天下靡然从之，如众蛰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独倦倦晋室，如新燕之恋旧巢，虽门庭荒芜，而此心不可转也”（《东山草堂陶诗笺》）。也看出了诗人隐居不仕刘宋的用心。逯先生则认为：“以二月春雷喻刘裕二月举义兵。……先巢故尚在二句，喻晋安帝复辟返京师。”（《拟古》诗注），也不无道理。而第四首诗是：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此诗感慨荣华难驻，人世无定，乾坤反复而引发了对深重的沧桑之变的沉思，黄文焕评此诗：“前六语纯从国运更革寄怆。后八语兼指士人生死分恨，然后总结以荣华怜伤”（《陶诗析义》卷四），是中肯的。当然也在一定程度表现出虚无空观的见解，马璞说：“此首伤篡夺者之无知也”。（《陶诗本义》）正是从虚无的眼光获得的结论，陈沆的诠释就更为具体了：“朝宅暮堂，宇宙犹传舍也；山河功名，战争慷慨，谓平定燕秦之人也。贾子曰，夸者死权，众庶冯生。魏武留连于铜雀，孟尝横涕于雍门，许由敝屣夫万乘，唐尧黄屋如浮云”（《诗比兴笺》）。惟其人生易老，荣枯反复，诗人才站在更高的历史水准上冷静地审视人世纷争，逐名迫利者的愚妄，这也是陶渊明在洞悉尘世之后选择归隐田园的思想基础。联系到陶渊明的五次归田，均非出于逼迫，也不是他根本干不下去了的退隐，每次都是他在审度时势，思索人生，权衡利弊得丧和个人性格爱好之后的主动挂冠辞职，应当说这是陶渊明主动选择的人生道路，试图在有限的人生过程中，把握自我，少干一些“违己交病”，“口腹自役……深愧平生之志”的事情了，这正和他“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的认识完全合拍。第五首：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我欲观其人，晨击越河关。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  
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  
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

诗歌以崇敬之笔描绘了穷困高洁之士的独行特立，并愿以之为同调的追求。陈沆说是“渊明自咏也”，深得其旨趣。邱嘉穗也说：“此公自拟其生平固穷守节之意，而托言欲观其人，愿留就在耳”（《东山草堂陶诗笺》）。在作者讴歌的“东方有一士”身上，寄托着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是他隐遁田园，“厚志薄身”，固穷守节思想的文学写照。而第六首则是：

苍苍谷中材，冬夏常如兹。  
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

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  
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  
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  
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

这首诗的命意实际上与第五首很接近，表现了陶渊明坚持个人理想，隐居归田的人生选择，却有时又难免种种干扰，使内心无法平静的苦闷惆怅。诗人既要坚持理想追求，承受贫困潦倒的煎熬，又要抵御各种诱惑和人情酬酢，因而不免引起思绪波动，行止未定的彷徨。这种诱惑除了来自朝廷的征辟之外，又有权贵以崇拜者的名义对诗人的笼络，以及白莲社对他的劝驾等等。汤汉在注释此诗时说，“前四句兴而比，以言吾有定见而不为谈者所眩，似谓白莲社中人也。”逯钦立先生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释慧远在庐山结白莲社，以佛教义讨论人生问题，参与者多贵族名士，有如齐之稷下。《莲社高贤传》云：‘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日：‘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此诗所指当即此一班和尚名士。汤说甚为有见”。（《陶渊明集》）我以为，陶渊明归隐之后，能否真正屏绝与世俗往来，与友人交往，彻底断绝与当权者联系是很困难的。他虽然门衰祚薄，入仕之后居官卑微，但是他的为人操守和诗文作品还是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浔阳三隐”中的周续之不是几经征召就出山讲《礼》去了吗？因而陶渊明要坚持归田隐居，有很多干扰因素必须杜绝，一些障碍也肯定需要排除的。物质的贫困，体力劳动的艰辛，一家人的供养，……这些还可以咬牙度过，忍饥受冻来克服，朝廷的征辟也可以不就，白莲社诸人的诱惑他不是去了吗？“攒眉而去”的心态，不正是此诗中“厌闻世上语”数句的注释吗？当然，应当看到使陶渊明一度思绪涌动的因素除了以上所举之外，权贵的拉拢，崇拜者的游说，恐怕也是此诗中意念动摇的潜在因素吧？值得肯定的是陶渊明毕竟经受住考验，没有改变自己的选择。“言为心声，志为行轨”，这首诗更为真实地倾吐了陶渊明归隐后的思绪变化和为了坚持理想而排除干扰，抗拒了诱惑的信念。第七首：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  
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诗歌对年华易逝，良辰难再的喟叹，隐约着对仕途难测，宦海沉浮的忧虑，从而更加坚定了隐居不仕的信心。达官显宦，权势膨胀，踌躇满志，如美人酣歌于清夜，似皎月亮丽于夜空，鲜花灿烂于春季，可是，美妙歌曲唱完之后的沉寂，阴云蔽遮。明月何在！春尽花残的景象。难道不引起得意于一时之辈的深思么？与其求一时之光鲜显赫，莫如冷静清醒地审视人生，这样看来退隐躬耕，的确不失为在当时历史条件的一种理智而理想的人生选择。

## 第八首：

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蕨，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这是追忆少年时代的劳累奔波和事业无成的苦闷，世无知音的感叹。前人对此诗的理解分歧较大，明人何孟春说是：“此晋亡以后愤世之词”（《陶靖节集》注）。联系“饥食首阳蕨，渴饮易水流”等句似也不无道理。黄文焕则认为：“为晋一明大义，少泄忿心矣”（《陶诗析义》），未必中背。清人吴崧在《论陶》中说这首诗是“忠君报国之念隐然发露，绝非隐逸忘世者。”不消说也是从“首阳蕨”中获得的启迪，无论其准确与否，称陶渊明不是“隐逸忘世者”还是极有见地的。有的干脆说这首诗“篇中寄托遥深，只可为知者道尔”（温汝能《陶诗汇评》）。其实前人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此诗主旨的一部分。诗歌回忆了诗人年青时代远游求仕功业无成的空茫叹喟，又不乏对知音难觅的惆怅和对晋宋易代等政治变动的致慨。清人吴瞻泰说：“此篇无伦无次，章法奇奥。始而张掖、幽州，悲壮游也；然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也；忽而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公平生志节，亦尽流露矣”（《陶诗汇注》）。如此理解是有道理的，陈沆指出此诗“乃直抒本怀，首阳、易水；伯牙、庄周，公之位置，在此二者之间”。（《诗比兴笺》）

## 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木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这首诗是“慨晋室之所以亡也，典午创业，本乏苞桑之固，五马南浮，复无磐石之安。何曾兴叹其前，干宝抗论于后。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命意全在末二章，所谓图穷而匕首见”（陈沆《诗比兴笺》）。哀悼晋室的复亡，反思其政治措施的失策和用人非当的错误，以至祸乱相寻，桓玄篡逆于前，刘裕逼禅于后，能不深思吗？这又能怨得了谁呢？用桑树象征晋朝是有来历的。西晋初年，人们都以桑树为祥瑞之物，傅咸《桑树赋序》说：“世祖（司马炎）昔为中垒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司马衷、惠帝）入朝，以此庐为便坐。”后来的陆机、潘尼都作桑赋，同样以桑作为晋朝兴起发祥的象征。所谓“三年望当采”，刘裕于公元418年立恭帝，公元420年逼恭帝禅位，前后正好三年。本来希望恭帝在三年内有所建树和作为，固本自立，不料政权尚未巩固，即遭篡逼政变，根株全毁。追寻其原因，是不该种桑于江边，这里暗指晋室不应依赖刘

裕，当时没有发现可靠的辅弼大臣，即诗中所说的没有植根于高原，如今祸乱已经酿成，后悔又有什么用呢！程传说：“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而况之。其必作于元熙以后无疑也。”

陶渊明对晋室的态度和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目睹晋末的社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世族秉政，军阀弄权，自己的济苍生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十分苦闷，最后只好选择一条洁身自好，归隐田庐的人生道路。当然，他对晋王朝是谈不上什么好感的，既未受其厚恩荣禄，也就不可能产生孤臣孽子的忠愤了。可是，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洪族”陶侃的后人，他的祖父、父亲、他自己都做过晋朝的官员，和晋朝有着很深的关系，他虽然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但是，他在思想感情上对东晋还是认同的，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东晋皇帝、朝廷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心理上宁愿作晋的臣民而不愿为刘宋的显官，沈约说他“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出仕。所著文章皆题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但书甲子而已”（《宋书·陶潜传》）。这说法不无道理，但不准确。所谓题年月，书年号的说法与现存《陶集》并不完全符合，思悦已有辩驳，可是，宋初以后，不书宋代年号却是事实。看来陶渊明在对待晋和宋的倾向上是非常清楚的。

综上所述。《拟古》九首基本上围绕两大主题展开的：一是对晋室的悼惜，一是自抒怀抱。对义士节操的颂扬。二者虽然有所不同，却是相辅相成。没有对晋室的依恋和悼惜自然就不必对节义之士备加称颂；而对节义之士的讴赞里又隐含着对晋室的眷念，《拟古》诗之所以引起理解的歧异，关键在于这组诗歌与陶渊明的质朴自然，明白晓畅的基本艺术倾向有着显著的不同。《拟古》诗既不是直抒胸臆的咏怀抒情诗，也不是白描恬淡的田园诗，而是采用一种曲折隐晦的手法表达其政治见解和人生追求的刺世诗，而且缘事而作，有感而发，确实象萧统所说的“语时事则指而可想”那类作品。这是因为在这组诗中比兴手法的普遍运用，象征笔调的巧妙穿插，典故的自然，形成了深层隐曲，寄托深微的艺术风格。但是，只要我们明确诗歌的本事背景和诗人的思绪脉络，适当联系陶渊明的有关身世和其它作品，《拟古》的旨意还是可以把握的。

陶渊明的诗歌中确实有不少的作品言及饮酒者，甚至以酒为题的也有。但他的《述酒》诗，虽然题为《述酒》，诗中却又不是说饮酒的。诗歌的命意非常晦隐难解，有人认为其寄托的遥深超过了李商隐的《锦瑟》诗。那么

### 《述酒》诗究竟写的是什麼内容？

陶渊明的诗歌基本特征是朴实无华，萧散闲淡，清纯自然。但是，他晚年的一些感慨时事之作常常显得饶于比兴，兴象隐曲，寄托深微。这固然因为陶渊明晚年轻受了更多的人生磨难之后，变得更加成熟和练达，洞悉世故，更重要的是他晚年遇上了改朝换代的剧烈政治变动，晋宋易代的血雨腥风，杀机密布的恐怖现实，使得欲对时事加以反映的人不得不考虑其个人的安危，而采用隐微的手法和深于寄托的艺术方式，这样势必使得诗歌的真谛显得扑朔迷离，难以捕捉。从魏晋的政权更迭到刘宋王朝的建立，虽然曾出现过安定的社会局面，但是都比较短暂。政治的动荡，战乱的频仍，社会的不宁静，人民生活的困苦，以至生活在这样时代的文人不是作缄口结舌的沉默者，就是只好以隐晦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对现实的见解。这样的作品，往往“其旨渊放，归趣难求”，诗歌的底蕴在比兴、象征艺术手法的包裹之下，很难准确把握。如果说曹丕篡汉，司马氏代曹，在禅让和平演变形式下完成的政权移交过程多多少少地留下了不杀禅让者的温情的话，而刘裕的代晋自立，不仅要晋帝交出皇帝宝座，而且对禅让者晋恭帝酖杀不舍。试想作为一个早就没有任何官职，没有社会地位的归隐之士的陶渊明对刘裕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作为一个社会感应神经的诗人，他既不能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可又不能直抒胸臆，畅所欲言，于是只好采用象征笔法。比兴技巧，把自己感受到的认识，隐微曲折地传达出来，这就形成了《述酒》诗的朦胧迷离状态，使得后世读者产生了理解上的层层障碍。可是，经过历代研究者的探索，《述酒》的命意已经很清楚了，就是陈沆所说的是为晋恭帝被刘裕用毒酒害死未果，最后仍然遭其杀害之事。先读原诗：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  
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素砾晶侈渚，南岳无余云。  
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  
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  
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  
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  
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伦。

陶渊明在这首诗歌中所用典故较多。汤汉在注这首诗时说：

按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罍授张祗酖王，祗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作为，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覲者弗省。独韩子苍以“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后有感而赋。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因疏其可考者。以发此老未白之忠愤。

这段话是解开《述酒》诗谜团的锁钥。因为刘裕两度进酖酒，其用意当然是斩草除根，不留隐患。在那动荡不宁的年代，军阀混战，各派势力混战不已，力量彼此消长，很难说谁有控制天下的绝对把握。只要晋恭帝还在，谁也说不清楚就没有死灰复燃的时机。先前桓玄废晋安帝，不是他刘裕又假讨篡逆拥晋帝而将桓玄袭杀，再把晋安帝扶上帝位的吗？这样的故事刘裕绝对不允许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药酒于晋恭帝，最后采用斩尽杀绝之法来巩固自己的皇帝宝座。真正解开这首诗最关键的地方是韩子苍点破的“山阳归下国”这句。陶渊明用汉献帝被废黜来比拟晋恭帝被贬为零陵王，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篇《述酒》诗通篇没有一字直接说到酒，而所有的典故、比兴之词和意象又都与刘裕进药酒杀晋恭帝有关。刘克庄在《后村诗话》续集卷一中有一段话。对汤汉的阐释评价非常之高：

渊明有《述酒》诗，自注云：仪狄造，社康润色之。而终篇无一字及酒……韩子苍因“山阳归下国”一语，疑是义熙以后，有感而作。至汤伯纪，如反复详考，以为零陵哀诗。又谓渊明归田，本避易代之事，而未详明言之。至此主弑国亡，其痛疾深矣。虽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是夫词之废也。汤笺出，然后一篇之义明，其间如“峡中纳遗薰”、“朱公练九齿”之句……伯纪阙疑，以质于余，余不能解。

宋人对待学术研究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令人敬佩的。尽管汤汉和刘克庄等人对《述酒》诗歌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但是，对具体的几句诗意的探索仍然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付阙存疑，从不无知妄说，是很可取的。对于这首诗歌，主要的命意是悼惜晋室的复亡和零陵王的悲惨结局，自然也隐约着诗人对刘宋的谴责。全诗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开篇“重离照南陆”十句是第一层次，是说从东晋的建立到衰亡，虽然曾出现过短暂的稳定，但是昙花一现，很快地在桓玄、刘裕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的把持之下，归于消歇。“神州献嘉粟”到“日中翔河汾”为第二层次，写刘裕势力的急速膨胀，终于代晋自立。“朱公练九齿”以下为第三层次，写诗人隐居养性，静观时事变化。

《述酒》诗简括地把刘裕自起家到用阴谋取政权，最后获得成功的全过程作了历史长镜头式的扫描。其时正是刘裕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之时，要对他的政治表现和所作所为做出评价和批判，这在当时无疑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勇气的，也要冒极大的危险。因而陶渊明的这首诗遣词非常隐晦，手法极为委婉、曲折。诗人用一组暗示性很不明显的图象整合为旨趣很难把握的抒情氛围，因而使得诗歌主题具有很深的隐秘性。这首诗可以说是陶渊明的所有作

品中最难读懂的作品，形成了陶诗中的别调别趣。只有读者反复涵咏，悉心体会才有可能探索其诗歌的底蕴。为帮助读者理解这首诗，我把它全文作了译解：

#### 译诗

重离照南陆，东晋王朝偏安江左，  
鸣鸟声相闻。人才济济共辅晋帝。  
秋草虽未黄，秋草虽然还未凋黄，  
融风久已兮。热风消散，颓势逐渐酿成。  
素砾晶修诸，白石显现桓玄割据江陵，  
南岳无余云。象征东晋的南岳紫云已散尽。  
豫章抗高门，刘裕的势力膨胀威胁晋室，  
重华固灵坟，晋泰帝也象禅代的重华只剩下孤 。  
流泪抱中叹，流着眼泪而悲叹，  
倾耳听司晨。倾耳听鸡啼盼天明。  
神州献嘉粟，刘裕假托嘉禾来树立威信，  
西灵为我驯。制造四灵效力以谋篡位。  
诸梁董师旅，刘裕调兵讨伐桓玄，  
芊胜丧其身。象芊胜一样桓玄丧了命。  
山阳归下国。晋恭帝象汉献帝一样被废黜，  
成名犹不勤。刘裕篡位杀了恭帝。  
卜生善斯牧，卜式善于放牧，懂得“恶者辄去”的道理，  
安乐不为君。晋帝的近臣不为皇帝出力。  
平王去旧京，晋安帝被迁洛阳就象周平王离旧京一样，  
峡中纳遗薰。中原地区被胡人占据。  
双陵甫云育，中原平定刚得以休养生息。  
三趾显奇文。刘裕假造三足鸟逼晋帝禅位。  
王子爱清吹，晋帝和爱吹笛的王子乔一样，  
日中翔河汾。已和晋一起离开了人间。  
朱公练九齿，陶某修身养性，  
闲居离世纷。隐居而离开纷乱的世界。  
峨峨西岭内，常想起齐夷隐居西山，  
偃息常所亲。精神慰藉全真养性。  
天容自永固，努力保持身体健康，  
彭觴非等伦。长寿和短命决不一样。

在陶渊明晚年的诗文创作中，《桃花源记》无论是思想旨趣，社会理想，还是审美追求与艺术价值，对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

### 《桃花源诗》并记描绘的是怎样的社会？

《桃花源诗》并记，是一组既有记，又有诗的诗文组合体。是陶渊明辞别官场躬耕田园十多年以后的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对人民辛勤劳动，友好相处，平等互爱精神的歌颂，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的憧憬，以及对君权的否定。王瑶说：“《桃花源记》中所记的南阳刘子骥，名麟之，是晋太元间的闲人，好游山泽，因此《桃花源记》开头就说‘晋太元中’；但这并非陶渊明实际写作的年代。据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则渊明写作材料的主要根据，是来自如《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而其理想成份，则与《拟古》诗第二首追慕田畴的事迹相同。《三国志》记‘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其事与《桃花源记》极相似，是渊明社会理想的寄托。《拟古》诗作于宋永初二年辛酉（421），《桃花源诗》并《记》当也是同时所作。这年陶渊明五十七岁。”（《陶渊明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否就是以西北人民逃避苻秦的统治为材料构写的是很难说准的。可是，《桃花源记》并非纯属陶渊明的虚构也是可以肯定的，它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东晋末年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人民不堪其苦而逃匿于封建剥削压迫无法达到的深山洞穴去居住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渊明生活的江州一带，又是战争频仍，人民生活最为困苦的地区之一。义熙八年（412）刘毅曾在上给皇帝的表章中说到过这种情况：“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就在刘宋初年，人民逃亡深山也很普遍：“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宋书·荆州蛮传》）。不同的史书记载着同样的内容，那就是统治阶级的租税赋役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了，或是逃往幽深荒芜之所，或是逃亡入蛮。陶渊明有感于此，再把所闻听的有关资料，历史故事，结合自身的体验和感受，通过艺术概括和审美提升，写成了这篇诗文俱佳，相互辉映，影响深广，脍炙人口的千古杰作：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



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如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原言躡轻风，高举寻吾契。

陶渊明以异常优美流畅而意象葱笼的笔调，描绘了一幅与世隔绝的理想社会图，这是一个环境幽美，社会风气淳厚，人际关系融洽，人们勤劳友爱，不愁吃和穿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人是那么和蔼可亲，古道热肠，彼此互助互敬，从不担心被别人算计，也不会去算计别人的美好环境，归纳言之，这样的社会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与世俗社会完全不同，断绝了与外界联系的自由结合群体。人们为了躲避乱世的共同目标而友好相聚，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所在。这里由于人人平等，只有长幼之分，男女之别，而无贫富悬殊，贵贱之异，根绝了战乱，也没有盗贼恶棍。这自然也就用不着君王治理，官吏行政，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更不存在强凌弱，众暴寡的弊端，社会稳定，秩序井然。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融洽，友好相亲。“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个环境优美，社会秩序良好，人际关系和谐，人民衣食不愁，心境愉快的理想乐土，到处充满着和平、友好、宁静、自然的气氛，非常诱人的处所。

其次，在经济生活方面，完全杜绝了剥削，否定了君权，根本用不着皇帝的诏令和官吏的施政，没有记载时光流逝的历书，却春夏秋冬自然有序地代谢着，过得很有规律，就是良田、美池、桑竹和土地房舍全都归所有的居住者共同享用，彼此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共同劳作，勤劳相安。生活得宁静、甜蜜而幸福。

此外，桃花源中民风淳厚，有着浓厚的上古气息，“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是何等的情致！何等令人惬意的环境！在晋宋之际饱经动乱和剥削压迫的人们心目中，上古社会是大家向往的，陶渊明在诗文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他的这种愿望。他在《与子伊等疏》中说：“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

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以及在《五柳先生传》中称：“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桃花源就是这样令人心醉而向往的理想之地。不能以后人的眼光简单地把这种追慕远古社会的思想归结为消极保守，复古倒退，这实际上是陶渊明设想出来的一个与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乐土洞天，含蓄着对苦难现实的批判和否定。中古时代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制约了陶渊明不可能产生更为先进的思想，东晋末年的阶级剥削和民族斗争异常尖锐，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广大农民流离失所，为了寻求生计而逃匿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象陶渊明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也难免冻馁贫困，更何况一般百姓。“无食望乐土，无衣思南州”（杜甫诗），人们尽管无法从苦难现实中真正摆脱封建压迫和剥削，但幻想从思想上求得精神解脱是陶渊明这篇诗文的酝酿契机。不少的论者梳理了《桃花源记》的思想形成过程，认为这是从《诗经·硕鼠》、《老子》中小国寡民思想、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等获得启迪，受阮籍，鲍敬言等无君论思想的影响，是不错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动乱社会中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辞官归隐后田园躬耕，亲自参加体力劳动之后，融入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对劳动的见解，对人生的体验之后逐渐形成的独特思想。早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中，他就由自身的穷困不幸遭遇中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已经萌发了向往理想社会的思想：“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这时陶渊明不过44岁，再经过十几年的田园耕作之后，更进一步地丰富了对社会的认识和深化了对劳动、人生的理解，终于从朴素的幻想升华为较为完整的桃花源思想。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还有种种不足和空幻神秘的色彩，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桃花源思想称得上中古时代最美妙，最完善的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有进步意义的理想。

《桃花源记并诗》出现之后，因其美妙的构想，神奇的色彩，独到的审美意趣引起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浓厚兴趣，派生了一系列的文学创作。在王维的笔下，桃花源是现实中的仙境，美幻旖旎的理想去处：“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桃源行》）。刘禹锡简直认定那是仙人仙居：“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须臾皆破冰雪颜，笑言委曲问人间，因嗟隐身来种玉，不知人世如风烛”（《桃源行》）。当然也有人怀疑其可靠性：“神仙有无何渺落。桃源之说诚荒唐”（韩翃《桃源图》）。在王安石的眼光中，桃花源是另一番景象：“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桃源行》）。苏轼在《和桃花源诗序》中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只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固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亦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可以说是对桃花源的理性分析，但又引出不少好奇的人去寻求桃花源，甚至把一些现实中的生活场景坐实为陶渊明诗中的桃花源，将生活真实和艺术虚构等同起来，并且言之凿凿地肯定，某处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把幻想现实化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也是对审美的凌迟。

人生是美好的，现实又是痛苦的；帝乡仙境是虚幻的，佛教指引的来世幸福是不可期的。既要热爱美好生活，又要避开苦难现实，就只有在幻想中去寻求解脱，求得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对心灵强烈冲撞带来的痛苦的精神慰藉，是陶渊明结撰《桃花源诗并记》的思想契机与创作冲动。

“历览千载书”的陶渊明喜欢涉猎各种各样的书籍，颜延之说他“心好异书”，这在他的诗文创作中可以得到印证。他写过《读山海经》十三首，那么——

### 《读山海经》十三首说的是什么？

《山海经》是一部内容驳杂，风格独特的古奥典籍。全书共十八卷三万余字。《山海经》由《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构成，汉代刘歆校定。是一部关于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宗教、巫医、矿产，生物等方面的百科全书，保存了上古时代非常丰富而珍贵的文献资料。由于年代久远，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伪托和错简，后人增损窜改的地方也不少。因而增加了此书的理解障碍，所以被斥为恢怪不经之作，非常难读。博学多闻的司马迁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相传《山海经》是大禹治水时的见闻，命伯益记载而成，但不可信。《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山海经》是“小说最古者尔”，又把它看成是丛谈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根据书中祭祀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相合，认为它是“古之巫书”。总之，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共识的奇书，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晋人郭璞曾为《山海经》作过注，同时还为之插图作赞，所以陶渊明又将其称之为《山海图》。明代的王崇庆、清代的吴任臣、汪绂、毕沅、赫懿行都曾经为《山海经》作过注。令人袁珂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山海经注》是较流行的本子。

陶渊明在《读山经》十三首中还谈到过《周王传》，就是《穆天子传》，是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县魏襄王冢中发掘出来的竹书《穆天子传》五篇，记叙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的故事，其实是神话传说。《读山海经》十三首是陶渊明归田之后的晚期作品，大约是刘裕代晋自立以后写的。第一首总领全组诗，反映了陶渊明隐居归田后的饮酒阅读，赋诗遣兴的适意心态：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宅，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时令既是初夏草木茂盛，环境优雅，风物宜人，雨顺风调的时节，饮酒自乐，读书怡然，陶渊明由此而展开组诗各章。以下几章，每章各写《山海经》中之景物。“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写西王母所居之玉山的风物环境。而第三首“迢递槐江岭，是为玄圃丘”则描绘穆天子游过的玄圃风光。至于第四首“丹木生何许？乃在崑山阳”写丹木的奇妙功能。第五首“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铺衍青鸟的奇闻趣事。“逍遥芜皋上，杳然望扶木”记述芜皋山扶木的硕大无匹。“粲粲三珠树，寄生赤水阴”夸耀三珠树的秀美。“自

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则是对《山海经·海外南经》中交胫国之人不死不老的奇闻的兴趣。而“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又是对夸父伟大精神的礼赞。“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是对精卫精神的颂扬，对刑天猛志的肯定。“鸱见城邑，其国有放士”是借神话故事对遭放逐不遇之士的惋惜与同情。倒是其十一和十三两首寓意颇深，值得推究。先看第十一首：

巨猾肆威暴，钦违帝旨。  
窳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  
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  
长枯固已剧，鸱岂足恃！

这首诗也是用《山海经·西山经》中的神话人物钦 的故事为审美对象而暗寓寄托的。钦 和钟山神的儿子鼓合伙，在昆仑山之南杀死了祖江，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就把他杀死在钟山之东。钦 便化成了大鸱，鼓化成了鸟，它们一出现，其地便大旱。而 窳也是蛇身人面的动物，被危杀死之后，变化成龙首，居弱水中，吃人。陶渊明把神话中的凶残之辈钦 等杀死祖江的故事引入诗中，说明不可为恶的道理，当然隐含着对刘裕杀害晋恭帝的谴责。至于最后一首：

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  
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  
仲义献诚言，姜公乃见猜。  
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

这是一首与《山海经》没有直接联系的诗歌。乃是咏史之章，诗歌主要是借齐桓公不辨贤愚，拒纳忠言，最后酿成齐国大乱，桓公渴馁而死的惨剧。感叹晋末的昏乱朝政，用人不当，终于导致江山易人，国破身亡的结局，以史论来结束全诗。

《读山海经》十三首是一组以读书自乐咏唱《山海经》中的奇闻故事为主线的作品，兼及诗人对现实的自然联想，对弱者反抗暴政的赞扬与肯定，是一组把述志，遣怀，咏史，抒情融为一气的佳作。

陶渊明的《咏荆轲》是一首情调激越的诗歌，关于这首诗的意蕴有些不同的见解。那么

### 《咏荆轲》是酬知己之作呢 还是忠君情怀的颂歌？

《咏荆轲》是一首以古人古事为题材的咏史诗。荆轲的事迹在《战国策》、《史记》和《淮南子》中都有记载。荆轲是战国末年的豪侠，本来是齐国人，后来迁居卫国，随后居于燕国，是燕太子丹的门客，人称荆卿。喜欢读书击剑，与擅长击筑（一种乐器）的燕国人高渐离关系很好，他们都受到燕太子丹的礼遇，接受了为太子丹报仇而去刺杀秦王的使命。临行前夕，燕太子丹和众宾客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在易水畔为荆轲送行。高渐离击筑，声音浑厚悲慨。荆轲随着筑声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志一去兮不复还。”筑声演奏出激昂慷慨的羽声，所有的人情绪随之悲慨，怒发冲冠，送荆轲踏上了刺杀秦王的征途。荆轲以向秦王献燕国督亢地图为名。接近秦王，向秦王展开地图，先前藏在图中的匕首随地图全然展开而暴露出来。荆轲立即用匕首刺秦王。荆轲一方面当时情绪过于紧张，一是剑术不够精良，没有完成刺秦王的使命，反而被众卫士杀害，留下了千古之憾。这则故事悲壮慷慨，感人至深，陶渊明读了这段史事之后，情绪激荡，结合自己的身世写下了这首豪放悲怆，充满激情和火气的诗歌：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励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此诗以荆轲刺秦王为主线而展开，通过诗人的丰富想象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凝炼而传神地描绘了荆轲别燕太子丹的豪壮怆凉的场面和他飞车奔秦庭刺秦王的紧张激烈的情景，歌颂了荆轲不畏强暴，慷慨赴义的勇猛精神，同时也对他壮志未酬而牺牲表示了极大的惋惜和喟叹。这首诗最为精采警策之处在于“君子死知己”等十四句，把荆轲刺秦的悲剧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关于这首诗歌的命意，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此诗有深广幽

微的意蕴和异常强烈的现实政治内容，就是陶渊明通过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故事，委婉地表达了他不能为晋报仇的政治感慨。甚至认为陶渊明隐居不仕，安贫乐道是出于不得已，他是别有心事，一直抱有诛刘裕之志的。另一种见解是说陶渊明这首诗是泛咏历史之作，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报恩观，陶渊明笔下的荆轲只是“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刺客豪情，而不是忠臣节士。两种意见的分歧源于对这首诗系年的判断。前者将此诗系于晋亡之后的刘宋景平元年（423），这时陶渊明59岁。而后者则认为此诗是陶渊明年轻时代尚未从政之前的作品。两种系年都有一些道理，然而又都缺乏不可移易的依据。细玩这首诗，说它是陶渊明为晋报仇的思想恐怕难惬诗意，把它视为酬知己之作也未免贬低了主旨。我倒觉得这是一首反抗强权暴政，为大义凛然的复仇英雄唱的颂歌。诗人通过荆轲刺秦的历史故事，寄托了他憎恶暴政，抨击强权的思想和对大无畏英雄的崇敬。当然，身当乱世的陶渊明，他决不会为咏史而咏史，在荆轲身上隐约着诗人回天乏力而又不甘寂寞的复杂心情和忧患意识，这大约就是诗结尾所说的“千载有余情”的内涵吧！所以，朱嘉在评价这首诗才会说：“渊明诗，人皆曰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朱子语类》）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陶渊明诗中的“金刚怒目”式了。人的一生无论其贫富贵贱和寿夭祸福，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整个说来，陶渊明对待死亡是比较超脱，豁达，听其自然的，那么

### 陶渊明为什么要写《挽歌诗》 三首和《自祭文》？

生和死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然而对于人的生死却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和认识。有的对生和死持无所谓的态度，如孔子就说过“朝闻道。夕死可已”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类的话，非常着重人在有生之年的进取精神和奋斗搏击，对于死是不很在意的。而庄子则说：“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庄子·齐物》），又把寿夭等同，生死混一。更有一些踞高位，享荣华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为了永享人间福祿富贵，留恋丰厚的物质生活而惜生怯死者，总是通过各种途径服食炼丹，引导吐纳，以得长生久视，妄求不死。陶渊明不同于以上类型。他既看重人的有限生命的价值而又不执著于此，因而一方面他总是抓紧时机攻读学习，完善自我，非常希望乘时建功立业去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但是又把生和死看成是生命的自然起点和终结，对死的来到既不悲观，也不恐惧，而是委运任化，听其自然，泰然对待。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当他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可能自己的生命不会延续很长的情况下，写下了绝笔《自祭文》和《挽歌诗三首》，表明了他对生死的平静心态和旷达的胸怀。

在《挽歌诗》中，陶渊明又一次地表明了他的生死观：“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原本是生者对死者所致的哀词，为送葬时所唱的丧歌，以寄托哀思。因而挽歌都是由生者为死者撰写并为之吟唱，而象陶渊明这样自撰挽歌者并不多。诗人能以平静，理智而旷达超然的态度对待生死，把人的出生和死亡视为自然规律，既不为生而欣喜，也不为死而伤悲的超旷见解，是十分可贵的。

至于《自祭文》，陶渊明则把人的一生看作过客，他对于自己将离别人世是这样理解的：“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表明了他人生如寄的思想，显然是受《列子·天瑞》“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和《庄子》“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影响，是这两种思想时代性和个性化的发挥。这样看待人的生死寿夭，自然就可以超脱豁达。这样，一个人的一生无论多么久长，从生的起点和死的终点来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无非只是过程的延续不同而已，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对生和死的纠缠与困扰。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过程的长短，而是生存质量，即生命过程的完成情况。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线如果十分细微，平行无变化地延续得再长，也不如这条线虽然不是很长却粗宏劲健，而又演变多姿地体现了人生有意义的内容更有价值得多。陶渊明显然更看重的是后者。因而陶渊明这篇本来应该由别人来为他撰写却是自己来完成的《祭文》完全摆脱了既定格式，从生死的纠葛化解为对自己一生为人行事的检讨，所作所为和操守节概的反思。对一个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人而言，能如此平静自然，不带偏见地解剖自己，透视自己一生的是非功过实在难能可贵。这里既没有文人自祭时夸饰往昔的吹擂和无病呻吟貌似旷达的文字游戏，也没有怨天尤人的发泄、悔恨。一切都是那样地平淡、冷静、客观、自然，当然也隐约着政治抱负未得施展和境遇潦倒，穷困缠身的遗憾，仔细体会“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绺冬陈……”等语，便不难于平淡超旷的字里行间中体会到作者的情绪，那就是对死亡倒并不在乎，却介意于自己的不遇。“人生实难”的喟叹声中掩饰不住陶渊明的愤懑。颜延之在《诔》中说他“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禘祀非恤”虽然是可信的，我们却更相信陶渊明对“逢运之贫”和“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的考虑与太息。



在陶渊明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大都情感真切，思想内涵丰富感人，行文流畅清新。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嗜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白壁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那么——

### 《闲情赋》果真是白壁微瑕么？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一般说来是较少涉及男女之情的，但并不能由此导出他的情感世界贫乏的结论。《闲情赋》就是一篇专门抒发男女之情的优美文章。此赋不仅文辞华赡，想象丰富，意象葱茏，而且情感也异常真纯动人。当然由于此文中大胆的情感暴露和绘声绘色的对异性的向慕与追求，似乎与“笃意真古”、“质直”、“省净”的陶渊明的基本艺术风格不太一致，因而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激烈争论聚讼，是一篇见解分歧最大的文章。为了便于研讨，先录全文及序：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词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间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朱帙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馀好，攘皓袖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住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飏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余荫；傥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捐想以空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殫。思宵梦以从之，神瓢飏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掉，譬缘崖而无攀。

于时毕昴盈轩，北风凄凄，恻恻不寐，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迎请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

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陶渊明在序中明确表示他作《闲情赋》是受张衡、蔡邕等人的启迪，而闲居田园时作的，联系到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因而此赋可能就是他青年时代感情外化的“示志”之作吧！但是，这篇文章表现的是什么样的感情？这种感情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寄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萧统除了批评陶渊明的《闲情赋》是白璧之玷之外，还说“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认为陶渊明的这篇赋连扬雄的大赋曲终奏雅，劝百讽一的功效都不具备。既然如此，写这样的赋不仅毫无必要，简直就是多余。并且为陶渊明有这样的作品而惋惜，假设没有这样的作品岂不更好吗？如此欣赏和喜爱陶渊明的萧统都这样评价陶渊明的《闲情赋》，可想而知其余的人将如何看待这篇作品了。

《闲情赋》真的是白璧微瑕吗？回答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从头至尾大胆泼辣地暴露了陶渊明对具有旷世之秀，倾城之美的女性的奔放的爱恋和执著的深情，而且不加检束地发挥他对钟情对象的热烈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眷恋，是招致訾议，认为有失风范的根本所在。这种感情出现在人品和操守都十分高洁的陶渊明身上更是难于理解的。不管萧统对此文的评价是否正确，但是，他显然把《闲情赋》理解为男女情爱之作，在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苏拭显然不同意萧统的见解，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苏东坡题跋》卷二）认为陶渊明的感情是健康的，正常的，完全值得肯定的，是其远见卓识。后世的评论者，毁誉皆有，清人方东树说：“渊明《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褻，最误子弟”（《续昭昧詹言》）。方的意见当然还是把《闲情赋》理解为男女情爱之作，只是觉得陶渊明的感情过于外露，影响不好。邱嘉穗却认为是另有寄托：“朱子谓‘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怨美人之迟暮’，亦以美人目其君也”（《东山草堂陶诗笺》）。孙人龙也这样认为：“古以美人比君子，公（渊明）亦犹此旨耳”（《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而清人刘光蕘甚至认为“此篇乃渊明悟道之言，……身处乱世，甘于贫贱，宗国之覆既不忍见，而又无如之何，故托为闲情。其所赋之词以为学人求道可也，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也无不可也”（《陶渊明闲情赋注》）。看来，在古代要对《闲情赋》给予肯定总是要在男女之情之外附加上政治寄托才说得过去，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清人吴靛文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予细玩其赋，如‘原在衣而为领’等语，何等流宕，而终结之曰：‘尤蔓草之为会……’则终归闲正矣。作者之意若曰：吾如是之荡以思虑，而终无益也，则不如‘坦万虑以存诚’而已，此岂非有助于讽谏乎！而昭明乃谓其卒无讽谏，其论亦已过矣。”显然也是从思绪归于闲正落笔的。

究竟《闲情赋》是抒写男女之情，还是以男女情爱另寓政治寄托呢？通览全篇都是作者对他所倾慕的绝代佳人的思念，渴慕，追求，乃至最后因追求而不可得被迫打消的描写，完全找不到丝毫联系政治，悲慨理想不得实现的痕迹，是一篇情绪激荡，大胆火辣，比喻丰富优美，行文流畅的抒情赋。大概是陶渊明年青时代的作品。这时正是作者青春觉醒，充满幻想，憧憬美好未来，希望能在艰难而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寻觅一个内秀外善，志趣投合的终生伴侣，因而抒发其向理想异性的感情追求时竟是那样的无所顾忌和敞开

心扉，把自己执著的求爱之心表现得那样奔放，热烈，淋漓尽致。这是因为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接触和了解异常困难，因而一旦遇着理想对象必然显得那样激动。联想到陶渊明中年丧妻的不幸经历，王瑶先生认为可能这篇赋写于晋太元十九年（394），这时陶渊明30岁。如果是这样，则这篇赋既有对亡妻的悼忆，更充溢着对未来人生伴侣的幻想。细加斟酌，“曲调将半，景落西轩”，不是含蕴着恩爱夫妻未竟夫唱妇随而半道亡故的哀痛吗？而“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的凄凉寂寞情景也与陶渊明中年丧妻的身世合拍。

这篇赋文由122句构成，由三个部份展开。“夫何瑰逸之令姿”26句为第一部份，主要描绘了作者追慕的异性举世无双的绝色和她品德修养的高洁雅正，以及她转盼生姿，举止含情的动人情景。是一个灵魂高尚，外貌秀美的理想女性，以及诗人由此而产生的爱慕之情。而“激清音以感余”等74句为第二部份，作者不厌其详地反复致意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和努力去接近她。向她倾述爱慕之心和对她一往情深的执著。因而产生了离奇，大胆，新颖，诱人的各种幻想，希望成为他所倾慕的女性身边不可或缺，无法离去的诸种事物，腰带、化妆品、枕席、鞋子、影子……表现了作者对她的深挚的爱心。“于时毕昂盈轩”以下直至结尾22句为最后一部份，是作者明确了他与所追求的对象之间的“阻山而滞河”的障碍而无法实现其思念之情和爱慕之意，被迫约束幻想，只好将之隐藏于心田的苦闷。

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令人费解的奇特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对文人作品的各种限制，要求文人在他的创作中对自己所抒发的情感总要通过层层修饰，密密包装，只能在非常不重要的地方作一些暗示或者偶尔露出一真面容，才算是好的作品，于是才含蓄，才蕴藉，才有温文尔雅的气度。点到为止，成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风范。因而，绝对不允许他们大胆奔放的情感渲泄和不加检束的想象飞翔。所以，象陶渊明这样的文人如果露骨放肆地表现对异性的爱慕与追求的作品，总是挖空心思地将其纳入礼义风范和不逾矩的轨道，否则干脆把这情感的描绘曲解为政治寄托，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怪现象。鲁迅先生痛感于这种阉割文学作品精髓的做法，对陶渊明的此赋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象陶渊明这样非常注意自身修养和行为规范田园诗人偶尔思想放荡一下写了《闲情赋》，就会招致那么多的责难和曲解！可想而知，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旦涉及性爱描写和男女之情的诗文，老是显得言词闪烁，欲言又止的吞吐状，情感和诗意被包裹得密密实实，今后人象猜哑谜式的费解，就象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之类，宋词中爱情词的隐晦……好象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合符礼义，也才为那些皓首穷经，钻故纸堆的人留下些施展索隐本领的领域，去寻求本旨，挖掘微言大义了。鲁迅还批评了一些选本“不收陶潜的《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集外集·选本》）。鲁迅在致增田涉信中又说：“迄今为日本所介绍的中国文章，大抵是较轻松易懂的东西，坚实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潜的《闲

情赋》之类，一点也没有译”（《鲁迅书信集》）。认为陶渊明的《闲情赋》是坚实而有趣的典型代表之作。

显然，透过以上的剖析，陶渊明的《闲情赋》不仅不是“白壁微瑕”，更不是可有可无之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简直是陶渊的代表作和精品。是诗人大胆热烈追求幸福，热爱生活的文学精华，他把凡是能够接近理想对象的一切事物，从穿戴的衣领、衣带、头油、画眉的粉黛、席子、丝鞋，到随形的身影、夜阑的烛光、竹扇、桐琴……无所遗漏地涉及到了。这种对情人的思恋以至于思绪万端，焦灼难眠，长夜难待……因而由笛声引发了幻听与幻视，神不守舍，意马心猿，如果不是发自肺腑的情思热恋和亲身经验，是断然难于结撰的，真正称得上爱情文学中的瑰宝，当然也是那些满脑袋“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存天理，灭人欲”的迂阔之辈绝难想象的。

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末辞去了彭泽县令，并且写了一篇感情丰富的《归去来兮辞》，那么——

###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 表达了什么情致？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决意与仕途告别而隐居归田的述志之作，抒写了诗人从官场倾轧的险恶政治环境中解脱之后的轻松愉悦之情，同时也简要地回顾了他的前半生经历的利弊得失，以及决心摆脱为求一饱而违背自己夙愿的矛盾、痛苦的困扰。辞及序行文优美流畅，意象鲜活清新，是陶渊明的文章代表作：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序文简直可以当作陶渊明 41 岁前的人生小结，也可以当作从政小史来读。这里简要地叙写了家境贫苦因而才出来做官谋生，又不愿意远离家乡，所以就近为官，喜欢饮酒，却又厌烦官场的行迹，在谋生与个性爱好的矛盾斗争中，决定放弃官场，走一条艰辛的躬耕自资的道路，虽然劳身，但却遂心。接下来是正文：

归云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值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能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一篇赋把陶渊明为什么要出来做官？做官之后的具体感受，以及他为什么又要归隐和归隐之后的打算全面而细致地作了表白。倾述了内心所想，表现了他“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的耿介为人。全文共分三个部分，每段

即为一部分。第一段写作者之所以要辞官归隐是为了改变“今是而昨非”的局面，进而以想象的笔调，摹写脱离厌倦的官场后的轻松，以及和家人欢聚后的喜悦。第二段则抒发了归田后的自由闲适，躬耕自乐，琴书消忧的悠然自得。“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等句，活画出了自然界草木山水的妩媚幽姿的诱人的情趣，实际上是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在他所观照的万物中涂上的一层愉悦自由，欢快舒展的主观色彩，万事万物在自由而闲放的作者心目中无不欢欣藏蕤，生机勃勃了。至于最后一段是诗人以超越时空，蔑视世俗功名利禄的眼光来审视历史，思索人生，对自己选择隐居躬耕生活道路的自我肯定来结束全篇。

这是一篇以言志趣为主兼及抒情的佳作，在陶渊明的文章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影响。无论是序或是正文，无不情真意挚，行文畅美，了无窒碍，一派神行，因而赢得古往今来读者的喜爱与赞赏。陶在注《陶靖节集》时说：“欧阳忠公（修）曰：‘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而已。’”苏东坡还和过《归去来兮辞》。唐宋八大家中的欧、苏二家都是文章大手笔，对此文却备加推崇。反复把玩，确实充满着乐观爽朗，怡然自得的情调和昂扬壮健的向上气势，并不感到失意于官场的颓丧，倒弥漫着回归大自然怀抱后的畅惬。朱熹说：“《归去》一篇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仔细体味，此言不虚。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辞官归隐后的田园生活和感受，却是悬想之笔，虚拟之词。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阳历十一月辞去彭泽县令，而此文所写却是春日祁祁的鸟语花香的季节，因而文中并非作者的真实感受，而是想象之词。钱钟书说：“《辞》作于‘归去’之前，故‘去’后着‘来’”（《管锥篇》），是有道理的。整篇文章可以浓缩为两大内容，就是对官场的厌弃和对田园隐居生活的赞美。就前者而言，陶渊明对虚伪欺诈的官场生活感受是深刻的，深恶痛绝的。此后虽然有过几次证诏和出仕的机会，陶渊明却断然拒绝了。在仕与隐的抉择上，他经历过五次反复之后的挂冠，态度十分坚定，没有丝毫的动摇和徘徊了，而是沿着自己认定的贫困清苦躬耕自食的道路艰难地走下去，直至生命的结束。至于对田园生活的摹写，对农村中春日万物充满生机的描绘，由于作者当时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农业劳动和耕耘播种，因而不免把农村生活牧歌化，理想化，写得充满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调。后来的事实证明，陶渊明的隐居躬耕选择虽然不失为乱世有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正确决策，但是他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畏荣好古，薄身厚志”，表明了陶渊明独特的价值观和高洁情怀。可是，由于他缺乏足够的家资，自己又是“半路出家”，不善农事，兼之火灾的肆虐，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的侵扰，晚年的陶渊明的处境就很艰难了，甚至到了乏食乞讨的境地，是很令人同情的。为了独立的人格，为了完善自我，陶渊明走一条荆棘丛生的艰辛之路，他的付出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历史上曾经引起过无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文人的共鸣，高适在《封丘县》中吟道：“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梦想归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显然把陶渊明作为自己的榜样，但是他还是由低级官吏一步步地熬上去了，最后官至常侍、封疆大吏。要真正身体力行地象陶渊明那样耐得寂寞，受得了贫苦潦倒的煎熬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很难的。

陶渊明原本是进取向上，积极追求的知识分子，可是他生活的年代和他的自身条件使他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影响着他的 人生选择，规定了他的文学创作。那么——

### 《感士不遇赋》说的是什么？ 表达了怎样的人生追求？

《感上不遇赋》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从文章中充溢着的愤懑之情和对 其一生不遇的喟叹来看，尤其是他所说：“宁因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 可以肯定作于归隐之后，王瑶将其系于宋永初三年（422），这时陶渊明已经 58 岁了。

陶渊明早年幻想过辉煌的人生，憧憬着云锦般的前程，他曾为此奋发攻 读，遍涉各类典籍，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摄取一切有用的知识，以 便寻求机遇施展其政治抱负。然而晋宋之际的腐败政治和黑暗现实，门阀士 族的秉政弄权，陶渊明要凭借自身条件和个人奋斗去实现人生理想是根本不 可能的。因而被迫在他趋于成熟，个人能力、学识达于颠峰状态的 41 岁英年， 离开了官场和他并不情愿放弃的政治追求，这对于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来说 委实太痛苦了。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实现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建功立业 的愿望，可供选择的方式实在是太单一了，那就是受到统治者的赏识，朝廷 的重用，进入仕途去做官。官做得愈大，地位愈高，他的愿望实现得就愈充 分。要是不被赏识和重用，就只好皓首穷经去当书虫，顶多不过去“讲习” 教书。因而，知识分子的遇与不遇，这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前途问题，而实质 上是一个人能否实现其价值，贡献其力量，能否为社会和人民做出有益贡献 的大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陶渊明归田隐居已经近 20 年的时候，仍然热切不忘 其遇与不遇，因而感慨系之地写下了这篇洋洋洒洒，诅咒现实，凭吊先贤， 愤世疾俗，牢骚满腹的文章的动因。这是他郁结于胸中多年的块垒的渲泄， 冲天的怨气的释放，始终没有消磨净尽的猛志的倾吐，其诱发的因子却是先 贤同类题材的感触，一石激起千层浪，因而这篇文章一反萧疏散淡，闲放旷 达而呈现出波浪奇涌，一泻千里的气势，是郁积于胸的牢骚总爆发：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 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 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 间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 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唯文乎！抚卷踌 躇，遂感而赋之。

陶渊明在序中，列举了有宏伟抱负和过人才华的先贤的潦倒不遇，坎 壈终身，如董仲舒，司马迁、屈原、夷皓……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为人正直， 志趣高远，学识淹贯，忧国爱民，而遭遇却是最为不幸。推究其原因则是现 实的黑暗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一言以蔽之，有志之士始终不被现实接纳，不 为世俗所理解的是因为他们的宏伟人生目标，不愿与恶浊现实同流合污的志 趣以及众醉独醒的处世态度，是先知者的孤独，先觉者的苦闷，追求者的痛

苦。正是这些被现实冷遇了的先贤才融铸了历史的辉煌；也引发了作者的感慨，写下了这篇感人至深的赋：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  
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  
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  
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  
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  
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

淳源汨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  
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  
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  
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  
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  
嗟呼！雷同毁异，物恶其上。  
妙算者为迷，直道者云妄。  
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  
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清而谁亮！  
哀哉！士之不遇，己不在炎帝帝魁之世。  
独祇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  
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  
无爱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  
悯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  
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  
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  
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轡于促界。  
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  
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漓以洒袂。

承前王之清海，日天道之无亲。  
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  
夷投老而长饥，回早夭而又贫。  
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  
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  
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  
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  
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  
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  
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  
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



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  
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  
苍昊遐缅，人事无已。  
有感有味，畴测其理？  
宁因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  
既轩冕之非荣，岂缁袍之为耻！  
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  
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

按其文意，此赋分为四段，已在文中标出。第一段赞颂上古轩唐时代的清明政治和人们的适意称心，叹息后来社会的恶浊和诸种弊端。表现了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第二段文章引大量例证针砭了善恶不分，贤愚莫辨，是非颠倒，白黑混淆的丑恶现象。如贾谊被贬，董仲舒受挫，张释之如果不是爱盗的伸辩早已成为冤魂，冯唐蹉跎老大……抨击了“雷同毁异、物恶其上”的世俗风气和“哲人无偶”的可悲现实。第三段作者以辛辣犀利的眼光对封建时代所顶礼崇拜的“天道”发出疑问。对“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的说教感到无比的虚伪与厌恶。作者罗列了历史上有善行懿德的楷模如伯夷、颜回等人的遭遇，从而否定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教。这和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所说的“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的思想完全合拍。这种对“天道”的疑虑，对世俗的愤恨的强烈程度与“悠然见南山”的格调大异其趣，比鲁迅所说的“金刚怒目”式的《读山海经》都还要激越些。是陶渊明对社会深入观察，结合自身经历悟出的人生真谛。最后一段作者从历史上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都不免磨难坎坷中对“天道”鬼神作了进一步的否定进一步表白了自己“固穷守节”的情怀。

《感士不遇赋》是陶渊明满肚子的牢骚和不合时宜思想在前人同类题材感召下的总爆发和大发泄，它虽然吸取了《离骚》、《吊屈原赋》、《士不遇赋》、《悲士不遇赋》的营养，但是却与前人之作毫不相袭，更无雷同之处。例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的基本思想是阐释儒家“独善其身”信念；司马迁表现的是积极建树，有所追求，有所作为的人生态度；而陶渊明的文章在揭露社会现实方面不遗余力，对天道的怀疑，对鬼神的否定，对黑暗官场的诅咒和与统治阶层决别的决心是其精彩动人之处。

当然，用冷静而客观的眼光来看，陶渊明此文也有可议之处。首先是陶渊明对往古社会的充分肯定和无保留地赞美，认为那个时代淳厚古朴，尽善尽美，显然有着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不足取的。当然，陶渊明赞誉上古社会除了受老庄思想返朴归真的影响之外，也蕴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否定的积极因素。处于中古时代的作者，他要批判现实，否定现存社会的种种弊端，陶渊明不可能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他只能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武器，复古显然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他对上古社会的美化正是对现实的抨击的一种方式罢了。此外，此文也展现了陶渊明归隐之后的矛盾复杂心态，他的归隐并没有全然忘情于政治，更没有把一颗赤诚热烈的心完全冷下来，功业上进之心的涌动是他“不遇”的思想根源。然而，与其说陶渊明归隐，倒不如说他归田更确切一些。真正的隐士是被人世间彻底忘却了，他也彻底忘却了人世。正如鲁迅所说：“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

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来飞去’，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真是精辟之至。真正的隐士社会是绝对不知道的。陶渊明归隐之后还没有忘怀现实，时或躁动不安和有功业欲望，这正是他的伟大和可爱之处。表明他的归隐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

陶渊明的文学风格是“豪华落尽见真淳”，萧散冲淡和自然质朴；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深于比兴，寓意隐曲的另一面，以及一些豪放飘逸的篇章。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其艺术风格既稳定丰富而又不断变化。他除了有静穆之处，又有“金刚怒目”式，此外还有戏谑谐趣的一面。那么——

### 陶渊明的戏谑之趣有何表现？

在历代研究陶渊明的著作中，总是把陶渊明定位为自然质朴，萧散冲淡的诗人，这自然是合理的偏颇，但其挂一漏万也是显而易见的。钟嵘在《诗品》中就已经指出，陶渊明除了“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之外，还看到他“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的另一面，应当说是

很有见地的。宋代朱熹也指出陶渊明除了平淡之外还有豪放之笔。其实，只要认真遍览陶渊明的所有作品还会发现他的调侃手法，戏谑之笔的艺术风格，我们只要对《五柳先生传》、《挽歌诗三首》、《止酒》、《自祭文》等仔细品味，陶渊明的诙谐逗趣，调侃戏谑之处就会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陶渊明用轻灵戏谑的笔调，把五柳先生的形象传神地勾勒出来，一个既无姓名出身、又无门第籍贯的五柳先生简直象星外来人一样地向当时非常看重门阀制度、郡望爵里的社会时尚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嘲弄了不看重个人素质，只以门第出勇敢人的陋习，又是向统治者的挑战。难道陶渊明真的不在意于自己的门第、郡望和出身吗？回答是否定的、他在《命子》和《赠长沙公》等诗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文中，不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列举了陶门洪族的悠久历史和家学渊源吗？如此地调弄世俗，取笑门阀制度，是在那个特定年代的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了。

至于引起过争论的《责子》诗，不管陶渊明的子女是否真的不肖，这首诗的谐趣戏谑成份不能排除，虽然说是“责子”，却不是正言厉色和呵责，只是说陶渊明对自己儿子的期望值过高、而现实情形与之相差太大，引起内心不悦、因而责备之中也不乏谐趣。当然，象《挽歌诗》之一也属此类。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面临生命终结，诗人以达观豁朗的眼光来审视人生，是没有什么值得遗憾和哀痛的。如此的眼光，这样的情怀常常不被一般人所理解，因而有人认为这首诗“只是浅语”“不落哀境”（无名氏批注《选诗补注》卷五）。其实正是诗人的谐谑。能够洞悉人生，悟透生死寿夭才能站在较高的层次上观照万事万物，达观自然不必多说，这更是陶渊明调侃谐趣。《自祭文》更是充满谐趣的戏谑之笔，自己还未辞人世，先就自己祭奠起来，这本身就是对

不得志的自身境遇的调侃和自嘲。而《止酒》诗更是一首充满谐趣逗乐，自嘲自弄的作品，是理智与情感的玩笑，健康向酣饮的警告，长寿向沉醉的诘难：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  
坐止高荫下，步止华门里。  
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展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  
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  
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  
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

这首诗从结构上看每句都包含一个“止”，属于典型的文字游戏——俳谐体。再从陶渊明的一生行迹来看，他是一个嗜酒成性，没有酒就难以调动生活乐趣和创作灵感的人，嗜酒和读书，大概是他的两大根本不能革除的癖好。如果要把二者排比一下先后轻重的话，嗜酒显然比读书还重要一些。象这样嗜酒的人不是别人劝他“止酒”（停止饮酒即戒酒），而是他自己劝自己“止酒”；这除了说明他从道理上深知长年无节制地饮酒对人体生命健康的危害之外，很大程度上是自嘲自娱。这首诗王瑶将其系于晋安帝义熙九年（413），这时陶渊明49岁，如果陶渊明写了《止酒》诗之后果然与酒绝缘了的话，我们还可以说此诗就是陶渊明给自己下的“戒酒令”，可是，事实表明他在此以后不仅照常饮酒，而且愈饮愈厉害。因而可以肯定这首诗是他的自嘲性的戏谑谐趣了。就在他年已60岁的时候，好友颜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陶渊明传》）那时的陶渊明一是家境贫困，二是身体染疾，居然把友人馈赠的巨额钱财全部用来买酒喝，这那里有什么“止酒”的意思呢？就在他临终时写的《挽歌诗》中认为人生的最大遗憾不是别的，而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陶渊明在理论上对于饮酒的危害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可是无法战胜醇酒对自己的诱惑。他甚至为了一醉，改变了不愿结识江州刺史王弘的初衷，而他却偏要写《止酒》诗，这是天字第一号的滑稽文字和戏谑逗趣了。

作为一个作家、诗人的陶渊明，如果他处处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万事万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情感和丰富多彩的人生，他也许最多只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冷静的思想家而已，那他的诗歌和文章不过是理智的排比，思想的传声筒了。唯其他有丰富的感情，睿智而有趣的思辨，洞察人生的幽默，超越世俗的调侃，葱笼丰茂的想象，他的诗文才显得那样清纯朴茂，萧散动人，具有历千载而不衰，传诵众口而称誉的艺术魅力。只不过陶渊明的戏谑谐趣显得十分自然巧妙，与那些貌似谐趣实则无聊的浅薄之作大异其趣。同时也要看到，陶渊明的戏谑调侃只是他艺术风格中很不显眼的部份，他那正话反说，庄言谐说的手法也不是他作品的主要特征，但是，作为全面把握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是不应当忽视这部份内容吧！

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辞去彭泽县令后,开始了隐居躬耕生活。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那么——

### 陶渊明旧隐后真的 断绝了与世俗的交游吗?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就不可能真正断绝与社会的联系,更不可能屏息一切交游。只不过是过从交往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而已。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的“息交绝游”,并不是说他断绝了与任何人的往来,而是指他停止与东晋朝廷的联系,断绝了与官场的交往而已,结束了相互倾轧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从现存的资料中,可以考知陶渊明不仅保持着正常的社会活动和必要的人际往来,而且交往的对象还不断变化和增多。确切地说,他“息交绝游”的只是官场当中那些面目可憎,语言不投的对象。他生活方式的变化,由官场回归田园,与仕途中人的往来自然少得多了。但也并非全然绝缘。象诗人原先较为投合的好友殷晋安(铁),一个归田,一个仍在官场,彼此的关系自然不如先前密切,在《与殷晋安别》中表现出他们友谊因为出处行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消息:“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霄晨。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坦诚地道出关系淡化是二人生活道路的不同所致的。不必夸大陶渊明对做官的朋友的冷淡和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如先前那样密切是事实,但是诗的结尾,分明还是情谊尚存的明证。温汝能竟说“即有凜然不可犯处”,更不知何据?

官场中的朋友,只要不是陶渊的直接顶头上司,或同处一个地方,他们之间的联系仍然维持着,并且有所发展,他和庞参军的交往就是显例。在陶渊明写给庞参军的两首诗中,表现出他们的情谊超过了亲朋故旧(“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而反复表明“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悦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然欢。……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这就说明陶渊明隐居之后虽然淡化了与官场中人的往来,但也并未真正做到“息交绝游”。不过,也应当看到,陶渊明确实也曾对先前交往的好友“中”“寻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有过委婉的规箴和善意的微讽:

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颖水滨。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诗歌显然对周续之等人应江州刺史檀韶之邀为其讲礼校书因其环境恶劣表示了委婉的讽喻,但是态度也还友善宽容。称他们为自己随时想念的“意中人”,并且还希望和他们成为邻里。不能只看到“马队非讲肆”等语就认定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人的隔阂和分歧。至于颜延之,也是官场中人,甚至晚

年官运亨通，位至光禄大夫，与陶渊明过从甚密，从他撰写的《陶征士诔》可见二人的情谊。此外江州刺史王弘，是陶渊明的崇拜者，也与陶有往来，如此等等。因而可证，陶渊明并非真正在归田之后就断绝了与官场朋友的过从。当然，陶渊明隐居田园之后，交往更多的倒是些志趣相投的“南里素心人”和不知名的田夫、野老、乡曲、邻里。这些人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有共同的田园生活内容和彼此感兴趣的“桑麻”之类话题，以及共同欣赏析疑的文士等等。无论陶渊明结交的那类朋友，他都有始有终，善解人意，宽于待人，这就是邱嘉穗所说“陶公善与人交处”（《东山草堂陶诗笺》）。

要之，陶渊明归田隐居之后，并非离群索居，他人生道路的变化和生活圈子的改变并没有使他成为既无朋友也无敌人的孤独者。他除了维持着与先前官场中一些明友的联系之外，又新结识了不少乡间田夫野老、素心人等，他们一起胜日郊游，临景赋诗，耕耘播种，共话桑麻。归田后的陶渊明虽然隐居不显，却不是不关心时事，没有人际交往的隐士；更没有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山野之人，他“息交绝游”只是那些伪善之辈，奸诈之人而已。

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那么——

### 怎样理解陶渊明专用《论语》？

沈德潜的这段话是比较了晋人的诗歌基本趋向之后导出的结论，指出陶渊明与当时诗人的不同价值取向，他的着眼点是陶渊明积极入仕的倾向和人生态度。关于陶渊明作品用事，前人作过统计。朱自清说：“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照本书所引，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余”（《陶诗的深度》）。沈德潜的统计看来是从直觉作出的判断，虽然不够准确，但也基本上符合实际。他的意思是说陶渊明接受了很深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综观陶渊明的诗文创作和为人行事，他显然把儒家的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大济苍生的愿望和乘时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把儒家的典籍作为必修课来对待。虽然人仕之后多次遭受挫折，却意志执著地追求达五次之多，就是他在从政道路走不通之后的挂冠归隐，也是儒家鼓唱的“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的实践。洁身自好，不与恶浊政治同流合污的人生态度既有老庄遗世独立，高蹈远引，淡泊功利价值观的展现，又蕴含儒家积极进取，无法施展抱负后的“独善”选择。因此，陶渊明从官场隐退到田园之后，并没有忘怀时事，冷漠现实，而是生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深入到社会的底层，随时关注着政治形势与现实社会，并在他的大量诗文作品中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展示出来，这已经在此书的有关篇章中提及，不再赘述。

明确了陶渊明的思想与儒家学说的渊源之后，对于钟嵘《诗品》里说他“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就不难理解了。陶渊明“协左思风力”，是指他具有左思的风力，至于他与应璩的关系，说穿了即是指陶渊明与《论语》的关系。因为应璩的诗也是学《论语》的。陈延杰《诗品注》说：“钟氏谓陶源于应璩，沈、刘二氏则谓出于论语，其实一也。盖应璩也学论语者，如百一诗：‘下流不可处’，‘是谓仁者居’二句可证也。……陶渊明之思想，冲夷抗烈，既不违反名教，又信任自然，殆会合儒家道家之言而韵之者。”如果把前人统计陶诗中用《庄子》事达49次之多和沈德潜所说的专用《论语》联系起来考察，陈延杰的话是很有见地的，指出了他兼融儒道思想的特征。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前修未密，后学转精”之意了。沈德潜的直觉判断虽然不够准确，但也八九不离十，用陈廷杰的话和后人陶渊明用事的分类统计来修正之，就能获得圆满的答案了。

作为晋宋之际的伟大文学家陶渊明，并非只擅长于诗歌创作，其实他写了不少优美流畅，脍炙人口的散文。那么——

### 陶渊明究竟写了多少文章？成就如何？

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那时的中国分裂为南北两大体系，战乱不已，政权更迭也十分频繁。就以南中国的晋宋而言，那时的政治非常腐败，祸乱相寻，文人的命运也很悲惨。如那时的著名文人殷仲文和谢灵运，都被统治者加以谋反罪而被谋杀。因而，在那个年代文人的作品留传下来的一般都不会很多。这不仅因为战乱兵燹使得文人作品流传下来很不容易，散失很大；同时，文人不得不顾忌乱世的生存，他们不可能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畅所欲言写下来，除了应制及实用性的文字之外，更多的都是消闲之作，山水之章，玄言谈禅的作品居多。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也不能摆脱上述因素的制约，因而他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也是非常有限的，诗文总量共 148 篇，其中诗歌 136 首，文章只有 12 篇。这当然不是他作品的全部，其间散失一定很多。这样的诗歌和文章的比例，文章还不到其总量的 1/10，因而，陶渊明的文章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就远不及诗歌为大，文名被诗名所掩也是其必然了。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陶渊明的文章无足称者。陶渊明的文章虽然数量上远逊其诗歌，但是，他的文章和诗歌一样，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社会理想与人生追求，表现了他与黑暗现实和腐朽统治集团之间的深刻矛盾和他那孤介刚直，洁身自好，独标一格的为人。同时还具有清新流畅。通脱不拘的审美特征，以及峻洁自然，疏旷萧散的艺术魅力，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那为数不多的传世文章之中，有吐露情怀，自画像式的通脱散文《五柳先生传》；有流露作者对旷世佳人深情依眷，憧憬美满幸福生活的《闲情赋》；有自咏情志，不愿苟合取容，随波逐流，借古人之杯酒，浇己胸中之块磊的《读史述九章》；有深蕴父子之情和亲情，天伦之乐而又愤世疾俗的《与子俨等疏》；有感叹宏图难展，有志不获聘的惆怅的《感士不遇赋》；有叙手足之情的《祭程氏妹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洞悉世情，悟透生死寿夭，达观豁朗的《自祭文》。所有这些文章无不思想内涵丰富，审美趣味独到的掷地有声的杰作，赢得了千百年来读者的赞赏。萧统就对陶渊明的文章赞不绝口：“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虽然这里说的文章兼指诗歌，评价极高，却是当之无愧的，的确抓住了陶渊明文章朴茂清新，流畅优美，自然率真，旷达隽永的艺术特征。在那个以绮丽堆砌为时尚，词藻华艳为楷模的时代，陶渊明的文章纯粹以清新自然，神韵飘逸取胜，为当时的文坛吹入一股清鲜空气，我们在研读陶渊明的作品时绝不可以看轻他的文章。唐代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认为晋无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独领风骚。这话虽然说得有点绝对，却可看出陶渊明文章的巨大价值。宋代陈知柔在《休斋诗话》中说：“陶渊明罢彭泽令，赋《归去来》，自命曰辞。迨今人歌云，顿挫抑扬，自协声律。盖其词高甚，晋、宋而下，欲追蹑之不能。汉武帝《秋风词》，尽蹈袭《楚辞》，未甚敷畅。《归去来》则自出机杼，所谓元首无尾，无终无始，前非歌而后非辞，欲断而夏续，将作



而遽止，谓洞庭钧天而不淡，谓霓裳羽衣而不绮，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轨者也。”其实这何止是《归去来分辞》，它基本上概括了陶渊明文章的整体风格。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说陶渊明：“《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子》，《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指出了陶渊明不仅诗歌写得好，文章也有很高的成就。

其实，仅就现今传世的《陶渊明集》来看，他的文章也不仅有只 12 篇，一些诗歌前面的小序、题记，也是简赅优美的短文，虽然不是独立的篇章，但也同样展示了陶文的清峻质朴，自然妍炼，长于传神，韵味深隽的艺术风貌。如《停云》序：“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思友情怀，溢于言表。《形影神三首》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阐释生死观和此诗的创作意图，简括中肯。《饮酒》二十首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游斜川》诗序更精采：“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至于《桃花源诗》前面的记，简直就是一篇独立的旅游抒情散文，与诗歌形成双璧。这些序文或标明诗歌命意，或描绘山川风物，或叙写内心所想，或渲染环境，烘托氛围，……无不意至笔随，流畅惬意，是脍炙人口的逸品，与诗歌正文，珠联璧合，同样珍贵，受到读者的喜爱。

#### 四、沾溉后世之谜

陶渊明的人品和诗风对于后世影响之巨大，在中古诗人中是无可与之比拟的。

从文学的教育意义而言，陶渊明从其诗文中显示出他的精神面貌，对其后世文人有相当强的感染作用。由于他的诗篇的艺术力量，使后世许多读者对其产生衷心的崇敬和向往，同时对自己所不满的黑暗社会深致憎恶。早在其后不久的梁代，萧统在其《陶渊明集序》中即指出这一意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法，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旁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后世评论者，对此都多加肯定并阐扬。

从诗歌创作而言，陶渊明的咏怀、抒情、刺世、田园之章，对后世影响颇巨。而那些艺术地描写农村生活的优美诗篇，在诗歌领域中揭示出一种鲜美的创作典范，建立起以田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优秀传统。后世诗人如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范成大都是他的这一传统的直接继承者。他们每人依其个性及生活条件，对陶诗各有所得。就是李白、苏轼、辛弃疾等大诗人和大词人，也深受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高洁耿介的为人一直为后世所注目，而他的文学创作却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陶渊明作品的意义和影响随着时代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被重视和推尊。那么

### 历代对陶渊明的评价经历了什么变化？

生活在士族秉政，门第观念压倒一切的时代的陶渊明，他那高尚的人品是受到人们尊敬的，可是，他那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学创作却很不被理解和接受。就连他的崇拜者、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对他的诗文创作也仅仅以“文取指达”四字而轻轻带过。身世寒微，才俊人杰的鲍照，首先以诗人的眼光注意到陶诗的价值，他曾经写过《学陶彭泽体》诗歌，并且标明是“奉和王义兴”的。王义兴即王僧达。诗歌抒写幽居之乐，闲逸之情，有意识地规步陶渊明的艺术风格。这是迄今为止最早注意陶渊明的诗歌并且以之为楷模的效仿之作，说明陶诗的价值已经有人注意了，这大约离陶渊明辞世已经20多年。钟嵘《诗品》把陶渊明作为重要诗人进行评价，不管他的评论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今人的标准，但是陶渊明作为重要诗人的地位已经被确认（前文已有论及）。萧统出于对陶渊明作品和人品的敬重，广事搜求陶渊明的作品，辑成了第一部《陶渊明集》，并且写了《陶渊明传》和《陶渊明集序》，不仅高度推崇陶渊明的人格，而且对他的诗文创作也极为赞赏，还在他编纂的《文选》中辑入陶渊明的诗8首的同时，对他称颂不已。沈约在《宋书·陶渊明传》中不仅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还把《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和《命子》诗辑入《宋书》，只是令人遗憾地是他基本上没有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作出评价。令人惊异的是陶渊明这样潦倒坎坷的文人竟同时被《宋书》、《南史》和《晋书》列传记载，这在历史上和文学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唐代对陶渊明的评价是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的。无论李白、王维，还是杜甫、白居易等人对陶渊明的隐逸既理解又不太赞同，而对他的文学创作倒是基本肯定和赞扬的。李白一方面欣赏“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寄韦南陵冰……》）。却对陶渊明的归隐未必赞同，“嵒岨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登巴陵道酒……》）。杜甫和王维几乎也是如此。杜甫既说过“焉得思如陶令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山值水如海势……》）。又嫌陶渊明不够“达道”：“陶潜避欲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王维曾经想学陶渊明的归隐：“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早秋山中作》）。“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送六舅归陆浑》）。却又讥笑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一惭之不忍”招来“屡乞而多惭”。（《与魏居士书》）在唐人心目中完全赞同陶渊明的人生态度的是遭受政治挫折之后，阅历丰富的白居易，他心目中的陶渊明是“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效陶潜体十六首》）对陶诗及陶的为人更是敬佩不已：“常爱陶彭泽，文恩何高玄”，“因高偶成句，俯仰愧高山。”（《题寻阳楼》）

宋代对陶渊明基本上是待肯定和颂扬态度的，把陶渊明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予以颂扬，对于他的艺术造诣更是推崇备至，苏轼《与苏辙书》中认为中国诗人中只有陶渊明最为独立特行：“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

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正是由于他对陶渊明有这样的偏爱，居然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成为中国诗歌中史上的一大奇观。布衣终老的诗人林逋则认为：“陶渊明无功德以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省心录》）。并且身体力行地隐于孤山，以陶渊明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至于具有强烈建功立业之心的辛弃疾，也是把陶渊明看成是孔明一流的历史人物：“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陆游对陶也是极为心仪赞誉不已的：“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读陶渊明诗》）朱熹也把陶渊明视为高士忠臣：“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慳。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题霜杰集》）。遍览宋人对陶渊明的评论，无论对其人格和文品几乎是无保留地赞美。苏轼推尊陶渊明为迥出众家之上的唯一诗人，指出他的风格“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之美。真德秀更主张：“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是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曾纮更有陶渊明的作品“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的盛誉（同上）。和上述评论相映衬的是蔡絛《西清诗话》中的一段话：“渊明意趣真古，清谈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金元明清时期对陶渊明的研究更加深入，元好问《论诗绝句》评论陶是很有影响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元人赵孟頫则称赏陶渊明：“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青松卓然操，黄华霜中鲜。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下。抚琴三叹息，世久无此贤”（《题归去来图》）。明代的茅坤和张溥对陶渊明也高度肯定（已详前），而清代更出现了研究陶渊明的热潮，陈沆是其代表，他对陶渊明的评价已在上述章节中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晚清的梁启超和王国维是研究陶渊明最有建树的。梁启超的研陶专著《陶渊明》从陶渊明的年谱编纂到陶集考证，以及关于陶渊明其人其诗文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考辨及论证，不乏真知灼见。“五四”运动后的鲁迅、朱自清、朱光潜等人也都对陶渊明的研究倾注过心血，这里就不再细述。

综观历代对陶渊明的研究和评论，可以发现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词穷而后工”，“诗人少达而多穷”，几乎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坎坷不遇的普遍规律，历数曾经在文学史上有过杰出贡献和巨大影响的诗人、作家，有几个能有稍可人意的境遇和令人称羨的结局？屈宋、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竹林七贤也少有善终者，陶渊明不必多说，唐代的李杜……这难道真的就是杜甫所说的“文章憎命达”的必然规律吗？文人不遇现象，当然反映了封建时代压抑人材的痼疾，也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真善美被社会接受的缓慢过程。美好的事物，杰出的作品并非一开始就被理解和接受，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冲刷淘汰，待到认识的提高和眼界的开拓之后才会发现其真正价值。陶渊明作品的历史命运雄辩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当我们将历代关于陶渊明的认识和评价的历史巡视之后，不难发现其规律。隋唐以前的陶渊明是被冷落和寂寞的，虽然有少数具有超前意识的研究者认识到陶渊明的意义，但其认识水准和研究高度都还处于资料搜集，考辨整理的初级阶段。萧统的见解和钟嵘的评价则已十分重要，具有奠基性质。钟嵘的评论虽然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已经具有拓荒性的建树，同时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趣

味和价值观念，不必苛责。唐代是研究陶渊明的发展时期。唐人二元论的眼光，对陶渊明既肯定而有所扬弃的见解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自然与唐代思想解放，儒释道兼容，与整个时代充满蓬勃向上乘时建功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他们既推崇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文，又对他的归隐和守穷有所微词，不管他们的见解是否允当，二元论的思想方法还是很可贵的。宋代是研究陶渊明的高峰，编出了几种有影响的年谱，整理的陶集也有十七种之多。对陶渊明的人品和文品都有深入的开掘和创造性的发现。可是宋人昧于理学和善造偶像的治学原则，显然影响了对陶渊明的深入而全面的把握，偏颇和绝对化也就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高峰之后就是向下滑行的开始吧。元明清时代是宋代研究的继承，但是其成就无非是唐宋水平的延续。倒是梁启超的出现，王国维的评论，朱光潜、朱自清等人的深入研究，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对陶渊明的理性审视，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评陶的敏锐眼光和全面审视，廓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是陶渊明研究的新阶段。

透过以上历史性的扫描，虽然不免挂一漏万，可是，对每个时代的研究特征有了大致的理解。最值得深思的是唐代和“五四”运动后的两个阶段，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是和这两个阶段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科学的，理性的人文研究不是塑造偶像，而是融入时代精神的理论建树和价值判断、审美透视。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和价值。否则无非是局部的发现和个人好恶表现而已。

陶渊明的作品不仅受到古往今来中国人民的喜爱，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并且被介绍到许多国家去——

### 陶渊明的作品在海外流传情况如何？

由于中国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不仅地域接近，而且从世界大文化着眼也同处于东方文化圈之内，因而，陶渊明的作品对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流布、研究状况、影响的方式和范围都会有些差异。

就东方国家而言，陶渊明的作品很早就流布海外，据日本学者考证，《陶渊明集》早已随遣隋和遣唐的留学僧带至日本。辑录陶渊明诗歌的《怀风藻》编辑的时间是孝廉天皇天平胜宝三年（751）十一月，即唐玄宗天宝十年，这时距陶渊明去世不过324年。这即表明，早在《怀风藻》结集之前，《陶渊明集》已在日本流传（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陶渊明诗文对日本汉诗的沾溉更难缕指：中臣人足《游吉野宫》：“昆地即方丈，谁说桃源宾。”藤原万里《过神纳言虚》：“奉规终不用，归去逐辞官。”大伴家持（717—785）编纂的《万叶集》的三大部类中即有“杂歌”与“挽歌”，显系受陶潜启发，其中第486首《防人歌》：“我家门前有五柳，老母翘首盼儿归。”此外，日本咏柳、咏菊一类题材显然从陶诗中吸收了营养，淡海真人福良满《早春田园诗》：“四分一顷田，门外五株柳，荐堪助贫兴，何更贫富有？”坂上忌寸今继《咏史》：“柳掩先生宅，花薰处士林。遥寻南岳径，高啸北窗隈。”嵯峨天皇《九日玩菊花篇》：“如何仙菊笑东篱，看花纵赏机事外，闲兴攀花会节宜，盈把陶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江户朝（1603—1867）和明治维新（1868）时期，藤原惺窝、土井馨牙等人是其代表。虽然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更多地接受西方文学的熏陶，但对陶渊明的兴趣仍然没有衰减，象宫崎湖处子（1864—1922）、夏目漱石（1867—1916）等，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找到陶渊明的影响。至于陶渊明集子的出版更有多仲，如藤原粹《陶渊明集》八卷本，青木嵩山堂出版。清人郑文焯批，日本桥川时雄校补的《陶集郑批录》，丁卯文字同盟排印。近年来牟田哲二的《陶渊明传》和大矢根文次郎的《陶渊明研究》更展示了日本学者在陶渊明研究中的新拓展，吉川幸次郎的《陶渊明传》、崛江忠道编《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等，也成就斐然可观。至于朝鲜，早在新罗晚期（即935年之前）就有学者倾注了对陶集的兴趣。诗人崔志远（857—915）少年时来华留学，写有大量诗歌，以“孤云”为号，当然受陶渊明《咏贫士》的启迪。高丽时期（918—1392）的金富轼在《对菊有感》中说：“杜牧登临翠微上，陶潜怅望白衣来。”后来的陈、郑浦、郑道传、徐居正等人的作品里陶潜的影响历历可寻。

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陶渊明时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免要晚一些。据阿英先生考证，本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张叔严曾把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俄译本送给大文豪托尔斯泰，并且认为陶和托氏二人思想和为人很相类。苏联汉学家艾德林编的《陶渊明抒情诗集》和《陶渊明及其诗作》是他的专著，德译本《陶渊明诗集》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版，1912年白哈蒂的《陶渊明的生平及其诗歌》和1928年洪德生译的《陶渊明诗选》标志着陶渊明为德国读者所接受。1916年英国的克兰默·宾释译《汉诗选译》在序中曾指出陶诗的价值。1918年阿琴·韦利译的《一百七十首中国诗集》中就有陶渊明诗12首。至于研究

陶渊明的著作就更多了，如伯恩海迪《陶渊明》、姚万《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等等。在法国则是留学生梁宗岱的《陶潜诗选》为较早的著作，他还把此书赠给罗曼·罗兰。在罗大冈的《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的书中，介绍的七位中国古典诗人中就有陶渊明。……总之，陶渊明作品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远播海外了。

陶渊明的为人和诗文作品受到了后世的喜爱与景仰，那么——

### 陶渊明在李白、杜甫、 白居易心目中的形象如何？

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意义巨大，影响深远。陶渊明的崇高品质和特立独行的操守为中国文人树立了一个令人敬重，值得效法的榜样。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不懈追求的人生态度，为完善独立人格而不与封建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价值取向，以及他文学创作丰厚的内涵和朴茂清新，古雅自然又不失优美流畅的内质，赢得了后世文人、作家、诗人的顶礼崇拜，成为怀才不遇，洁身自好者取法的楷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本以豪放浪漫，不循礼法而著称，他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志趣干预生活，寻示其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契机。可是由于天宝以来的唐代政权已经开始出现腐败，因而李白的从政道路不免如他在《行路难》中叹息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荆棘丛生，寸步难行了。但是他仍然求索着，寻找建功立业的机遇，“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的隐居独善是不被理解的：“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可是，陶渊明的为人行事，书琴自乐，饮酒赋诗的志趣和他的诗文成就又很受李白的推崇。“崔令学陶令。北窗常昼眠。抱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赠崔秋浦》）。“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抱琴出深竹，为我弹《鹑鸡》”。“曲尽杯亦尽，北窗醉如泥”（《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我醉欲眠卿欲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朝王历阳不肯饮酒》）当李白遭受挫折和长安被谗之后，归隐之念日浓，这时他又对陶渊明的隐居汲为认同：“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对酒醉题屈突明府》）。“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此等等。李白对陶渊明基本上持肯定和称赏的态度，尤其对他的诗文成就更是推崇备至的。

杜甫对陶渊明的文学建树是相当肯定的，他时常把陶和谢灵运对举，这本身就意味着对陶渊明的高度榆扬。谢灵运被钟嵘列为上品，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晋宋时代的衡文标准。杜甫诗中说到陶的同时，几乎都有谢：“焉得思如陶谢手”，已见前述，今再举几例：“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石柜阁》）。杜甫对陶渊明的归田隐居是持赞赏的态度：“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赤谷西崦人家》）。“白头厌伴渔人宿，黄帽青鞋归去来”（《发刘郎浦》）。“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表绍杯”（《秋尽》）。对陶渊明耿介不阿的人格也是敬佩的：“黄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县”（《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但是杜甫对陶渊明的《责子》诗有过责难（已详前），尽管有宋人为之转圆伸说，不过杜甫对陶渊明对子女的成材与否过于介意是有微词的。应当说，陶渊明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培养是不影响他“达道”的。



相对地说，陶渊明在白居易心目中的形象要完美得多。他不仅在渭川仿陶渊明的诗歌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而且还在不少诗文作品中称赏其为人和志趣，对陶诗更是嗜爱有加，随身携带：“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官舍小亭闲望》）。“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因高偶成句，俯仰愧高山”（《题浔阳楼》）。白居易还模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写过一篇《醉吟先生传》。白居易对陶渊明的认识和理解是与自身的命运，遭际联系在一起的。元和九年（814）他闲居渭川时把陶渊明理解为飘逸的酒仙，忘怀肚情的隐士：“爱酒不爱名，优醒不忧贫”，以及“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当然是很肤泛片面的。在他遭受政治挫折和仕途坎坷之后，先前的认识获得升华：“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应须学取陶彭泽，但委心形任去留。”一个超越世俗名利，达道豁朗的智者形象取代了先前的不关世情的避隐之士，认为陶渊明的归隐是“兼济”未通的“独善”，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而认为陶渊明的琴书消忧，诗酒度日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体现了高雅的志趣：“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松斋自题》）。“堂闻陶渊语，心远地自偏”（《题吴七见寄》）。“异世陶元亮，前生刘伯伦。卧将琴作枕，行以锺相随”（《春日闲居》）。“樽有陶潜酒，囊无陆贾金”（《闲居贫话》）。“《周易》休开卦，陶琴不上弦”（《喜老自嘲》）。“孟夏爱吾庐，陶潜语不虚”（《寄皇甫七》）。如此等等。总之陶渊明在白居心目中是

理想人格的再现，情趣高雅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诗文成就的极则，出处行藏的最佳模式。要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只是象陶渊明如此高洁、才华出众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而已：“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与元九书》）。一半是对黑暗现实的谴责，一半是对陶渊明没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叹惋。这实际上是与白居易宦海浮沉和仕途阅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的作家陶渊明，虽然他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高尚的品质和清励廉洁的操守，他那些一直受到读者喜爱的诗文作品，却仍然彪炳史册，熠熠生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那么——

### 当今对陶渊明的研究情况如何？

对于陶渊明的研究，虽然在他辞世不久就已经开始了，颜延之为他写的诔文，是其滥觞，如此算来已有近一千六百年的历史了。对陶渊明的研究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和探索，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是，这并非意味着已经取得尽善尽美的成就，在很多方面还有待今人的努力，以寻求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对陶渊明思想的探索，就还有不少值得深入发掘之处。凡是涉及研究陶渊明的著作，几乎首先必须触及的是他的思想倾向。一个人的思想是异常复杂的多面体，先前的线性探索和二维、三维的参照系的把握方式虽然可以寻绎出陶渊明思想发展脉络的主线，但是人的思想，尤其是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创造性劳动的作家、诗人的思想是相当丰富复杂的。线性归纳或者二维、三维的透视方式是难于奏效的。因而，试图把生活在传统思想大崩溃，儒家学说受到严峻挑战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玄学盛行、佛学泛滥，新的统治思想尚未完全形成之际的陶渊明思想进行归类或定位研究是相当困难的。儒家学说难于涵容陶渊明思想的全部，道、释两家思想在他的头脑中自然也有所浸润，但也难以以此来概括。内儒外道，道儒互补，儒释道兼融……各种思想之营养融铸为个性化很强的陶渊明的思想等各种说法似乎也都难惬人意。就是这本小册子中我所采用的最后一种说法其实也还很模糊，这是笔者在撰写此文时感到最为困扰的问题。要对陶渊明的思想说几句话，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会感到任何困难，可要作到准确把握，既为其思想定性，又要作出定位判断就不容易了。更不是纠缠于归隐、忠晋等模式所能涵盖的。我们企盼着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新见解的形成。有时个人甚至怀疑，对一个作家和诗人的思想是否有必要去进行不着边际的肤泛探索？我觉得文学家的思想不仅是他生活时代的思想总汇，甚至还会超越那个时代，即当今最为流行的所谓“超前意识”了。作家的思想在他的为人行事和文学创作中流露出来，灵感和想象是作家的生命。而灵感和想像往往是最无序而紊乱的，海阔天空般的，它既可能是现实中的存在，又可能是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因而，未来的陶渊明研究如果能够准确捕捉住陶渊明的思想，其贡献是相当可观的。

关于陶渊明的生平事迹，除个别细节尚需考证辨析之外，基本线索是清晰可寻的。至于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审美艺术经验，及其诗文作品的成就，虽然还存在不少的歧见，但是可以通过深入探索和微观剖析来寻求正确的结论。倒是一些隐微曲折，寓意深蕴的作品虽然本书也曾作过一些索解，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获得圆满的答案。未来的陶学研究这也应当是不可忽视的内容。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变换一种方法，采用新的切入角度和方式，或许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奇效。比如，当我们感到单纯的陶渊明研究难于拓展领域，深入开掘之际，如果我们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或者选取新的视角，在新的价值体系去审视，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例如，我们可以把陶渊明放在晋宋之际南北文化相比较的参照系中去审视，或者把陶渊

明拿来和此前、此后，或者同时代具有一定联系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可以拓展视野，注入新的内涵，而且还可以导出更为准确的结论，例如，说到陶渊明的古朴，就可以和古诗十九首、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作家进行比较考察；论及其风华清靡，也可以与曹植、陆机兄弟、潘岳等人结合起来观照。也可以与陶渊明以后的作家作品作类似的审视，甚至还可以和国外作家进行这种比较性的研究。相信这将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的。

当然，就陶渊明而言，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论题，就是前人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内容，也还可作时代性的深入研究，为之注入现代意识和新的内容，比如，陶渊明这位为人行事和诗文创作都很受后世景仰的作家，他的现代意义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可以深入探讨的。首先，陶渊明的高洁品质和清廉操守，就很值得当今人们深省的。陶渊明五次入仕，五次辞官，没有一次是被炒鱿鱼，全是他主动辞职。凭他的才华和聪慧的资质，他要与世推移，随波逐流，昧着良心往上爬，不仅可以讨得上司的欢心，也可以官运亨通，还能为自己捞大把银子。可是他却不愿这样干，他出来做官为的是实现政治理想和干一番事业，当他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时，毅然决然地告别官场，宁愿去过那种“薄身厚志”的躬耕生活。相比之下，那些一心只想往上爬，伸手要官，拼命捞钱的官员是否也应当学学陶渊明的节概和操守呢？我们今天的极少数“公仆”倒有点象朱熹所说：“晋宋人物，虽曰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集《陶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集》）。如果今人都能从陶渊明身上吸取一些为人行事的积极因素，在商品大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相对完善的自我，恐怕大大有益于当今的反腐倡廉了。

陶渊明的隐居是一个老话题了，但是仍然从中可以获得现代启发。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他的归隐是在无法挽救衰敝腐朽的社会风气。而又不甘沉沦，随波逐流时采取一种洁身自好的处世方式。隐，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人格完善的展示，这在陶渊明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最佳途径，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苛责古人。可是，陶渊明的隐又明显地包含着消极避世的退让。退让也无可厚非，当前程受阻之际，退后一步自然宽，的确不失为一种人生理想。可是这仲退隐，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显然应予扬弃。这里固然包含着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环境污染，生存空间狭窄，综合疲乏症等困扰对人的侵害时，人们需要一种宁谧环境，寻求回归大自然的乐趣，返朴归真的合理因素；然而，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所必需的竞争意识，进取精神，百折不挠的勇气，自然与陶渊明当年的隐居退让截然相悖的。我们自然可以在陶渊的为人和诗文作品中去品味他的自我完善内心世界的高尚，赏鉴他与世无争的厚道与宽容，但是绝对不可以身体力行。陶渊明当年的归隐是无可奈何的抉择，他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隐士，他临到晚年还在高吟“猛志”和“士不遇”，因而他的归隐在当时是合理合情，合符启己的选择的。但他心中仍然躁动着功业追求，没有淡忘世情。鲁迅说得真好：“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来飞去’，也不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真正的隐是无声无形，世人绝不知道的。陶渊明的归隐在他当时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与当今的价值观念是绝对相背离的，这是应当明确的。

## 后 记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曾广泛参阅了历代研究者的一些著作，并且从中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借鉴和启迪；时贤研究陶渊明的有关著作、论文也有所参稽，引书既颇多，牵涉的范围也较广泛，有的已经随文注明出处，有的已非原来状貌，只能引述大意，故未便一一注明，谨在此说明。笔者在撰写过程中，主要阐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见解，因而不免会对有关著述稍加品鉴评论，倘有不当之处，开罪时贤所论，尚祈理解并原有之。也希望得到有识者的匡正。

本书的撰写，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教益和帮助。谢桃坊先生、张志烈先生、钟优民先生、魏正申先生帮助不少，教益良多。或为我借阅资料，或驰函支持，或交流见解，或鼓励鞭策，谨在此一并致谢。台湾成功大学陈怡良教授还将其大著《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惠赐予我，厚爱奖掖之意甚殷，谨致谢忱。借乎陈先生赐书收阅时拙稿已交审阅付梓刊行，未能将其卓见摄入，实一憾事。

